



人民公社在跃进

上海市郊区人民公社的新经验

上海人民出版社

66501

研究所

人民公社在跃进

上海市郊区人民公社的新经验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民公社在跃进

上海市郊区人民公社的新经验

《人民公社在跃进》编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60,000

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0,000

统一书号: 3171·176 定价: 0.54元

前 言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使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出了灿烂的光辉。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上海郊区人民公社广大贫下中农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农业连续十二年获得了好收成。林、牧、副、渔也有很大的发展。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各条战线不断创造了新的成绩。特别重要的是，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积累了一批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鲜经验。这是一批比物质财富更加宝贵得多的精神财富。

在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用心寻找当地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推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同各地贫下中农一样，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斗争中，创造的新鲜的、先进的经验，是很丰富的。这本书所反映的，只是沧海之一粟。即使这样，本书所反映的问题也值得城乡各条战线的同志关心。“如同城市里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事情一样，乡村里也在每

日每时地发生着。农民在做些什么呢？农民所做的，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所做的有什么关系呢？为了要了解这些，看一看农村方面的材料是有好处的。”

本书有些文章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提供的；有些文章曾在报刊上发表过。收入本书时，分别作了修改和补充。

编 者

一九七四年九月

目 录

党的基本路线是人民公社的生命线	1
——南汇县坦直公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调查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战斗堡垒	10
——青浦县商榻公社陈东大队党支部工作的调查	
狠批宣扬孔孟之道的“老古话”，使批林批孔不断深入普及…	21
为贫下中农服务的理论兵	27
——上海县三林公社的调查	
壮志满胸怀 山河重安排	33
——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制订实施农业发展规划的调查	
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 1974—1980 年农业发展规划 （修订草案）	42
我们实现了三年治水改土规划	50
发展大队集体经济，促进农业大上快上	57
——嘉定县方泰公社向阳大队的调查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65
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72
——宝山县吴淞公社张建浜大队实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调查	
远征万里不停步	80
——南汇县泥城公社远征大队不断夺取棉花高产的调查	

反骄破满揭矛盾 科学种田夺高产	88
这里的猪养得又多又大又好	97
——崇明县新河公社七大队第一生产队穷、勤、巧养猪的调查	
增加储备 藏粮于民	101
——松江县城西公社联友大队中桥生产队为革命储备粮食的调查	
社办工业的好榜样	107
——青浦县重固公社农机厂的调查	
坚持自力更生, 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	114
——嘉定县徐行公社的调查	
我们这里插秧开始不弯腰了	124
坚持政治挂帅, 认真落实政策	133
——嘉定县朱桥公社灯塔二队贯彻“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原则的调查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143
贫下中农要牢牢掌握集体经济的财权	149
——川沙县北蔡公社实行经济民主的调查	
勤俭经营是人民公社的基本原则	157
——嘉定县桃浦公社李子园大队的调查	
产量要上去, 农本要下来	167
——上海县马桥公社紫兴大队坚持勤俭办社方针的调查	
一定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176
——上海县新泾公社的调查	
农村商业工作的新天地	183
农村民兵要积极参加阶级斗争	192

以农为荣,以农为乐	196
——金山县枫围公社团委教育青年扎根农村的 调查	
在斗争中加强赤脚医生队伍	205
抓好两条路线斗争,推动农村卫生革命	210
——奉贤县邬桥公社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情况的调 查	
认真搞好计划生育	222
——南汇县周西公社太平大队的调查	
这个公社实现了普及教育	227
——金山县朱行公社的调查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一代新人茁壮成长	236
——上海县纪王公社东风大队五七小学的调查	
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一支积极力量	244
——金山县革命故事活动的调查	
政治夜校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课堂	250
——松江县城北公社民乐大队第三生产队的调查	

党的基本路线是人民公社的生命线

——南汇县坦直公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调查

一九七一年前，坦直公社还是南汇县比较落后的公社，粮棉产量很低。有人曾经断言，坦直要上去，那是慢驴赶快马——不见影子。

一九七二年以来，坦直公社党委大抓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带领群众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跃马扬鞭，奋勇前进！今天坦直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新风尚大大发扬，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一九七二年粮食平均常年亩产比一九七一年增加一百零四斤，一九七三年又比一九七二年增加九十八斤，达到平均亩产一千六百斤，翻了《纲要》；皮棉平均亩产一九七二年比一九七一年增加四十五斤，一九七三年又比一九七二年增加三十三点六斤，达到平均亩产一百八十二点六斤。粮棉产量双双跃入全县高产行列。

以执行基本路线自觉性为标准

参加集体劳动实现班子革命化

坦直公社党委的经验，首先是以贯彻执行党的基本

路线的自觉性为标准,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实现党委班子的革命化,使党组织成为带领广大干部和社员改变公社后进面貌的战斗堡垒。

一九七二年一月,经过改选以后的坦直公社党委向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领导班子才是革命化的班子?一种意见认为,要有干劲,闯得出路子,按这样的标准建设班子,不愁过不硬。

另一种意见认为,改变坦直面貌的根本问题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问题,衡量领导班子革命化的标准,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家一致决定,投入火热的斗争,看贫下中农喜欢什么样的干部。

党委同志背着铺盖到贫下中农中间去。一位老干部一路上心情激动。七年前,他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大风大浪来了,看不清方向;今天,经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的锻炼,他想自己应该加速世界观的改造,把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自觉性作为革命化的标准。有一个生产队曾经开出十几亩“十边”地,有些社员把它作自留地分掉了。大队和公社有些干部去处理这件事,都被顶了出来。这位老干部意识到,私分“十边”地是一种资本主义倾向,钉子再硬也要碰。“欢迎”他的果然是尊“大炮”。“别的干部管不了,你为什么来管?”有人嚷道。这位老干部耐心地向大家宣传党的有关政策,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最后,大家高高兴兴地把“十边”地还给了集体。贫下中农都夸这位老干部“有肩膀”。

相反，广大贫下中农对党委另一个成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位同志下去蹲点，干劲很足，唯独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自觉性不高。群众向他反映有个队办厂的负责人搞不正之风，他认为这种事上不了纲；群众向他揭发公社机关有人违法乱纪，他硬是不信。大家说，尽管这个同志工作有干劲，但是他可不能带领我们走好社会主义道路。

贫下中农给公社党委上了一课：党委班子的根本任务在于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离开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去谈干劲，那就可能走上邪路。

怎样才能做到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呢？有的同志认为，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党委成员经常同贫下中农一道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这是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的重要途径。另一些同志说，劳动固然重要，但党委工作一大堆，我们几个人都下去劳动，能解决什么问题？

为了统一认识，大家对两个人的情况作了具体分析。

一个是一九六二年担任过公社党委委员、后来蜕化变质了的坏分子。这个人一懒生百病，从不劳动开始，到整天逛街下馆子吃喝；钱不够，就贪污；后来又利用职权在供销社胡作非为，终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提起他，贫下中农说：“这个人懒、馋、占、贪、变，从头烂到脚。”

另一个是公社历届党委会的成员。这个同志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他在坦南十队参加劳动的过程中，和群众一起耕耙土地，一起插秧耘稻，从思想上感情上密切了

同贫下中农的关系。有一次他发现有一块田禾苗疯长，立即找贫下中农分析原因。原来，是一个坏分子故意多施了化肥。他立即发动群众，批斗那个坏分子。他听到有的社员暂时缺柴烧，就把自己省下来的两担煤屑送上门去。可是以前，当这个同志还没有认真到基层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部分时间蹲在机关里发号施令的时候，他看到庄稼被鸡鸭糟蹋也不大管，社员群众有困难找他，也不大放在心上；有时下去跑跑，也是就生产抓生产。现在的变化是劳动改变了他对劳动成果的态度，密切了他和贫下中农的关系，增强了他的阶级斗争观念。

鲜明的对比，使公社党委的同志懂得了参加劳动和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关系，认识到：干部脱离集体生产劳动，就是脱离群众，脱离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就不可能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们日益自觉地投身于劳动当中去磨练。一九七三年，公社党委成员平均劳动九十天；一九七四年一至八月，平均劳动七十八天，比上年同期增加十多天。艰苦的劳动，使党委领导班子和贫下中农有了共同的语言和感情。

按照基本路线处理两类矛盾 促进后进队迅速向先进转化

用党的基本路线改造后进队，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切实抓好人民内部的两条道路斗争，不断向干部和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

因素，实现革命转化。这是坦直公社党委的又一条经验。

怎样看待先进同后进？是否只要产量高就是先进队？大家分析了祝桥大队的情况：这个大队粮棉产量都比较高，可是，近年来大队干部中有人搞资本主义活动，不少生产队阶级阵线不清。那末产量又为什么高？原来大队和有些生产队干部作了这么一些规定：农闲时自找赚钱门路；农忙时一个不准请假；大忙里包工到人，靠本事多拿工分。这样搞，一时虽然把生产搞上去了，但肯定不能持久，特别是社员的思想受到了腐蚀，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压抑。这个大队能不能列为先进呢？显然不能。

而另一个范桥大队，粮棉产量暂时排在末尾，该不该戴上后进的帽子呢？公社的同志来到这里，发现范桥大队人心齐、干劲大。初冬，麦田里，人们三五成群拉着一只只铁滚来回飞跑着压麦。田埂上，一队队人马挑着肥担穿梭往来。小河里，鬲泥船川流不息。社员告诉公社干部，前几年被阶级敌人钻了空子，资本主义势力干扰了前进方向，误了集体生产。大队党支部认真吸取了这个教训，狠抓批林整风，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煞住了资本主义歪风，社会主义正气大发扬。今天的范桥大队，显然不能列入后进队。

两个典型事例擦亮了大家的眼睛，坦直公社党委一致得出结论：革命一定会促进生产的发展，革命抓得好，产量一定高，暂时不高的，很快就能赶上去。但是，产量

高的队并不一定先进,如果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产量肯定会降下来。离开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单看产量高低,就是“唯生产力论”的流毒。根据这个标准,公社党委对各生产队作了具体分析,排出了二十八个后进队。党委成员分头带着小分队下去,一个队一个队去抓。

到后进队抓什么?要狠狠打击公开或隐蔽的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一点,大家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反映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该不该抓?怎样抓?大家分析了坦北十二队的情况,认识逐步趋于一致。

坦北十二队是一个后进队。一九七二年,公社党委去蹲点的同志带领群众狠斗了阶级敌人。这对人们是有教育的,但是对于阶级敌人煽起的资本主义倾向,却没有发动群众进行批判,因而队里的面貌并没有完全改观。有些人就是热衷于种自留地,摸鱼捉虾,上自由市场。公社干部感到实在难办,只好生产上抓紧点,疙瘩问题绕开点,想把生产先搞上去再说。但是,十二队疙瘩问题越来越多,生产怎么也上不去。这个事实告诉大家,要促使后进队实现革命的转化,就要抓这类疙瘩事,发扬无产阶级正气,煞住资本主义邪气。

但是,接着仍然还有一个“怎样抓”的问题。坦北大队党支部根据党委的意见,曾派了一位同志去蹲点。这个下去蹲点的同志办事有股子闯劲,他到十二队以后,谁热衷于种自留地,就点名批评;谁去捕鱼捉虾,就找来训一顿;队长不参加劳动,他一发火就要撤换。这一来,有些

人开始正常出工了。可是问题并没解决。不几天，资本主义倾向又悄悄地抬了头。转眼秋来，粮食产量还是全公社倒数第一。

坦直公社党委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认识到对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放任自流不行，乱煞也不行。于是，一九七三年春天，公社党委书记和另一个公社干部背着铺盖来到坦北十二队。才歇下脚，他们就上东家串西家，摸清了一些情况，决定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在办好政治夜校，组织干部和社员开展大学习、大批判的同时，过细地做干部和社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找了一个又一个干部和社员，走到哪里就把思想工作做到那里。社会主义新风吹遍了坦北十二队，干部和社员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主动起来对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批判。革命促进了生产，戴了几年的后进帽子，这下终于摘掉了。

坦直公社党委一班人就是这样扎扎实实地抓好后进队的革命转化工作。当一九七三年秋天来到的时候，全社二十八个后进队有二十五个起了显著变化，十四个还跨入了先进行列。祝桥大队也成了真正的先进大队。

以基本路线统帅各项具体政策 充分调动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

坦直公社的又一条经验，是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贯彻执行人民公社现阶段各项具体政策的总纲，立足于提

高社员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范桥十一队和坦东三队在落实“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项政策时采取的不同做法，和出现的不同结果，使公社党委深受教育。

一九七二年菜花飘香的时节，范桥十一队的社员对评工记分中出现的某些平均主义倾向很不满意，迫切要求改变“出工不出力，干活大呼隆”的状况。公社蹲点的同志和队长理解社员群众的心情，可是他们不是就事论事地改变这种状况，而是先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讨论制订了简便易行的评工记分办法，落实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政策。社员群众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推进了集体生产的发展。

与此相反，坦东三队为了纠正评工记分中的某些平均主义偏向，不在社员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却单纯地去搞劳动定额，而且搞得很烦琐。这样做，不仅没有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反而出现：有的人抢做工分多的农活，有的人干活不顾质量，有的人评工记分时争争吵吵，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影响了集体生产。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坦直公社党委认识到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各项具体政策，是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制订的，它隶属于党的基本路线并为基本路线服务。党的基本路线是人民公社的生命线。公社党委联系阶级斗争的历史，学习党的基本路线，认识到解放以来，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

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小生产者的传统势力仍然存在,这是产生资本主义倾向的温床。因此,公社党委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在落实政策过程中,不断地向社员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注意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基于这个认识,坦直公社党委重新检查了政策执行的情况,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把它一一落实下去。党委帮助广大干部和社员从党的基本路线高度划清是非界限,在同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中进一步落实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充分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九七三年“三夏”期间,在批判封建传统势力,落实“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以后,广大女社员革命干劲倍增。坦东三队吸取过去的教训,在评工记分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粮棉获得大幅度增产。陈桥大队纠正了“重棉轻粮,钞票挂帅”的偏向,粮棉双双大丰收。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战斗堡垒

——青浦县商榻公社陈东大队党支部工作的调查

青浦县商榻公社陈东大队，有三百十四户，一千四百三十三人，七百三十八个劳动力，一千七百四十二亩耕地，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

这个党支部有五十七名党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他们带领广大群众顶妖风，战恶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迷航。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提高，精神面貌更加朝气蓬勃。一九七二年，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一千七百零二斤，比上年增长两成以上；皮棉亩产一百三十斤，比上年增长三成；以猪为首的副业生产也有较大发展，养猪达到每亩田一点一七头。一九七三年，在一九七二年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粮食常年亩产一千八百零七斤，皮棉亩产一百五十斤，养猪每亩平均一点二头。随着生产的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社员分配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一九七二年平均每人分配收入一百七十元，一九七三年平均每人分配收入一百七十四点九元。全

大队呈现着一派生气勃勃的大好革命景象。

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

陈东大队党支部委员会，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锻炼成长。人民公社化以来，支部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同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斗，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不断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队的共产党员说：“金子也买不动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的不断深入，他们坚持用党的基本路线加强自身革命化建设，认真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做到原则问题不让步，路线是非不含糊，政治上互相关心，工作上密切配合，步调一致，动作整齐，形成了团结战斗、密切联系群众的革命化的领导班子。

（一）坚持认真看书学习，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他们坚持一周一次集体学习和每月一次党课的制度，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批林整风中，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等教导，狠批了林彪一伙散布的反动的“天才论”，克服了有些同志认为“土生土长，对本大队情况熟悉，不一定要调查研究”的错误思想，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第十一生产队一度革命和生产上不去。究竟是

什么原因呢？过去只看现象，不抓本质，抓不到问题的要害。这次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看到问题的实质，抓住主要矛盾，发动群众，揭开了阶级斗争盖子，改变了这个队的面貌。有一段时间，支委有些同志对政治和业务的辩证关系认识不清，怕抓了生产犯“业务第一”的错误，不敢大胆领导生产。批林整风中，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等教导，联系二队一度因放松政治思想工作，由先进向后转化，九队由于坚持以革命统帅生产，从后进跃为先进的事实，深入批判林彪的“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反动谬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坚持以革命统帅生产，为革命敢于抓生产，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不断深入。

（二）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支部书记老沈同志，对于一切重大问题，都坚持事先通气酝酿，会上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讨论，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因此，委员在讨论问题时，畅所欲言，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一经决议，就坚决执行。老沈同志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敢于承担责任，勇于改正错误。一九七一年冬天，支委在总结经验，讨论一九七二年如何继续前进的问题时，有的支委提出了实现粮食亩产翻《纲要》的奋斗目标；有的却认为有困难，步子不能跨得太快。开始，老沈怕担风险，也认为这个奋斗目标太高了。经过会议充分讨论，激烈争辩，分

析了有利和不利条件，统一了认识，一致认为：翻《纲要》是有可能的。三队已接近实现，金山县八二大队已做出了榜样，只要我们苦干加巧干，就能实现翻《纲要》。老沈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想法，集中了正确意见，支委会作出决议，提出了“抓路线，学大寨，誓夺粮食亩产翻《纲要》”的战斗任务。

支委成员中，新老干部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致。支书老沈善于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以身作则搞好“一班人”的团结。他们经常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一九七一年夏天，按照国家计划已经停烧的窑，又冒烟了。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支委会上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有的说：“搞点副业，增加收入，不收黑市坯，不售高价砖，下面要求烧，有啥错。”但多数同志认为：烧窑是否按国家计划办事，也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在下面，根子在领导。大家争得面红耳赤。这时，老沈引导大家重温党的基本路线，回忆本大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战斗历程，他说：“社员看干部，干部看支部。在方向道路问题上，支委会一定要带好头，把好关。我们决不能只顾抓钱，违反国家计划，离开社会主义方向，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通过争论，统一了认识，决定停烧。后来有的支委又提出，坯已做好，燃料也准备了，烧了最后一窑再“刹车”。最后一窑该不该烧？支委会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结果，作出决定，对资本主义倾向寸步不让，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这最后一窑坚决不烧。在斗争实践中，他们深刻体会到：“基本路线要记牢，思想

斗争很重要，路线分清觉悟高，带领群众走正道。”

(三) 密切联系群众，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一九七二年，支部搞了三次开门整风。他们敢于发动群众揭自己的短，帮助党支部查路线，找问题，从不掩盖矛盾。广大贫下中农指出：“近几年来，兄弟大队产量上去很快，陈东大队进展缓慢；产量是现象，根子在思想，实质是骄傲，关键在领导。”支委成员深深感到，群众的批评中肯，触到要害处，帮在根本上。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人贵有自知之明”，“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的教导，联系思想实际，进行了深刻的自我解剖。认识到：骄傲自满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反映，是继续革命觉悟不高的表现。他们决心踢开阻碍继续革命的绊脚石，洗刷唯心精神。九个支委以高度的责任感，深入群众，划片定队，做到“三个结合”：把大学习、大批判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把学习外地和本市其他单位的先进经验同总结推广本大队的先进典型结合起来，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他们深深体会到：党支部领导班子的建设，只有依靠群众，不断地从群众中汲取政治营养，才能使领导班子的战斗力不断增强。

朝气蓬勃的先锋战士

这个支部的五十七名共产党员，个个朝气蓬勃，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敢于斗争，做革命的先锋，在学习和生产斗争中，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员老陶，十几年来，那

里艰苦就到那里去，那里有困难就出现在那里。大队饲养场出现亏损时，他去帮助工作，带领饲养员半夜起床，摇船外出，敲冰卷水草，克服了缺少饲料的困难；还同饲养员一起，睡在猪棚里，精心照料，攻克了苗猪死亡多的难关。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使饲养场转亏为盈。一次强台风袭击，堤岸遭到淀山湖巨浪冲击，处在快要决口的危急关头，他和另外两个党员，带领三十多个社员，赶到那里，纵身跳入水深齐腰的湖中打桩，皮肤发紫了，手浸得肿了，他们仍坚持战斗，一直到排除危险。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他更加焕发了革命青春，带领群众战天斗地夺丰收。老党员老陈，二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革命着想，为集体出力。他把做好本职工作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联系起来。他经常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做的想的，不是为一个人，而是为革命。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我要为全人类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不顾自己身患严重肺病，坚持和社员同样战斗。他爱人去世时，正巧队里一头耕牛跌在沟里，他不是急于回家，而是带领大家先抢救耕牛。他说，人死不能再活了，耕牛不抢救，集体就要受损失。他处处以身作则，办事公道。生活困难，却从不随便向集体借钱；住的房子，是旧毛竹搭架，火门砖砌墙，稻草盖的顶，大队几次分配砖瓦、木料要他修理，他再三让给别人，坚持让社员都住上了新房后再给自己。他在电灌站工作，遇到刮风下雨，就是在深夜，也要起来，走田头，查漏洞，堵缺口，并挨家挨户关照社员注意安全。

这个支部的广大党员，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是党支部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党员，提高党员路线斗争觉悟的结果。党支部紧密联系本大队阶级斗争实际，经常对党员进行关于党的性质、任务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并结合党员的思想和工作上的问题，通过党小组活动、个别谈心和办学习班等形式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一九七一年冬天，有些党员干部存在“换班”思想，说什么“反正是把权交给贫下中农，我种田就是革命。”针对这种思想，党支部办了学习班，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广泛进行忆苦思甜，引导大家用阶级斗争观点，从路线的高度进行分析，开展“种田为革命，还是种田就是革命”的大讨论。使大家认识到：“为革命种田”和“种田就是革命”，一字之差，却是路线是非。“种田就是革命”抽掉了阶级内容，抹煞了阶级斗争，是中了林彪“农民种好地就是政治”的流毒。大家回忆了解放前，陈东的贫下中农受尽剥削吃尽苦的血泪账，畅谈了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做主人，为革命种田越种越甜的幸福情景，并联系解放以来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刻认识到：一样种田，两种结果，斗争的焦点是一个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他们说：“林彪胡说‘农民种好地就是政治’，是要使我们埋头种田，不管路线，让他们这伙狼心狗肺的叛徒卖国贼复辟资本主义，叫我们吃二遍苦；我们决不能上当受骗，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分清路线是非，牢记党的基本路线，继续革命永向前。”

陈东大队党支部还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切实加强了对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他们认识到：在青年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斗争的焦点是把青年培养成为哪个阶级的接班人。党支部牢记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的教导，组织青年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基本路线，请老贫农讲家史、村史，进行新旧社会对比的阶级教育，并把青年推向阶级斗争第一线，使他们在斗争实践中经受锻炼，接受教育。

党支部还针对青年努力向上、积极好学、爱好活动的特点，指导共青团组织开展团的活动。举办了以团员为骨干的政治文化科技夜校。这所夜校，密切配合中心工作，既学政治，又学文化，是团员、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开展批林整风的大课堂，也是青年开展文化、科技活动的重要阵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这个大队的广大共青团员和青年，成为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的一支突击力量。

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陈东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他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分得更清了。不论是党员干部，还是社员群众，从白发苍苍的老贫农，到系着红领巾的儿童，绝大多数都能和资本主义倾向开展

不调和的斗争。七队的社员，有一次运稻草卖给国营收购站，半路上，有人招呼，以每担三元的高价购买，说：“我们比国家牌价高一倍，你们可以少走路，多卖钱。”社员们当场拒绝，严肃批评他是在搞资本主义，说：“我们宁愿多走一点路，少卖一点钱，为的是建设社会主义。”一九七一年春天，有人到陈东大队来非法收购砖坯，遇到一个贫农女社员就讲：“我出六十元钱买一万块砖坯。”女社员对他说：“我们只卖五十二元，不卖六十元。”这个人一连跑了几户，回答都一样。他开始不理解，当知道陈东是个坚决执行国家计划，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素有“金不换”之称的大队时，就溜走了。社会主义思想，在陈东大队的儿童心中也深深扎了根。有一次，红小兵到窑厂劳动，帮助搬砖时，有个买砖的人偷偷地送给他们一些糖，说：“小弟弟，小妹妹，帮助我们多搬几块砖。”红小兵们想，买多少就搬多少，还要另外多搬就不对，当场就把糖丢给他，说：“我们不吃你的糖衣炮弹，不许你拆社会主义墙脚。”这个大队的社会主义阵地就是这样坚强巩固。

陈东大队的社会主义思想所以这样深入人心，是由于大队党支部时时、事事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党员干部，武装社员群众，做到分析倾向抓苗子，落实行动抓整改，掌握规律抓反复，依靠广大群众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的教导，不断分析干群思想状况，及时抓住错误思想的苗子，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他们认为，任何错误思想的

苗子，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干部、社员思想上的反映，代表了一种思想倾向，必须及时解决，就“好比对待稻田里的杂草，一露头就要拔掉，好让稻苗好好生长”。一九七二年初，在落实种植计划时，有人想多种西瓜，少种粮食。他们说：“多种西瓜收入高，钞票不装自己腰包，为了集体好。”支部感到，这是自由种植的错误思想，关系到是否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问题。针对这种思想，组织大家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狠批刘少奇、林彪一伙散布的“利润挂帅”、“自由种植”的谬论，开展了要钱还是要“线”的大讨论，使大家认识到：如果不执行国家计划，“利润挂帅”，以副伤农，就会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因此，全大队十一个生产队，都按照计划种植，没有多种一分地的西瓜。

出现了错误倾向怎么办？是知错必纠，还是将错就错？党支部认为，明知错了，又不去纠正，资本主义倾向就要从思想上打开缺口。他们的态度是：错了就改，立即纠正。一九七一年三秋期间，六队和七队外流了一千六百斤氨水。党支部发现后，连夜查明情况，动员追回。有的干部说：“这次算了，下次不干。”党支部对他们反复讲明，在方向道路问题上，决不能有半点犹豫含糊，干部自己做错的事，就要自己去纠正，这样群众拥护，威信更高。做了过细工作以后，两个队长亲自摇船去把氨水追了回来，并对有关单位当面作了自我批评。这件事，对其他生产队干部教育很深，制止了计划物资外流的错误倾向。

党支部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决定了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的艰巨性。比如，落实种植计划的时候，自由种植的倾向常常露头；丰收以后，就容易出现铺张浪费的苗头；春节前后，“四旧”复活往往抬头，等等。他们紧紧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把工作做在前头，经常抓，反复抓，抓“反复”，一抓到底，率领群众牢牢巩固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陈东大队党支部决心继续抓紧抓好批林批孔斗争，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鼓足更大的劲头，争取农业获得更大丰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狠批宣扬孔孟之道的“老古话” 使批林批孔不断深入普及

我们川沙县六里公社艾南大队党支部，在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中，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理论队伍的作用，组织他们进行社会调查，把长期以来流传在农村的一些“老古话”搜集起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清哪些是反映劳动人民斗争经验的语言，哪些是孔孟之道的流毒。然后，发动贫下中农深入批判那些宣扬孔孟之道的“老古话”，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前一个时候，我们大队研究了如何把批林批孔进一步深入下去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克己复礼”反复批过，大是大非问题已经联过，没有啥东西好联、好批了。这时，大家在学习中央文件、总结前阶段运动，谈到了这样一些情况：今年我们大队获得了夏熟丰收，有的人却说什么“丰收全靠天‘搭班’，人要争气不‘来汕’”，把夏熟丰收看成是全靠天老爷帮的忙。有的人还有“多吃饭，少开口”的思想，不积极地同资本主义倾向开展斗争。这使我们看到：长期流传在农村的一些宣扬孔孟之道的“老古话”，对社员的影响较深。要彻底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就一定要对这些“老古话”进行批判。于是，我们组织理论队

伍，到社员群众中去进行调查，共搜集了七十多条宣扬孔孟之道的“老古话”，然后发动理论队伍和社员群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这些“老古话”同孔孟的谬论对照起来进行批判。

第一，有些生产队的社员对“穷靠富、富靠天”、“牛吃稻柴鸭吃谷，各人修的各人福”、“命里穷来总是穷，拾着黄金要变铜”等“老古话”进行了批判，看出这类“老古话”同孔老二一伙鼓吹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谬论，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说过去剥削阶级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是天经地义的，劳动人民做牛做马是命里注定的。荀况在《天论》篇里早就批驳过这一反动论点，他认为天只是个自然界，没有什么意识，不能把人和人的关系说成是上天决定的。毛主席教导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反动统治阶级宣扬孔孟之道的“老古话”，用来愚弄和欺骗劳动人民，今天必须痛加批判。第四生产队一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解放前，她的父母因生活困难，把她送掉两次，从小就当童养媳。这次，她用亲身经历痛斥“天命论”。她说：“旧社会，乡长买地造屋，保长吃鱼吃肉，地主富农穿红着绿，这不是他们‘命好’，而是靠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养肥他们的。我侬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吃糠菜薄粥，也不是我们‘命苦’，是因为政权和土地都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新社会，我侬劳动人民生活象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更比一天好。这也不是‘命’一下子变好了，是因为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好，社会主义制度好，贫下中农当家作了主人。什么‘富靠天’、‘命

里穷’、‘各人福’等等，都是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剥削劳动人民而制造的谎言。我们决不能相信他们这一套。我们不靠天，不信命，要听毛主席的话，干一辈子革命。”

第二，有些生产队的社员批判了“出头椽子先烂”，“多吃饭，少开口，不招冤家无对头”等“老古话”。在批判中，大家指出，这些“老古话”反映了反动没落阶级的处世哲学，浸透了“中庸之道”的毒汁，同孔孟散布的“和为贵”的谬论实质是一样的。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妄想压制劳动人民起来革命，叫我们不要跟阶级敌人斗，以便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现在，再宣扬这类“老古话”，只能对反动阶级有利。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坚持斗争哲学，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第二生产队队长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批判，说：“过去，我不想去讲人家，也不让人家讲我。人家有缺点错误，我眼开眼闭，只当看不见，大家和和气气，少惹是非。结果，想和气，和不了，矛盾反而多起来了。有一阵子，我们队干部之间，心想不到一起，劲使不到一处。阶级敌人就趁机活动，散布‘同是一个姓，都是一家人’等宗族观念，破坏干部、群众之间的团结，资本主义倾向也抬头了，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后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教导，队干部之间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发动群众狠斗了阶级敌人，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班子团结了，干群关系密切了，革命、生产面貌都有了改变。事实证明：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不出头，

阶级敌人就要出头，就要破坏捣乱。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哲学，做革命的‘出头椽子’，对革命的事就是要多管，把它管好，管到底。”第八生产队有个干部，原来讲起话来“顺水道”，从来不得罪人。这次批判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老古话”，增强了斗争性。有一次，他听到有个坏分子散布反动谬论，就和其他干部一起，当即召开社员大会，批斗了这个家伙。

第三，有些生产队的社员还批判了散发出“男尊女卑”臭气的“老古话”，比如“糯米不是米，女人不是人”，“天字出头夫作主”，等等。广大贫下中农，特别是妇女同志，用解放前后劳动妇女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对这些“老古话”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第四生产队有个贫农社员说：“这些‘老古话’是历代反动阶级腐蚀革命人民的鸦片烟，是套在劳动妇女头上的精神枷锁。我自己就深受这种‘男尊女卑’的毒害。解放前，流传着什么‘男的属羊，出门不带饭粮；女的属羊，败尽爷娘’的鬼话。我不满十岁，吃人的旧社会就夺去了我爷娘的生命。因为我属羊，有人就把罪名都算到了我的头上。结果把我从这家送到那家，受尽欺侮，还讲我是‘百败命’、‘扫帚星’，真是反动透顶。解放后，‘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我这个‘百败命’，翻身当了主人，我的子女都健康成长，有的在读书，有的走上了工作岗位，幸福生活讲不尽、说不完。”大队有个女干部说：“从我们大队来看，广大妇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半边天作用。六个党支部委员中，三个是女同志。许

多在旧社会一字不识的妇女，现在不但有了文化，而且在政治夜校里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这些铁的事实，是对‘天字出头夫作主’等‘老古话’的有力批判。”

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批判活动，感到要批判那些宣扬孔孟之道的“老古话”，就要注意选择得准。开始，我们花了很大的气力，搜集了不少“老古话”发到各个生产队，但群众对有些“老古话”却批不起来。我们作了分析，才发现凡是批不起来的“老古话”，有的不属于孔孟之道的流毒，有的在群众中已经没有“市场”了。我们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力求选择那些浸透孔孟之道的、在群众中流传较广的“老古话”，批起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我们大队通过批判宣扬孔孟之道的“老古话”，批林批孔出现了一个深入、普及的新局面。贫下中农说：“孔老二死了两千多年，流毒还在眼门前，如果不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我们还要吃苦头。”原来有些社员认为，孔孟之道难懂难批，现在大家感到，孔孟之道的流毒，看得见，摸得着，批得来，纷纷投入了战斗。三夏大忙以来，全大队七个生产队和一个企业单位，共开了二十多次批判会，写出了七十多篇批判稿。在每天的工前、工后批判会上，男女老少都争着发言，六、七十岁的老妈妈也联系实际，控诉孔孟之道对劳动人民的迫害。实践证明：批判宣扬孔孟之道的“老古话”，是把农村的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的方法之一。

我们的大队理论骨干，通过和群众一起批判宣扬孔孟之道的“老古话”，在斗争中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

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队理论小组的同志，还努力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注释一些法家著作，写批林批孔的文章。大家决心和贫下中农一起，把农村的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

中共川沙县六里公社艾南大队支部委员会

为贫下中农服务的理论兵

——上海县三林公社的调查

上海县三林公社，在批林整风运动中，逐步形成了一支理论宣传队伍。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后，这支队伍进一步发挥了战斗作用。参加这个队伍的，有百分之八十是在农村插队落户和回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在斗争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贫下中农高兴地称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理论兵”。

这支理论宣传队伍，完全是适应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需要而形成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公社原来有五百多名“土记者”，分布在各个生产队中。批林整风运动开展后，广大贫下中农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但很多人“苦水倒得出，道理讲不清”，迫切要求知识青年发挥作用。池河生产队有个老贫农，批林会议一结束，就拉着担任“土记者”的知识青年到家里，对他说：“听了大家对林彪反革命罪行的揭发，我火都冒得要穿顶了。我讲你写，让我们一起来狠批林彪这个大坏蛋。”为了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贫下中

农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更高了，他们也要求知识青年“有根有攀地讲一讲什么叫‘先验论’，什么叫‘天才论’”。公社党委从社员群众中了解了大家在学习、批判上的这些要求，逐步认识到培养理论宣传队伍的重要意义。他们一面在原有土记者队伍的基础上，吸收优秀知识青年参加，建立了一百二十多个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小组；一面又学习兄弟公社的先进经验，在全公社二百三十三个生产队中分别办起了政治夜校，有九百二十三名知识青年担任学习辅导员。这些知识青年边学习，边向贫下中农宣讲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几年来，他们同贫下中农一起，普遍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著作，有的还学习了《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

这支理论宣传队伍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他们在公社党委领导下，认识到，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闻风而动，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斗争，才能显示自己的生命活力。为了帮助贫下中农深入批判林彪鼓吹孔孟之道和推行“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指示，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重要社论，在大批判中发挥积极带头作用，同时又查找有关书刊，编写通俗资料，通过讲课、漫画等多种形式，向贫下中农解说孔老二是什么人、林彪怎样运用孔孟之道搞修正主义，等等，以推动群众性的批林批孔不断深入。

在批林批孔中，公社、大队引导这支理论宣传队伍坚持深入群众，调查本公社、本队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

的事实，同贫下中农一道，对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进行有力的回击。小西林生产队有个不服管教的富农分子，有些同志原来认为，“死老虎没有什么搞头了”；后来，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狠批刘少奇、林彪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土记者又写了小评论，在田头宣读，社员群众便进一步发动起来了。结果，在这个反动富农的家里查出了隐藏的内容极其反动的日记。大家抓住这个活靶子，深入地批判了林彪效法孔老二阴谋“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革命罪行，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认识更加清楚了。有些生产队虽然没有四类分子，但是，通过联系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事实，如贩卖票证、搞封建迷信活动等等，进行揭发、批判，从而使大家认清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许多社员说，林彪依靠地、富、反、坏分子搞复辟，又用甜言蜜语向我们鼓吹“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就是要把我们重新拉回到旧社会的悲惨境遇中去，要我们吃两遍苦，受两茬罪。我们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斗争哲学，把孔老二、林彪批深批臭。

公社、生产大队党组织还引导这支理论宣传队伍，在批林批孔中联系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捍卫贫下中农的根本利益。有个生产队长，过去大家都认为他“门槛精”，“集体的家当得好”。理论宣传队伍对这件事深入进行了调查，使大家认识到，这个队长“门槛精”，就“精”在违反国家计划安排上。原来他见到人家哪一种品种的蔬菜种得少，

他就拚命多种,有一季因为多种了几亩小葱,少种国家计划安排的品种,使生产队每亩多收入几百元。在批林批孔中,大家提高了觉悟,一致认为这种走歪门邪道的“门槛”万万“精”不得。在政治夜校,理论宣传队伍又帮助大家选学毛主席有关指示,对这件事进行阶级分析,进一步揭发生产队内部存在的矛盾,并且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通过批判,社员群众表示要更加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堵塞资本主义邪道。这个生产队长也认识到,“只想赚钱,不顾路线,十分危险”,表示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依靠贫下中农,牢牢把正方向盘,当好社会主义集体的家。

同任何一种新生事物一样,贫下中农理论宣传队伍的成長,也同样经历了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当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小组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有人就讥笑青年高涨起来的学习热情是“赶浪头”、“出风头”,说:“种田人学马列是泥腿子想当大学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些风言风语不抵制,对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影响极大,对理论宣传队伍的巩固提高也很不利。针对这个情况,公社党委组织贫下中农和青年一起深入批判林彪攻击“马列过时”、反对工农兵学习马列著作的反革命罪行,使大家认识到,一切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反对劳动人民学习革命理论,目的就是妄图永远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让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稳稳当地复辟资本主义。这样,就大大激发起大家的无产阶级感情,群众性的学习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还表现在理论宣传队伍内部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了扶植理论队伍健康成长，公社党委注意从思想上、政治上关心他们，防止和克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毒素的侵蚀。许多知识青年进取心强，学习积极，工作热情，但是，有些人工作上一有成绩就骄傲，一遇挫折就消极。还有一些知识青年理论宣传工作一忙，就往往放松了参加劳动。针对这些思想，党组织就帮助知识青年建立民主生活制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组织贫下中农对他们进行耐心教育，要求他们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持走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东明大队有个知识青年参加理论宣传队伍后，在政治夜校作出了一些成绩，对社员就要起骄傲来了，谁迟到了他就板起面孔，谁多问了几遍他就不耐烦。结果，有的社员就索性不去上他的课了。这时，大队党支部就组织老贫农找他谈心，帮助他认识：贫下中农因为在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根本不可能读书，解放后有了学习机会，学马列学文化的心愿是多么迫切；理论宣传队伍正是为贫下中农掌文权，因此，一定要有火热的阶级感情去为贫下中农服务。这个知识青年听了，很受感动，从此不仅在讲课时耐心热情，而且经常挨家挨户访问，关心贫下中农学习上的困难，进行个别辅导，深受社员欢迎。

公社党委还注意帮助理论宣传队伍提高文化理论水平。公社、生产大队分别建立学习辅导小组，由公社党委书记和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亲自组织交流学习心得和集体备课。为了便于联系实际，使理论宣传更能切合当前

斗争和群众思想实际，公社和生产大队辅导小组在活动时，都分别由有关的党委或支部委员参加。有的还组织贫下中农向辅导小组讲述本地区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回忆自己在解放前经历的苦难家史，等等。

现在，三林公社贫下中农理论宣传队伍正象破了土的秧苗，在党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我们相信，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逐步深入，这支土生土长的理论兵队伍一定能够发挥更加巨大的战斗作用。

壮志满胸怀 山河重安排

——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制订实施农业发展规划的调查

“学习大寨抓根本，干部群众齐上阵，大干苦干七冬春，人换思想产量增。”这是上海市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制订远景规划时的战斗口号。这个口号，表达了这个大队的广大社员和干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战天斗地，改变面貌的决心。

这个大队位于嘉定县的西部，以种粮食为主。全大队有十一个生产队，三百七十四户，一千四百八十人，集体耕地面积二千九百二十三亩，平均每个劳动力种四亩多。这里地势低洼，水系混乱，长期以来生产条件改变不大，生产上去不快。粮食亩产一直在千斤左右，棉花亩产百斤上下，在全县算是个“小弟弟”。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迫切要求改变大队的后进面貌。一九七三年，他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制订了一九七四——一九八〇年农业发展规划。经过一年多来的努力，全大队

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实现了园田化，为建设稳产高产良田打下了基础。一九七三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三百多斤。一九七四年夏熟作物又夺得了丰收，三麦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平均亩产四百三十斤，总产量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二十二万六千斤，增长百分之八十，油菜籽亩产比一九七三年增长一倍以上。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基本路线记得牢，远景规划订得好，目标明确斗志高，革命生产双飞跃。”

要重新安排大地 不能修修补补

制订远景规划，要有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把目前工作和远大目标联系起来，站得高，看得远，方向明，决心大。新泾大队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在实践中逐步解决的。过去，这个大队因为没有一个整体规划，东一榔头西一棒，面貌改变不大。一九七三年春天，在上级党委的帮助下，大队干部和群众进一步学习大寨大队和昔阳县的先进经验，联系本大队的实际，比先进，找差距，他们针对本大队生产上的薄弱环节，提出了“五改”，作为三夏时期的奋斗目标。哪“五改”？一是改田块不平为寸水棵棵到；二是改施肥不足为施足基肥；三是改水系混乱为有条有理；四是改“面条秧”为老壮秧；五是改重种轻管为一种就管。这“五改”，要求明确，措施具体，见效快，不仅马上提高了大队的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是，大队干部和群众从“五改”中看到了制订规划的好处，认识到要改变大队的落后面貌，

首先要改变过去只图眼前，缺乏远见的落后思想。要象大寨大队那样，制订一个远景规划。

制订远景规划，是修修补补，还是敢想敢做，重新安排大地？这是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九七三年三秋前夕，新泾大队党支部在发动群众制订远景规划时，干部中有几种思想：一种认为，我们大队是“人少地多条件差，一年三熟在硬撑，修修补补蛮紧张，重新安排不敢想”；还有一种意见是，“沟渠弯曲只要通，土地不平照样种，只要小弄弄就行了”。这两种思想，都是因循守旧，实质上是不想革命，不想前进。

针对这种思想，党支部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进一步发动群众，总结学大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展开了“修修补补守旧摊，还是大干快上创新业”的讨论。许多同志深深体会到，过去大队面貌所以改变不大，原因就在于缺乏大干苦干、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就是懦夫懒汉的世界观在作怪。

思想提高了，革命干劲也鼓起来了。他们从本大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一个七年发展规划。他们形容一九八〇年远景规划实现后的情景是：“基本路线指航向，人换思想地变样，田野处处机声响，科学种田增产量；新村楼房朝南阳，文化室里电视亮，绿树成荫果味香，新泾真变鱼米乡。”

规划要由群众订 蓝图全靠自己画

远景规划怎样订，是靠少数干部关起门来算账，还是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订？这是新泾大队制订规划过程中碰到的另一个问题。过去新泾大队也曾订过两次规划，但往往是少数几个干部拍拍脑袋，拨拨算盘，划划表格。那样的规划，用群众的话来说，不是“飞机上吹喇叭”——唱高调，便是“轮船上装橹”——做样子。这次，多数同志认为，一定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自己来制订，使群众真正成为规划的主人。

群众成了规划的主人，规划的每一项内容，便成了群众自己奋斗的目标。干部有些没有想到的事情，群众想到了；有些本来认为办不到的事情，很快地办成了。例如，这个大队本来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土地，拖拉机不能直接开进去，叫做“有机没有路，爬田要拆路，跨渠费工多，过河要摆渡”。在制订规划的过程中，设想要筑一条贯穿大队南北的农机路干道，再筑一些支路通向每个生产队，然后把弯弯曲曲的灌溉干渠、支渠和毛渠改成地下渠道。但是，这样做，一来工程浩大；二是可能要影响当前生产。因此，有些干部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可是，这个问题交给群众一讨论，社员们说：“把拆老渠、埋暗渠和筑路三件事情并在一起做，用拆老渠的土去筑路，这样人工不就可以大大节省吗？土地还可以多出来呢！”有的说：“要干就在‘三秋’中干，老渠拆掉了以后马上种上麦，保险只有好处没坏处。”社员群众的意见，不但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使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群众路线的教育。

群众成了规划的主人，就能把雄心壮志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使规划更加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现“块

块田里农机到”，要按照机械化的要求把田块来个规格化。但每块田究竟以多大为好呢？讨论中，有的社员主张，田块狭一些，甩秧比较便利。但植保员说，田块大小要考虑到机动喷雾器的有效扬程，约十二米左右。大家决定把每块田定为二十米阔，这样，站在两边田埂上，能把药水打遍整块田。至于甩秧问题，有人说，现在已在推广插秧机，以后就用不着甩秧了。接着，他们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确定了田块的长度。同时，从实际出发，把田块分成两亩、两亩四和两亩半三种。这样既有利于实现园田化，又照顾了实际情况。

订规划需要算账。也只有依靠群众打算盘，才能“打”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来。比如，埋设地下渠道需要瓦筒，是到外面买现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制造？群众算了一笔账：买一只八十厘米的瓦筒要十三四元，自己加工只要八九元；如果再用一部分电石渣现场浇制，全部工程可节约上万元。于是，他们成立了专业队伍，自己动手制造。

远景规划抓得牢 一步一个新套套

有了远景规划，还要把远景规划和短期实施计划结合起来，象大寨大队那样，“一步一个新套套”，保证远景规划逐步实现。新泾大队已经制订了两个短期的实施计划。第一个短期实施计划是，要求在一九七四年完成“六个一”，即形成一条土路基；埋好一段地下渠；开通一条吴家浜；填没一段新泾河；搞好一片园田化；同时在发展生

产的基础上，造好一点新楼房。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这“六个一”在今年四月底就完成了，比原计划提前八个月。紧接着，他们又制订了第二个短期实施计划，要求在今冬明春以前，在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实现“五个化”。两个多月来，这“五个化”的任务有一部分也已经完成。事实证明：这样把远景规划分阶段实施，每一个短期计划都比较具体，看得见，摸得着，容易做到。

制订短期的实施计划，要抓住当前生产上的主要矛盾，争取做到当年受益。这样，既实现了远景规划的一部分，又促进了当前生产。

把远景规划和短期实施计划结合起来，可以进一步调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个大队过去也订过远景规划，因为没有短期的实施计划，结果是：“决心写在纸上，规划贴在墙上”，反而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现在，有短期实施计划，干起来目标明确；计划一完成，群众的干劲就更大了。以埋渠筑路为例，当时正是三秋，劳力紧张。可是，社员们说：大寨贫下中农白天治坡，晚上治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白天战“三秋”，晚上埋渠筑路呢？他们不顾劳累，晚上坚持战斗。在那些日子里，一公里半的工地上，红旗招展，灯火通明，挑担的人群川流不息，越干越欢。短短四十天，共完成土方一万二千多方，投工八千五百多个。广大社员豪迈地说：“愚公移山靠决心，事在人为靠干劲。远景叫它变近景，再苦再累也甘心。”

政治思想要领先 党的政策要落实

制订规划和实施规划，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实施规划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的矛盾。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使制订规划和实施规划的过程，成为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过程。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新思想、新风尚大大发扬。实现园田化，开渠筑路，需要在队与队之间调整一些插花地，或者要个人迁移宅基地、竹园。广大社员为了实现自己的远景规划，自觉地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把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出现了许多动人事例。

群众情绪越是高涨，越要关心群众，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新泾大队在调整插花地，或者移动社员自留地和竹园时，都坚持贯彻执行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而且强调属于集体的要经全体社员讨论，属于私人的要全家思想真通，一般都是经过几次协商。一时想不通的，就耐心等待。有一个生产队长对调整插花地思想不通。大队就暂时不调整，直到后来那个生产队的社员和干部都对队长提出意见，他也真正想通了，主动要求调整时，大队干部才到那个队里去办理手续。对于压坏的青苗，该赔偿的按熟的赔偿；占用土地该在受益队之间分摊的，先达

成协议再动手。有一个社员在竹园旁边种了十几棵树苗，因为筑路需要，要调换一块土地，树苗要移栽或折价赔偿。协商下来，该赔偿十五元，大队立即付给他现金。那个社员很满意地说：“实现远景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贫下中农自己的事情。弄掉一点树苗，大队还这样关心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大队党支部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同时做好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通过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处理，不断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

毛主席说：“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新泾大队的远景规划，每月每季都在显示着它的威力，激励着新泾大队的广大社员不断前进。有个生产队的干部本来觉得，这个规划好是好，就是做起来太费力了，想等人家园田化搞出来看一看，再搞也不晚。可是，先行一步的顾家生产队就在他们隔壁。社员们看到顾家生产队的干部、群众艰苦奋斗，搞园田化，就批评队长说：“你为啥不领着我们搞？难道我们干不了吗？只要你领着干，我们一样能做到！”队长说：“人家顾家生产队是大队的点，当然要先行一步。”社员说：“那你不可以跟着他们学吗？”于是，干部、群众自己动手干起来了。一九七三年冬天，这个队也全部实现了土地园田化。最近，连附近大队有些生产队也在向新泾大队学习，订规划，议措施，要大干快上改变面貌。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现在，新泾大队的广大社员，对前一阶段的工作作了小结，对远景规划又作了修

订,再接再厉,为进一步实现远景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努力奋斗。

中共嘉定县委员会调查组

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 1974—1980 年农业发展规划

(修 订 草 案)

(一九七三年九月制订,一九七四年六月修订)

我们新泾大队全体干部和社员,为着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农业生产,逐步提高社员生活水平,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制订了这个七年规划。

解放以后,我们贫下中农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生产节节高,生活年年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提出的“千斤粮,百斤棉”,“河里蓬蓬蓬(抽水机),田里冒烟囱(拖拉机)”等奋斗目标,现在已经变成现实。我们贫下中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更加提高。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大干社会主义,把新泾大队建成一个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们作出这个一九七四——一

九八〇年发展农业的七年规划,加上每一年的实施计划,可以使大家明确奋斗目标,知道七年中间要干些什么?干到啥样子?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干上一步时要为下一步准备些什么?干劲往哪里使?力量该怎样组织?使大家心往一起想,劲往一处使,努力实现规划中提出的各项指标。

毛主席指出: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我们大队全体干部和社员,决心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争取提前完成七年规划而努力奋斗!

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正确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积极发挥大队一级的作用,领导和帮助各生产队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干部要和贫下中农心连心,年年都要实行开门整风,做到干部群众鱼水亲,社员当家作主人。特别要使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遇到大风大浪脚跟稳,遇到妖风毒雾不迷航,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轨道胜利前进。

二、争取粮、棉、油产量达到“二、二、三”。即到一九八〇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二千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一千三百七十斤增加百分之四十六,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一百七十四万斤(平均每人超过一千斤);皮棉平均亩产达到二

百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一百零二斤增加百分之九十六；油菜籽平均亩产达到三百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九十八斤增加二倍以上。

三、发展以猪为首的多种经营。到一九八〇年，大队、生产队、社员的生猪饲养量达到四千五百头，平均每亩田一点五头，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五；卖给国家肉猪二千三百头，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全大队七个水塘变鱼塘，养鱼八千尾。利用畜牧场空地，种果树二千株，葡萄一千五百株。培育蚌珍珠四十斤。种植蘑菇二万平方尺。积极发展养鸡养鸭。一九八〇年副业收入占农副业总收入百分之二十，变新泾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乡，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

四、实现“四旁”绿化。从一九七四年起，每年在宅旁、村旁、路旁、水旁种树三千株和一批杞柳。一九八〇年，实现“村前宅后种香樟，白榆水杉栽路旁，杞柳种在沟边上，条条大路树成行”。

五、建造高产稳产田。做到“百日无雨不怕旱，暴雨六寸不受涝”。有计划地改造河道，调整水渠，完成新泾、陆泾、横泾、长浜等十一条河浜的填没、疏通、截弯、接通等项水利工程，总共挖（填）土方二十万方。开新河，填老河，增加耕地面积三十亩。

将现有灌溉渠道改成暗渠，埋设地下干渠、支渠一万七千米，其中“平战两用渠”五百米，每个生产队有五十米左右。将现有两个灌区调整为三个灌区，增设一只机口，田间开好埭沟、腰沟、围沟、大明沟四级排水沟。做到沟

渠配套,排灌分开,自立门户,互不干扰。

六、平整土地,实现园田化。将全大队一千八百多块大小不等的田块,因地制宜,分别建成面积为二亩、二亩四、二亩五三种规格的长方形农田一千三百多块(到今春已建成四百多块)。并逐步调整插花田,平整高亢地,以利于水旱轮作和开展科学种田。

七、增积自然肥料。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养猪积肥,种好绿肥,常年沤肥,建立一个机动船队,到上海市区装运杂肥。增加有机质肥料使用量,改良土壤,达到每亩每年施上相当于一百担猪羊灰质量的有机质肥料。

八、大队建立种子基地,生产队建立种子田,培育良种。种子以自选、自繁、自留、自用为主,以调进为辅,重点搞好粮食三熟制高产品种配套,并力争在四、五年内,培育出一两个稳产高产的早稻品种;同时,还要搞好其他品种的稻种提纯复壮,逐步实现良种化。

九、防治和消灭病虫害。力争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和控制水稻的螟虫和纹枯病,三麦的粘虫和赤霉病,棉花的红蜘蛛、红铃虫和立枯病等病虫害。大队坚持多点测报,生产队落实“二查二定”防治措施(查病虫害发育进度,定防治时间;查病虫害发生量,定防治田块)。在一九七四年内做到每五十亩田有一盏高压电网杀虫灯,逐步做到队队建立农药专仓,确保治早、治小、治了,稳、准、狠地消灭病虫害,做到农业产量增上去,用药成本降下来。

十、大队建立“科学种田中心组”,生产队建立“一组(科学种田小组)四员(种子员、植保员、栽培员、管水

员)”。大队和生产队都要种好试验田,摸索增产规律。定期向社员上农业技术课。组织青年社员学种田,练好农业生产基本功,逐步扩大土生土长的农业技术队伍。

十一、进一步提高机械化程度,重点解决拔秧、插秧、收割、耘稻“四弯腰”。到一九八〇年,十一个生产队每个队都有十样机:小型拖拉机、小挂机、拔秧机、插秧机、收割机、耘稻机、开沟机、中耕机、喷雾机、脱粒清扬机等。做到既减轻社员劳动强度,加快生产进度,又做到“季节质量有保证,精耕细作产量增”。

十二、修筑农机通道,调整行人走道,建成经济实用的农村道路网。新筑一条二千六百米长的农机干道贯穿南北,十五条农机通道横贯东西,大小道路兜得转,农机进出不跨田。路上跑农机,路下埋灌渠,便利交通,节省土地。

十三、发展大队集体经济。在今后七年内,进一步办好队办工厂,增加积累,促进农田基本建设。除现有的镜片加工厂、农机修理组和农副产品加工厂外,争取再办一个小工厂,承担为大工业服务的零配件生产。随着机械化的发展,组织多余劳动力办好大队副业。到一九八〇年,大队一级经济的净收入,从一九七三年的二万元提高到十五万元。

十四、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社员收入。到一九八〇年,社员集体分配收入,从一九七三年每人一百七十六元增加到二百三十元。

十五、逐年增加粮食储备。到一九八〇年,全大队

确保储备粮食一百二十万斤，足够全体社员吃一年半。经常向社员进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的教育，提倡家家户户储备粮食。

十六、办好大队商业。到一九七五年，在大队所在地——新村，开设一个综合性的代销店，进一步办好现有的“五匠组”（泥、竹、木、理发、缝纫），方便社员，有利生产。

十七、逐步改造旧宅基，建立新村庄。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社员家庭住房。

十八、普及中学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过去，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使一部分贫下中农受不到教育。我们大队目前还有成年文盲一百九十五个。以政治夜校为阵地，采取一教一，一帮一，平时不放松，冬季集中抓的办法，到一九七六年，全部扫除青壮年社员中的文盲。今后新农民普遍达到中学文化水平。

十九、除害灭病，提高社员健康水平。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个个爱清洁的良好习惯，队队达到“卫生村”水平。普及卫生知识，基本上消灭“四害”（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家家饮用井水，全大队三百七十四户，平均二户半有一口井。户户粪便入池，全大队三十七只化粪池，都要提高发酵沉卵水平。坚持反复查螺灭螺，查病治病。加强粪水管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血防成果，不断降低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

二十、进一步搞好合作医疗，巩固和发展“赤脚医生”的队伍。充分发挥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的作用，积极开展群防群治，勤俭办合作医疗。队队建立卫生室，大队

办好卫生所,设立简易病床,逐步减少收费标准,扩大报销范围。到一九八〇年,每人每年交纳合作医疗基金从现在的二元减到一元,报销金额从现在的三十元扩大到六十元。

二十一、认真做好妇幼保健工作。队队办好农忙托儿所,分片办好幼儿园,切实做好女社员的“四期”(经期、怀孕期、产假期、哺乳期)卫生工作。

二十二、活跃社员业余文体生活。到一九八〇年,逐步实现每个生产队有一个文化室,一架电视机,一个篮球场(利用仓库场地);大队有业余文艺队、体育队、文化室(包括图书室在内)。

二十三、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进一步宣传晚婚和计划生育的意义。继续抓好发药员队伍,发动社员自觉订好晚婚计划和节育计划。今后的人口出生率,继续保持在千分之十左右。

二十四、培养贫下中农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把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大批判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到一九八〇年,每个生产队形成一支五至十人左右不脱产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要求成为“政治夜校的辅导员,报纸广播的通讯员,贯彻政策的宣传员”。紧密结合批林批孔运动,系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积极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深入开展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抵制“四旧”。

二十五、加强大队民兵连建设。根据“劳武结合”的

原则,不断巩固和发展民兵组织,切实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要积极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和战备观念,提高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做到平时保卫集体经济,监督和改造四类分子;战时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胆敢入侵之敌。

二十六、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不但要工作好,而且要劳动好。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天数,全年不少于一百二十天。生产队干部要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

二十七、对本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的执行情况,每年春节前后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检查一次,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以利再战。

我们实现了三年治水改土规划

我们古松公社地势低洼，河道淤浅，水流不畅。全公社四万一千多亩耕地，有八千多亩是有名的“烂柳荡”。解放前，这一带的贫下中农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九年三熟烂柳荡，大雨一下白茫茫，丰收年成吃粥汤，歉收年成去逃荒。”解放后，主要是人民公社化以来，逐年治水改土，水利条件逐步有了改善。但是，由于当时缺少一个整体规划，治水改土工作只是东一锄头，西一铁镢，截截堵堵，修修补补，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九七〇年九月，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高潮中，为了彻底改变落后面貌，我们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制订了一个治水改土的三年规划。从一九七〇年冬到一九七三年冬，经过三年奋战，全公社新开河道五十三条，填没老河一百八十条，修筑拖拉机路一百二十五公里，新建改建灌溉渠道、排水沟三百九十五公里，平整耕地三万多亩，总工程量达二百七十八万土方，平均每个劳动力挖土一百九十方，比一九五八年冬至一九七〇年春十二年治水改土的土方总和还多八十万土方。现在，三年治水改土规划已经实现。今日的古松，河道整齐，绿树成行，耕田格子化，道路、桥梁连成一气，拖拉机、劳动车畅通无阻，半数以上的耕地排

灌自立门户，做到旱来能灌，涝来能排，抗灾能力大大提高。全公社粮食常年亩产量，一九七三年达到一千三百四十六斤，比治水改土前的一九六九年增加二百三十斤。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千年老河让了路，百年老坟搬了家，古松面貌变了样，大寨红花遍地开。”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制订长期规划，指出：“**这种计划的用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回顾我们三年来制订和实现规划的过程，就是先进思想不断战胜保守思想的过程，使我们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通过规划的制订和实现，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了。还在一九七〇年“三抢”刚结束，当公社党委开会检查总结工作，提出治水改土大干一场的打算时，就有一些同志，特别是位于高塘田的队干部表示反对。他们担心大干“太冒险”，弄得不好，几年来辛辛苦苦搞上去的产量要下降，收入要减少。

究竟是迈开大步大干，还是停留在前几年的做法上小干？我们组织大家同大寨大队比，同别的先进单位比，对照自己找差距，激发起学先进赶先进的革命干劲。许多同志说：“大寨年年大干，面貌年年大变。我们学大寨，就要学习大寨大干苦干的革命精神。”“大寨大队贫下中农依靠毛主席革命路线，搬石头，移山头，人工造出平原。我们同样可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开河挖土，人工造出高塘田来。”后来，我们又把这个问题拿到贫下中农中去讨论，许多贫下中农尖锐地向我们指出，先进单位就

是先进在思想新,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年年有创新。我们古松这几年面貌改变不大,就在于干部思想上“古”,行动上“松”。他们一致提出:“大寨贫下中农能治山,为什么我们古松贫下中农就治不了水?”通过这一场大讨论,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思想政治路线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大干争取大胜利的先进思想得到了大发扬,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的市场大大缩小了。

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党委领导干部走出办公室,和生产队、大队干部一起,同贫下中农相结合,踏遍了全公社十九个大队,对每一条河道、每一个圩区进行调查勘察,广泛听取老农的意见,前后三个月,制订了一个治水改土的三年规划草案。当我们把这个规划蓝图发到全公社生产队进行讨论和征求修改意见时,广大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这个规划使我们逐步看到社会主义的前景,心胸更加开阔了,做生活更加有劲了。”

但是,规划制订出来了,并不等于先进思想同保守思想的斗争已经解决了。在实现规划的过程中,这两种思想的斗争还会不断地表现出来。记得我们治水改土规划搞了一年以后,有人提出,这样连续搞三年,“太紧张了”。他们主张工程要停一停,人要歇一歇。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爱护群众”,才叫做“有群众观点”。究竟应不应该坚持大干?怎样才真正反映群众的愿望,爱护群众的积极性?我们通过总结工作,组织干部进行了讨论。

在实现治水改土规划的第一年中,开挖古浦塘这件事给大家很深刻的教育。这条主要河道,计划全长三

千八百米，宽二十米，需挖土十八万方，按每人每天一个土方计算，六千个劳动力上工地，一个月才能完工。但是，计划一到了贫下中农手里，大家满怀着“建设古松新水乡，誓对人类多贡献”的革命豪情，一再修改工期，第一次缩短到二十天，第二次又缩短到十五天，最后，六千个社员，起早摸黑，大干、苦干加巧干，只花了十二天就完工了。“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古浦塘的提前修成，是对林彪、孔老二一类骗子污蔑群众是只关心“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的“小人”的最有力的批判。这个生动的事例，也帮助那些怕群众“紧张”的同志克服了保守思想。究竟谁怕紧张？你看，在各个开河工地上，日里一片人，夜里一片灯。原来规定哨子一叫、广播一响就出工，现在，不等哨子吹，广播响，社员早已起早摸黑上工地了。在许多工地上，干部要一再吹哨子，几次三番催促，社员才肯收工回家。这说明，紧张战斗，改变面貌，才真正代表了群众的愿望，而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起来的时候，主张停一停、歇一歇，变大干为小干，那才是脱离了群众，是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

在实现治水改土规划的过程中，我们还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集中起来，就是连续大干水利建设，怎样做到不影响当年生产，不减少社员个人分配，怎样正确处理全公社的整体利益和各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局部利益的关系。

我们治水改土，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地力，更加迅速地提高产量，巩固壮大集体经济。三年来的实践也告诉我

们：只要认真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性，这些目的是完全能够达到的。三年中，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教导，努力做到边开挖新河，边平整土地，尽可能使水利建设在当年发挥效益，避免荒废土地。在劳力的安排上，除由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带领主要劳动力投入治水改土斗争第一线外，同时，留下部分干部分工抓冬季的田间管理工作。遇到需要突击施肥、防治病虫害和开沟排水时，就从治水工地抽调劳力，做到统一调度，既确保治水施工，又不误农时。在三年治水改土工作中，全公社粮食常年亩产量逐年稳步提高，总产量除一九七一年有所下降外，一九七二年比一九七〇年增产四十四万斤，一九七三年又比一九七二年增产一百零六万斤。社员平均个人收入，一九七〇年为一百二十元五角，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三年中，分别提高为一百三十一元七角、一百四十八元四角和一百三十七元五角。

在开挖新河的过程中，往往有个别生产队当年被挖废的土地较多，甚至需要占去部分好田。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组织这些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要提倡顾全大局”的教导，摆正生产队的“一着棋”和全公社“一盘棋”的关系，自觉地保证治水改土规划的实现；另一方面，我们又充分发挥人民公社大集体的优越性，组织生产大队对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支援，保证他们不减少甚至增加收入。

我们公社的永利一队，按照规划，新开河道中有古浦

塘和三号河、四号河需要经过这个生产队，约需挖废土地五十多亩，相当于这个生产队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这个开河工程搞还是不搞，对这个队的生产和社员生活确实关系很大。但是，当全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反复讨论了开河方案，了解到这个工程完成后，虽然自己损失了五十多亩土地，换来的却是六个生产大队一万一千多亩易旱易涝田可以变为旱涝保收田，多数人就一致认为：“这三条河应该开。”但是，有些同志又提出，能不能改变新河道的走向，让其他生产队共同分担一点损失？于是，我们就组织永利一队和有关生产队的干部一起勘察现场，重新讨论河道走向。结论是，如果改变新河走向，永利一队虽然可以少挖废十几亩土地，但是却要拆迁国家粮库，还要拆迁兄弟队的一个村庄，损失就更大了。这同维持原方案，挖废永利一队五十亩土地相比，“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永利一队的同志也说：“我们总不能想着芝麻，丢了西瓜。”这样一比一算，永利一队的干部思想通了，决定按照原规划开挖新河。但是，一个生产队一下子挖废五十亩土地，对于这个生产队的生产和社员收入的影响确实是太大了。许多生产队的干部在讨论开河方案时一致提出：“永利一队为保证全局，牺牲自己，发扬了龙江风格，我们可不能眼看着他们遭受损失。”于是，大家在开挖新河的同时，组织一部分劳动力帮助永利一队填平老河，平整土地，从中补回来三十五亩耕地。大家还一致同意，多分配给他们一定数量的肥料，安排十个劳动力分别到社办和大队办的企业工作。一九七一年，即在永利一队

境内开挖新河的第二年，永利一队粮食持续丰收，常年亩产量不仅没有降低，还比上年增加五斤八两，社员个人平均分配收入也比上年增加一角。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产量和社员个人分配收入继续提高。社员高兴地说：“治水改土是百年大计，近看是损失，远看却是造福。”他们治水改土也更自觉、更积极了。

我们经过三年治水改土战斗，生产面貌虽然有了改变，但还是很初步的。为了把我们全公社四万一千亩耕地全部建成为“稳产高产田”，夺取更大的农业丰产，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努力去做。就拿治水改土工作来说，也仅仅做了农业“八字宪法”中水、土两字的部分工作，水利的配套工程还不齐全，土壤也还有待继续改良。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批林批孔，促进农业生产，并且依靠广大社员群众，制订一个十年的长远规划，使“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健康深入发展。我们要把规划工作看作是对广大社员进行共产主义前途教育的一个有力的措施，以进一步调动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争取古松公社和全国各地一样，面貌一年一年地起变化，努力做到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把古松公社建设成为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共松江县古松公社委员会

发展大队集体经济，促进农业大上快上

——嘉定县方泰公社向阳大队的调查

嘉定县方泰公社向阳大队，是一个田多劳力少、生产条件差的大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个大队的干部、贫下中农，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在加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同时，积极发展大队集体经济，有力地改善了全大队的农业生产条件，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七三年，全大队粮食总产二百五十三万七千多斤，比一九七二年增产四十三万三千斤；一九七四年夏熟又获丰收，粮食总产、亩产均比一九七三年同期增产七成以上。社员说：“过去不少事情想到办不到，大队经济发展后，现在办到了。”

发展大队经济，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促进农业大上快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需要。向阳大队的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逐步认识了这一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革命和生产的发展，常常碰到这样一些问题：一是有些需要大队统一筹集资金才能办理的事情，如造桥、筑路、修渠，

以及添置在大队范围内使用的机械设备等等，因为大队经济不发展，就不能及时办到；二是随着生产队拥有的农业机械数量的增加，对于农机的维修保养，一个生产队很难担负起来，如果都集中到公社，公社修配站也负担不了，需要大队发挥作用；三是这几年来，各生产队的生产虽有很大发展，但不平衡，穷队和富队差距较大。要帮助穷队赶上富队，也需要大队加强工作。为此，大队党支部组织干部、群众进一步学习了《六十条》，加深了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理解。大家认识到：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是一个整体，既实行分级管理，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大队经济发展后，可以兴办生产队难以办到的事情。因此，必须克服“大队是个空架子，无所作为”的思想，自力更生，积极发展大队经济，从物质上、技术上加强对生产队的支援，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思想认识提高后，他们根据发展大队经济不能削弱农业，不能增加生产队负担，不能向上伸手的原则，明确要为农业办企业，要自力更生办企业。一九七一年以前，大队只有畜牧场和粮食加工厂两个企业，一九七一年以后，陆续兴办了竹、木、缝纫以及钢丝弹簧等企业，积累不断增加。一九七三年，全大队七个企业，产值二十九万多元，积累资金十一万六千元。而大队企业人员仍然控制在一百二十人左右，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一。

大队经济发展后，怎样支援农业？开始，有人认为大队钞票多了，可以免费供应生产队农药、化肥，年终分配，每个队拨几千元给社员分分。有的主张由大队把穷队欠

的债还清。党支部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批判了“重工轻农”思想，并开展了“怎样支援农业”的讨论。使大家认识到：支援农业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有利于发扬社员自力更生的精神，而不能“大队出钱，社员种田”，不能把大队企业的积累变相分给社员。因此，他们认为发挥大队经济作用的正确途径是：在充分发挥生产队积极性的基础上，围绕农业增产的一些关键性措施，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入手，支援生产队，促进农业大上快上。几年来，他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办了一个种子仓库。毛主席指出：“有了优良品种，即不增加劳动力、肥料，也可获得较多的收成。”一九七二年以前，这个大队的种子混杂，种的作物常常高低三层楼，公孙四、五代。特别是扩大粮食三熟制面积以后，光早稻、后季稻就有十几个品种，由于场地小，仓库小，更容易发生种子混杂、茬口搞错、品种配错等生产事故。如西黄生产队把“军工一号”晚粳误作早稻育秧，结果两季稻只种了一季，全年粮食减产一万七千多斤。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大队党支部吸取了历年来种子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建立了一支以大队粮管员、种子员为主，生产队种子员参加的专业育种队伍，坚持“四自”（自选、自繁、自留、自用）、“一辅”（辅以调种）方针，拨出八千多元，自力更生建造了七间（二百多平方米）种子仓库和三百多平方米的水泥场地，配备了三名有经验的老农，负责育种、选种、翻晒、保管、除稗、去杂、药物处理和发芽试验等工作。

大队统一管理粮食种子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是提高了种子纯度。种子发芽率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播种后长势均衡。二是节约了大量种子。一九七三年，早稻每亩实际用种量由一九七二年的五十八斤下降为三十三斤，一熟就节约种子二万四千斤。三是推动了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的开展。大队种子仓库和良种繁育基地成了大队、生产队科研小组的活动场所，大队种子员和生产队种子员一起选留种子，一起种试验田，检查考察，不断摸索各种品种的生长规律，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社员群众反映：“种子仓库实在好，统一保管专人搞，种子纯度大提高，品种茬口算得好，霉烂变质浪费少，高产稳产更牢靠。”

二、搞了一点水利建设。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个大队原来水利条件不好，有的河道开不进农船，雨涝排不出积水，灌溉渠道严重漏水，对农业增产带来很大影响。但是，搞水利建设需要一笔经费，单靠生产队不好解决，在大队经济没有发展以前，由于集体积累不足，想得到，做不到。大队经济发展以后，对兴修水利作了统一规划，由大队拨出资金，筹集物资，组织劳力，经过两个冬春的大干苦干，全大队先后开了三条河道，二十三条大明沟，把一百多亩高亢地改造成为水田，基本上做到了小沟通明沟，明沟通河道，雨涝排水快，百日无雨不成灾。例如，一九七二年春天，大队拿出二千多元资金，统一组织全大队的力量，填平了原来的蛇长浜，开拓了一条笔直的新河，取名向阳河，使东黄等四个生产队三百多亩农田的水

利面貌大大改变。原来这里种水稻每亩最多只能收三、四百斤，而一九七三年早稻一季就超了《纲要》。群众高兴地说：“向阳河开得直瞄瞄，蛇长浜河道平整好，不怕天旱和雨涝，积肥运输便当了，丰收基础打得牢。”

三、建立了一个专业运肥队。城市垃圾、黑泥等杂肥是郊区农村搞好农业生产的重要肥源。过去，生产队都各自用农船装运，由于路途远，一次运八到十吨垃圾就要派四个强劳动力，花上五、六天时间才能运回。条件较差的队由于没有大船，就不能远出装运；有的虽有大船，一到农忙，劳动力紧张，外运肥料也只好停下来。大队经济发展后，为了支援生产队，适应农业进一步增产的需要，购置了两艘拖轮，配备了八十吨船皮，成立专业运肥队，坚持常年装运。外出时为生产队运输农副产品，回来就装运肥料。每次往返时间由原来的五、六天缩短为二、三天，每吨肥料平均花费的劳动力和费用，均比生产队自运节约一半以上，即使大忙季节，也能坚持运肥。专业运肥队成立以来，每年为生产队装运城市垃圾、黑河泥等杂肥五千多吨，平均每亩地达到一吨半以上。运肥任务由大队统一经营后，减轻了生产队外运肥料的压力，生产队就可以腾出农船和更多的劳力就近鬻泥、割草，增积更多的有机质肥料。这就大大提高了施肥水平，改良了土壤，增强了地力。

四、组织一支植物保护队伍。病虫害是农业增产的大敌。要夺取农业高产稳产，必须十分重视植物保护工作。原来，生产队防病治虫都是用背包式喷雾机，射程

短,工效低。机动喷雾机射程远,工效高,但价格也高,操作技术较复杂。如果一个生产队买一台,有的队底子薄,买不起;有的队虽买得起,但利用率不高。而且,一旦发生故障或损坏,生产队又不易修理。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大队从积累中拿出一笔资金,先后购买了八台机动喷雾机,由大队统一经营。每台机配备两个人,建立大队植保组,由大队棉管员具体负责。植保队伍根据虫害状况,有任务时召之即来,无任务就回队劳动。大队农机修配站还配备一名机修工随机参加劳动,随时排除故障。实践证明:这样做的好处很多,过去遇到大忙季节,生产队只顾抢收抢种,往往忽视了植保工作;现在大队有了植保队伍,又调动了生产队植保人员的积极性,大忙中坚持巡回观察,掌握“敌”情,发现虫害,随时迅速歼灭。过去,有些生产队不管有虫无虫,只要上面号召治虫,就普遍打一次药水,不但增加农本,有的还造成药害;而遇到突发性虫害时,由于来势猛,发觉迟,加上背包式喷雾机工效低,常常不能及时歼灭。现在植保队伍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防病治虫,而且机动喷雾机由大队统一经营,统一调度,可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如青石桥生产队,一九七三年早稻纵卷叶虫突发,在这紧要关头,生产队植保员向大队作了紧急报告,大队立即调动了四台机动喷雾机,对六十多亩早稻打了三个小时的歼灭战,很快扑灭了虫害。此外,大队统一经营机动喷雾机,还可以专人维修保养,掌握性能,减少损坏,降低成本。

五、设了一个农机修配站。“有新必有旧,有旧必有

修”。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在农机修理上出现了新的矛盾。有的生产队不注意农机的维修保养，又缺乏技术设备，修理费用很大，造成农本增加和农机利用率不高的现象。有的社员说，没有机器想机器，有了机器愁修理，买得起修不起。如朱弯生产队一台机动喷雾机，由于没有专人使用保养，经常损坏，两年内先后到上海市区工厂修理达二十多次，单修理费就花掉七百多元。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大队坚持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建立了农机修配组，培养四名青年社员当机修工。通过学习和实践，迅速掌握了技术。现在大队农机修配组已做到小拖拉机、水泵、拖轮中修不出大队，脱粒机、机动喷雾机等大修自己干。修理费用也相应减少。

大队经济的发展壮大，为生产队办了不少好事，有力地促进了生产队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大队抓了以上几项关键性的增产措施，加上对某些穷队作了适当的照顾，使各队原有生产条件的差距不断缩小，穷队的生产面貌也迅速发生变化。前几年，县、社两级在开河、筑路时穿过青石桥生产队，把该队二十多亩水田搞成了高亢地和零星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逐步变成了穷队。大队党支部看到这些问题，就在肥料、机械、资金等方面作适当支援。先后派出拖拉机和该队社员一道平整土地。大队运肥组在分配大粪、垃圾、黑泥等肥料时，也给以适当照顾，帮助他们改良土壤。青石桥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也进一步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发展养猪、广积肥料、精耕细作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切实措施。一

九七三年“三抢”结束后，他们组织了一支积肥专业队伍，连续割青草达两个月，积肥约二千多担，使今年夏熟作物获得了增产。现在，这个队的面貌正在不断发生变化。又如龙里生产队，原来农田基本建设进展不快，部分土地七高八低，灌溉渠道漏水严重。一九七三年冬天，大队抽出一部分企业职工，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和龙里生产队社员一起平整土地，使五十多亩高低不平的坟窝弯、宅基地实现了园田化，并且还埋设了地下渠道，改善了田间水系，促进了农业进一步增产。一九七三年该队粮食增产达五万七千多斤，社员分配从一九七二年每人一百二十八元上升到一九七三年的一百三十四元。现在，全大队各生产队之间社员分配水平的差距，已由原来的四、五十元缩小为二、三十元，促进了整个大队集体经济的共同富裕。

向阳大队在发挥大队一级的作用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积极地以一分为二的观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针对存在的问题，发动群众讨论，并制订了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〇年的远景规划。他们决心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以批林批孔为纲，以大寨为榜样，在发展生产队集体经济的同时，积极发展大队经济，更好地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毛主席发出“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已经十六年了。十六年来，我们公社的农副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一九七三年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相比，全公社粮食常年亩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农副业总收入增加百分之八十九。在毛主席提出的“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方针指引下，社员每人平均分配收入比高级社时期提高一点二五倍。如果加上家庭副业收入，全公社社员的平均收入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单干时本地富裕中农的水平。

在使全公社社员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过程中，扶助穷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公社的一百六十五个生产队中，有四十个穷队，其中有半数集中在三个大队里。这些穷队的生产发展和社员平均收入，都大大低于全公社的平均水平，积欠的国家贷款也长期无力偿还。手心手背都是肉，贫下中农一家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应当积极扶助穷队，使它们迅速改变原来的落后面貌。

但是，在怎样帮助穷队提高生产和收入水平的问题上，我们曾经走过一段不小的弯路。穷队为什么长期穷？

过去我们的眼睛里头只是看到他们生产条件差，扶助穷队也总是从经济上考虑比较多，给钱、给东西，安排他们种慈姑、茭白等收入比较高的作物，或者安排部分劳动力参加城镇运输，增加他们的劳务收入。谁知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反而助长了有些干部向上伸手的懦夫懒汉思想，穷队的面貌还是改变不了。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实践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有用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去武装穷队，帮助他们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才能真正扶助穷队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发展中逐步发现，全公社四十个穷队之所以穷，除了八个队是由于底子薄或者经营管理不善以外，有的是由于领导干部软弱无力，抓不起工作，有的是由于干部作风严重不正，队里资本主义倾向严重，个别队则是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总之，在这些穷队里，领导权没有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群众手里，没有确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光从经济上去帮助，不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是决不能够改变穷队的落后面貌的。

从路线上去看问题，就抓住了纲。我们结合清队、整党和一打三反运动，组织干部到穷队深入发动群众，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调整和充实领导班子，加强政治思想工

作，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这样一来，这些生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普遍扬眉吐气，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发扬起来了。我们公社有一个东叶厓大队，是个有名的穷队。一九六二年，这个大队粮食平均亩产只有六百三十五斤，年终分配时拿不出现金，七个生产队的生产资金，都靠国家贷款。到了一九六五年，全大队累计积欠国家贷款三万七千多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天还是这样的天，地还是这样的地，但是贫下中农和干部的精神面貌变了，他们团结起来，奋战了三年，一九七二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二百四十二斤，比一九六五年提高百分之三十一，比一九六二年提高一倍；社员平均分配收入也比一九六五年提高百分之五十，比一九六二年提高一倍以上，一九七三年又有所提高。这个大队长期积欠国家的贷款也已基本还清。看，路线端正了，面貌的变化就有多么大啊！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不会停息的。根据我们的体会，只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才能使全体社员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过去，东三大队有些干部总认为自己的队“条件差，底子薄，靠增产粮食富不了”。一九六九年，当粮食亩产已经从一九六五年的六百七十八斤提高到一千零一十五斤的时候，大队党支部的某些同志为了加速改变原来的穷队面貌，动用部分储备粮来多养鸭，还要求国家让他们少种一点粮食，多种一点西瓜、慈姑。“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干部看

支部”。党支部执行路线一偏，资本主义倾向就开始抬头。有些人为了投机倒把，大养群鸭、大养槽头猪；有些人割草晒干，高价出售。这股歪风一刮，不少人就不大关心集体了，参加集体劳动不如过去积极了。这样做，穷有没有变富呢？那些靠歪门邪道赚钱的人是富了，有的一年就赚了一千多元。但是这在全大队二百六十三户中只占十户，而整个东三大队一九七一年粮食平均亩产又下降到九百七十五斤，集体副业纯收入减少了四万多元，使这一年每个社员的平均分配收入比上一年减少了四十元。毛主席早就指出：“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许多贫下中农看到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造成的恶果，对干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说：“不讲路线只讲钱，陷进泥坑真危险。”东三大队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通过批林整风，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自觉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他们一面大力治水改土，大积肥料；一面积极发展集体养猪，广种杞柳，大搞集体副业。第二年粮食平均亩产就达到了一千一百六十三斤，社员个人分配收入提高到一百五十六元。穷队粮食普遍增产，其中有半数生产队的粮食增产幅度超过公社平均增产数的一倍左右。

穷队面貌的改变，主要是个路线问题。我们在帮助穷队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思想的同时，在可能的条

件下,也为穷队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加速他们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步伐,以进一步体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从我们公社许多穷队的情况来看,自然条件的确比较差。我们公社有一半耕地是低荡地,在这些穷队里就特别集中,解放前是“大水一来白茫茫,九年三熟六年荒”。在农业合作化时期,社小力量小,只能筑堤修圩挡挡潮汛,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易涝的局面。人民公社化后,单靠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力量也很难办到。现在,我们公社、生产大队两级集体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就可以把人民公社三级集体经济的力量拧成一股绳,统一规划,大规模地治水改土。一九七〇年春,我们组织五千多人,奋战二十五天,挖土二十八万方,开出了一条长达五公里的大河。连续三个冬春,开挖新河十八公里,挖土一百九十万方。十三年来,单是公社兴办的水利工程,就有九座水闸,四十一处电灌站,五十六顶桥梁,圩堤用石块水泥板护坡十五公里。这些工程所需资金,除由国家投资百分之五十七以外,其余部分的百分之七十由公社和生产大队承担,只有百分之三十由各个生产队分摊。这些水利工程竣工后,在抗旱、排涝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益。过去许多低洼地只能赶在大潮汛以前种一熟早稻,现在一熟变三熟。这对穷队面貌的改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东叶库大队由于扩大了三熟制,加上三百多亩原来被水淹没的蒲草荡改造成为粮田,粮食产量从一九六二年的七十六万斤提高到一九七三年的一百七十二万斤,增加了一点二五倍。

穷队底子薄，积累少，要购买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以及举办多种经营和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时，往往一时拿不出许多资金。这几年，我们公社、大队两级企业发展后都有了一些积累。因此，除了国家贷款以外，我们还可以从这些积累中抽出一笔钱，无息贷给穷队。当年无力归还的，允许在二、三年或四、五年内还清。穷队要造林、种杞柳、养猪，大队企业还以临时周转的形式给他们树苗、柳条和仔猪，积极扶持他们发展副业生产。随着穷队生产的发展，现在已经不要国家再增拨信贷资金了。在全公社的范围内，从公社积累中提供的无息贷款，也从一九六五年的十二万元减少到现在的五万元。

生产队内一般都有少数经济比较困难的社员，我们有责任去关心和帮助他们。这些困难户人口多，劳力少，分配收入低，一旦发生疾病等意外事故，就需要从生产队的公益金中给以适当补助。这在富队比较容易解决，但在穷队就比较困难了。我们为了帮助穷队的困难户克服困难，充分运用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许多大队办的副业企业都尽可能吸收这些困难户中的半劳动力去担任他们可以胜任的工作。四农大队有个穷队，有三户困难户，一九六九年透支金额达到五百五十四元。后来，大队企业吸收了困难户中病残体弱的人去工作，使这些困难户不仅不再透支，还归还了透支款四百六十二元，有一户一九七二年还分得了现金一百八十四元。这样一来，困难户改善了生活，生产队也因此减轻了经济负担，可以积累更多的资金来发展农副业生产。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从我们公社范围来看,原来意义上的穷队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生产大队和生产大队之间、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还存在着富裕程度的差别;而且,原来的穷队赶上来了,原来的富队有的却又相对地显得落后了。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农村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将始终存在,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我们坚信:只要坚持这样去做,就一定会建设起一个越来越富裕、越来越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共青浦县练塘公社委员会

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宝山县吴淞公社张建浜大队实现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调查

张建浜大队靠近吴淞工业区。全大队三百九十三户，一千三百七十五人，集体耕地一千一百九十四亩，平均每人只有八分多土地，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大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张建浜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农业、畜牧业、林业、副业都有较大的发展。一九七三年，粮食亩产翻《纲要》，达到一千六百八十七斤，比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前几年，张建浜大队每年还要国家供应二十多万斤统销粮，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实现口粮、种子、饲料“三自给”，还积累了二十七万斤储备粮。在“以粮为纲”，搞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多种经营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开展起来了。现在，有养猪、养羊、养奶牛、养鸡、种蘑菇、种葡萄、缝纫、编制柳条箱、榨菜加工等十来个项目。一九七三年，养猪已达到每亩一点三头。这几年，利用“四旁”种植了白榆、水杉、泡桐和槲树五万八千多棵，平均每户一百

五十棵。

随着粮棉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全面发展，张建滨大队卖给国家的农副产品越来越多。一九七三年，全大队上市肉猪八百七十五头（平均每头重一百四十一斤），鸡五千只，牛奶七万二千斤，水果十三万七千斤，榨菜六百担，柳条箱一万二千只。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集体收入也逐步增长。一九七三年，全大队农副业总收入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三，其中多种经营收入（不包括薄荷、果园）占农副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九。一九七三年，社员平均每人收入已达到一百九十九元。

张建滨大队的实践证明，在地少人多的地区，同样能够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为社会主义作出较大的贡献。

分清路线，摆正位置

要实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首先必须深入开展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过去，在刘少奇、林彪一伙的“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这个大队多种经营的方向一度曾走上邪路，集体养猪的数量一度急剧下降。毛主席关于“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能很好得到贯彻。有一年，张建滨大队为了增加经济收入，不按照国家计划，扩大了草莓种植面积，影响了粮食生产；后来，又片面吸取教训，把国家分配的草莓面积全部砍掉了。这说明，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

正主义路线对张建浜大队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张建浜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断开展革命大批判，从而，对这个伟大方针开始有了正确的理解。大家联系本大队实际，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放松粮食生产，片面追求经济收入，就要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或者，忽视了多种经营，集体经济不能迅速发展，阶级敌人就会趁机兴风作浪，引诱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因此，执行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就不单纯是一个生产安排问题，而是执行什么路线，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

张建浜大队党支部还以政治夜校为阵地，经常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克服在对待农副业关系上的形而上学观点。以前，有些干部只看到农副业生产相互矛盾的一面，看不到相互促进的一面。因此，在规划和组织生产时，往往出现“翘翘板”的现象：经济收入减少了，赶紧抓一抓副业；副业上去了，农副业生产之间有了一点点矛盾，又急忙压缩副业。通过学习，弄懂了以粮为纲，以农带副，以副促农的辩证关系，就能够用积极平衡的态度，来安排农副业生产。譬如，张建浜大队第一年种植榨菜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收获榨菜时，正好是“三夏”大忙季节，而且要把榨菜运到二十多里路外的顾村加工，白天收，夜里送，劳力更紧张，对农业生产有影响。面对这个情况，他们没有简单采取砍掉榨菜的办法，

而是自己办了榨菜加工场,做到就地生产,就地加工,社员白天参加大田劳动,晚上突击加工榨菜。这样,不但没有影响粮棉生产,而且因为榨菜的茎叶都是好肥料、好饲料,还大大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

因地制宜,挖掘潜力

张建浜大队的广大干部和社员决心在狠抓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开展多种经营。但是,具体搞哪些项目呢?一开始也是有争论的。

一种意见是:张建浜地少人多,土地已经种尽,再种种不下;猪也已经养足。唯一的出路是到工厂当临时工,搞劳务收入。另一种意见是:我们这里土地确实少一点,但潜力并没有挖尽;劳动力多,正是个有利条件。发展多种经营,要同农业有关系,要带着一个“农”字,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

后来,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教导,统一了认识。决定充分利用本大队的自然资源,挖掘土地潜力,积极发展种植业和“四旁”绿化,并以种植业带动畜牧业和农村加工工业,更多地创造物质财富。

例如,他们过去不敢把杞柳种在圩堤渠道边上,怕影响水利工程。后来经过实践,证明杞柳可以保护圩堤渠道,就大量种植起来。目前,全大队插种杞柳折合面积有

四十亩左右。他们利用果树冬季落叶的规律，在果园里见缝插针，套种榨菜，冬种夏收，林副两旺。一九七〇年，苏家、姚家两个生产队，还在拖拉机干道两旁搭起棚架，种上葡萄，向空间发展，第二年就收入七百元，一九七三年收入增加到五千多元。种了杞柳和榨菜以后，柳条加工场和榨菜加工场等队办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

张建滨大队的干部、群众都体会到：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潜力是很大的。张建滨大队虽然土地少，劳动力多，周围又有几个大工厂，但他们主要不是依靠劳务收入，而是靠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来增加集体财富。在这里，土地少，已不算什么困难，劳动力多，更不是一种负担。党支部的同志信心十足地说：“即使再增加两三百个劳动力，只要坚持正确的方针，就有办法让社员年年增加收入。”贫下中农也高兴地说：“多种经营潜力大，劳力土地巧安排。‘四旁’‘十边’种到家，空间也要利用它。集体经济大发展，公社盛开大寨花。”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粮食产量要上去，多种经营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革命干劲，去不断改变生产条件。

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先后在张建滨大队征用了八百亩土地。这样一来，不但土地面积减少了，而且剩下来的土地，大都高低不平，适宜种水稻的只有三百多亩。粮田少，社员一部分口粮要靠国家供应，更

谈不上留出更多的饲料,来发展畜牧业。因此,要实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关键在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把全部土地改造成为宜粮宜棉、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张建浜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以大寨为榜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积极投入治水改土的斗争。他们白天狠抓当年增产措施,晚上大搞平整土地。农忙抓紧收、种、管,农闲改造河、路、桥。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奋战三年,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重新进行了整理,平整了二千多个坟丘,开挖了六条新河,填没了十六条老河,建造了七座农桥,埋设了一千五百多公尺的地下渠道,实现了“削平高地能种稻,垫高低田能种花”,土地格子化,水利系统化。同时,通过平整土地,还扩大了耕地面积二十亩。这样,粮棉轮作容易安排了。一九七一年做到了口粮、种子、饲料“三自给”。这就为发展多种经营创造了物质条件。

多种经营开展起来了,需要一批批树苗、猪苗和菌种。怎样解决呢?张建浜大队同样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多种经营。以前,全大队绿化需要的树苗,都要向外面购买,每年要花三、四千元,有时还买不到;从一九七二年起,有五个生产队利用“十边”地办了苗圃,每年可以提供树苗五千多株,基本上满足了大队植树绿化的需要。大队和生产队养猪场,除了采购少量优良猪种外,其他猪苗都是自己繁殖的。大队土农药组每年培育蘑菇菌种三千瓶,实现了菌种自给。这几年扩建的猪棚和蘑菇棚,也大都是利用废旧材料,自己动手解决的。

统筹兼顾，全面规划

实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经营的项目多了，摊子大了，更需要制订全面规划，来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一九六九年，张建浜大队党支部对于怎样把粮食生产搞上去，怎样发展多种经营，都作了全面规划，明确了奋斗目标。

张建浜大队的全面规划，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开始，有些同志只想搞当年有收益的项目，不想搞多年才见效的项目。他们还认为，搞经济价值高的项目合算，搞经济价值低的不合算。具体反映在植树绿化问题上，总觉得树木生长周期长，见效慢，因此，种树不积极，或者种了以后放松管理。通过全面规划和思想教育，使大家明确了绿化的意义、农业和林业的关系，种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大队和生产队的关系。张建浜大队在全面规划时，坚决执行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对多种经营项目作了具体分析，划分了经营范围。凡是规模较大、投资多、用工多、技术性较强的项目，由大队来办；凡适合生产队经营的传统项目，积极支持生产队来办。例如，同样是手工业加工，因为榨菜是在大忙期间集中收获的，需要投放较多的劳动力突击加工，所以由大队统一经营，这样，就有利于充分挖掘大队企业的劳动潜力，保证生产队搞好农业生产；而杞柳加工，因

为季节性不强,技术上也不很复杂,所以就由生产队利用农闲季节来办。还有一些项目,大队和生产队都有条件办,例如养猪,就由两级一起来办。

生产队和生产队的关系。大队党支部对一些征用土地较多,有可能减少收入的生产队,在安排多种经营项目的时候,作了适当照顾,使队和队之间的经济收入基本平衡。

一九七四年,张建浜大队党支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又制订了一九七四——一九八〇年的七年规划,决心进一步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壮大和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宝山县委写作组

远征万里不停步

——南汇县泥城公社远征大队不断夺取棉花高产的调查

远征大队地处上海郊区东南海边。这个大队的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十年多来，不断夺得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一九七二年，全大队平均亩产皮棉二百一十一斤，一九七三年又增加到二百四十七斤，成为上海郊区棉花高产的先进典型。

艰苦创新业 荒滩献棉粮

十多年前，这里还是“抓把土能腌菜，舀碗水当盐汤”的荒海滩。有的地方芦苇丛生，有的地方寸草不长。一九五九年开始，附近几个大队的贫下中农分别组成“远征”小队，每天往返二三十里，到这里来开荒。一九六二年以后，人民、苏桥、塘角等几个大队的一部分贫下中农，在十多名共产党员的带领下，迎着困难，陆续到这里安家落户，向大自然发起了全面的进攻。

那时候，泥城公社各个大队，已经是抗旱有电灌站，

脱粒有脱粒机，“花好稻好样样好”。海边呢？却是“秋天芦苇荡，冬天白茫茫”，一片荒凉。到这种地方安家落户，对贫下中农来说，就是一场大革命。

那时候，阶级敌人又进行破坏。他们胡说什么到海边去，“生活有风险，生产不保险，生命有危险”，是“睁着眼睛往水里跳”。

困难，吓不倒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他们斩钉截铁地说：革命人要走革命路，我们跟毛主席干革命，就是要跟到底！

在这方面，共产党员老祝的事迹，十分动人。老祝老家在苏桥大队。旧社会，他讨过饭，当过雇工。解放后，他翻身不忘本。当公社动员社员到海边安家落户的消息传来时，他再三再四地提出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种田。有人劝他：你的房子是新翻的，灶头是新砌的，猪棚是新盖的，何必自讨苦吃！他说：我就是要为革命讨苦吃。公字不带头，还算什么共产党员！等到上级一批准，他就毅然搬到海边来落户。

象这样“自讨苦吃”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在远征大队，远远不止老祝一个。

围垦海滩，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斗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每天顶着晨星奋战到天黑蒙蒙。镰刀卷了口敲敲平重新干，扁担断了换一根继续干，肩膀磨破了一声不哼连续干，冬天胡子上结了冰花照样干。一队的-一个女社员怀了孕，劝她休息不休息，抢着去割芦苇。有一次，到了工地，没有割上两捆，肚子

一阵阵地痛了起来，刚刚回家，孩子就生下来了。她这种为革命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的精神，至今传为美谈。

艰苦的斗争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开垦的头几年，不仅房屋紧张，饮水困难，而且种下去的棉花，因为盐碱重，“高的筷子长，低的一巴掌”，亩产皮棉只有二、三十斤。这时，有人开始动摇了，说什么：“东海滩，晒盐滩，要长庄稼难上难。”个别人甚至把房料装到船上摇回老家去了。可是，广大贫下中农坚决不做可耻的逃兵。一个解放前受尽地主压迫的贫农女社员激动地说：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土地，一定要种好它，种不好，我死也要死在这里！她和另外十六位女社员一起，顽强不屈，坚持战斗，终于开出了四十多亩良田，被人们誉为“一心闹革命的妇女队”。

“红军不怕远征难”。远征大队的贫下中农为了改造盐碱地，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大搞水利，开河挖沟，几年来，新开出了三十二条排水河，填平了一条十五公尺宽、四百公尺长的角头港和六十七条废水沟，建立了排灌水系，引淡水，洗盐碱。他们还在盐碱地上盖上三、四寸厚的塘泥、浜底泥，用新土、好土压盐碱。同时大力发展养猪，增加谢肥。经过这样千方百计地改造，终于使原来的盐碱地初步变为土壤比较肥沃的良田。一九六六年，亩产皮棉超《纲要》，达到了一百一十斤。

生产大发展 关键在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远征大队生产的大发展，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泥城公社各大队的“远征”小队统一组成了远征大队。

远征大队成立以来，贫下中农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第六生产队的一次田头批判会上，社员控诉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一九六三年，这伙复辟狂鼓吹的“三自一包”的黑风也刮到了东海边上，有些“远征”小队实行了“工分挂帅”、包工到户的错误做法。一次，有两个社员用船往南汇县化肥厂送氨水桶，往返一百五六十里，队里包给他们一百六十个工分。他们只花了一天一夜时间，却得到了四天的报酬，引起了其他社员议论纷纷。这次，他们以高度的自觉，主动检查了这件事情，愤怒地说：包工到户，物质刺激，培养了个人主义，瓦解了集体生产，不利于贫下中农的团结，是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决不能再走这条回头路。

远征大队的贫下中农还把田头、场头、家庭的革命大批判，同回忆对比结合起来。这里的贫下中农，在旧社会，

个个都苦大仇深，有的讨过饭，有的卖过儿女。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帮助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他们对毛主席最亲，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最恨。在一次批判会上，许多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纷纷起来忆苦思甜，愤怒批判“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缺吃少穿”、“国富民穷”等反动谬论。一位五十多岁的贫农老妈妈解放前是童养媳，住的是“环洞舍（烂泥棚）”，吃的是野菜汤，穿的是“百家衣”。如今，家里造了三间瓦房，缝纫机、脚踏车、台钟、绒线衫，样样齐全。她用亲身的经历，批驳了林彪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妄图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通过大学习、大批判，使社员们受到了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认识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棉花产量也逐年提高。棉花上去了，粮食怎么办？这对远征大队贫下中农来说，是能不能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考验。

一九六八年以前，这里的绝大部分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随着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和“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的深入人心，大家下决心改变“棉区卖棉买粮”的“老规矩”，力争棉花粮食双高产。

但个别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想的不是一个点子，主张把粮食作物种到盐碱最重的土地上去。这样，上报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并不少，对上交代得过去，棉花的产量不会少，生产队在经济上划得来。至于口粮嘛，反正国家不会叫人饿肚子。如果用好地种粮食，他认为是“出了

灯火钱，坐在暗头里——明吃亏”。

广大贫下中农知道了这个干部是这样打算盘的，非常不满。他们说：算这笔帐，算那笔帐，不算战备帐，是最大的错误帐。他们坚决抵制了这种“重棉轻粮”的错误主张，坚决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粮田面积扩大到三百五十七亩，占全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一。这几年整个远征大队的粮食产量年年增加，一九七一年常年亩产达到一千零十六斤，实现了三粮（口粮、种子、饲料）自给。食油也自给有余。一九七三年，除“三粮”自给外，还卖给国家光荣粮五千多斤。在原来“种豆豆不出，种棉棉不长”的荒海滩上，初步实现了粮、棉双高产。

万里不停步 高产更高产

一九七二年，全大队皮棉亩产达到二百一十一斤，还能不能再增产呢？有人说：“荒海滩上皮棉亩产已经超双百，再要增产难上难。”大队党支部领导社员专门举办学习班，狠批“天命观”和懦夫懒汉思想，使大家认识到棉花生产要进一步搞上去，不靠天、不靠地，全靠毛泽东思想的指引。路线为纲，人定胜天。荒海滩本来没有田，我们贫下中农依靠勤劳的双手把它开辟出来了；盐碱地本来不长棉花，现在亩产皮棉超双百，还不都是靠我们战天斗地斗出来的。许多社员摆出了事实，现在的铃子数还不到现蕾的二分之一，只要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既有冲天的干劲，又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棉花增

产的潜力是很大的。

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老王，不仅是革命的带头人，也是科学种田的带头人。老王的老家是棉花高产单位人民大队。他移居到远征大队以后，把人民大队的先进经验也带了过来。但是，他懂得，远征大队和人民大队，条件不一样，客观规律也不会完全一样。毛主席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于是，他就和大家一起，摸索这一带的天性、地性和棉花生长的特性，并根据这一带的具体条件，抓住棉花增产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播种时间、密植程度、田间管理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机动灵活的措施，使盐碱地上的棉花，同样达到带桃入伏、伏桃满腰、秋桃盖顶、早熟丰收的目的。

前进的道路从来不是毕直的。近二、三年来，在棉花生产的实践中遇到了虫害和烂铃的新问题。一九七一年，五队的棉花在八月中旬预测亩产可达二百多斤，但不久由于棉铃虫严重危害和烂铃的影响，结果只收一百三十二斤。党支部发动干部和群众开展大讨论、大总结，研究造成棉铃虫危害和烂铃的原因，探索解决的办法。大家认识到：棉铃虫危害和烂铃的多少同棉花生长本身这个内因有很大关系。于是就在一九七二年的棉花生产中，注意了看天、看地、看苗情，在肥水管理上狠下功夫，努力培育健壮高产植株，争三桃、争好桃，防止病虫危害。八月下旬前后，当棉铃虫盛发时，又及时进行药物防治。所以，一九七二年棉花没有遭到棉铃虫危害，烂铃也大大

减少，亩产皮棉比上年增加二十六斤。

一九七三年，远征大队棉花生产更上一层楼，亩产皮棉超过历史最高纪录，达到二百四十七斤。当谈到棉花产量能不能继续增产时，远征大队的贫下中农响亮地说：能！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有工人老大哥的积极支援，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大干苦干，棉花的产量就决不会到顶。请听，远征大队贫下中农的眼光有多远！远征大队贫下中农的气魄有多大！

目前，远征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决心做到远征万里不停步，认真实践，不断总结，“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争取在棉花生产上获得更大的自由，创造高产稳产的新成绩，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反骄破满揭矛盾 科学种田夺高产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我们青村公社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广大贫下中农、干部、社员和科技人员，把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认真贯彻落实农业“八字宪法”，夺得了一九七三年农业生产好收成。早稻连续第四年超千斤，平均亩产一千零八十七点六斤；后季稻一季超《纲要》，平均亩产九百十四点五斤；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一千八百三十点三斤，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七，都超过历史水平。同时出现了一批高产单位，常年亩产超双千斤的有一个大队，二十个生产队；早稻超过一千二百斤的有一个大队，十八个生产队；后季稻超千斤的有两个大队，二十八个生产队。最高的北港十六队早稻亩产一千四百四十八点三斤，后季稻亩产一千二百七十六点四斤，常年亩产二千四百八十七点四斤，达到了《纲要》的三倍多。

认真揭露矛盾 鼓足革命干劲

我们公社前几年粮食生产取得了一些成绩，从一九

七〇年以来，早稻亩产连年超千斤，有些同志开始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千斤的产量变成了千斤的包袱，思想上产生了片面性，不是把早稻超千斤看成我们夺取全年粮食高产的起点，而是为了“保早稻千斤”，影响了后季稻产量上去。前三年虽然早稻年年超千斤，但后季稻年年不上《纲要》，粮食常年亩产老是徘徊在一千六百斤左右。特别是一九七二年，早稻增产，而后季稻减产，影响了全年粮食增产，成为全县增产幅度最小的一个公社。

一九七三年春天，我们公社党委在县委的直接帮助下，实行开门整风，发动广大干部、群众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提批评，揭矛盾。群众批评我们骄傲自满，思想保守。几年来，青村公社早稻超千斤的牌子扛出去了，如果千斤保不牢，对上级不好交待，对群众不好讲话，日子不好过。因此，党委在思想上、精力上、增产措施上偏重于早稻超千斤，对后季稻抓得不狠，措施不力，北港十六队一九七一年以来后季稻亩产超千斤的经验推广得不够。

通过开门整风，使我们认识到：农业要上去，根本在路线。通过开门整风，提高了党委抓大事的自觉性。从春耕开始，公社党委和各大队党支部就狠抓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深入开展批林整风，以生产队政治文化夜校为阵地，组织干部、群众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提高了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姚家大队是个早稻高产单位，一九七二年由于后季稻减产，造

成全年粮食减产十四万斤。在县委、公社党委蹲点组帮助下,通过批林整风,党支部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是:路线教育没抓好,思想上“骄”,作风上“飘”,措施上“老”,保了早稻超千斤,后季产量提不高。一九七三年,他们狠批了林彪散布的“顶峰论”,树立熟熟争高产的雄心壮志,正确处理早稻与后季稻的关系,获得了两季水稻双高产,早稻亩产一千二百斤,后季稻亩产九百五十八点九斤,全年粮食亩产二千斤。岳和大队原来比较后进,在批林整风中,公社党委帮助他们,抓纲抓线抓班子,揭露矛盾促转化。新的领导班子带领群众狠抓阶级斗争,干部群众一条心,革命生产更有劲,夺得早稻亩产超千斤,后季稻亩产九百五十三斤,全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八百三十九点五斤。

公社党委还根据群众意见,认真改进领导作风,党委领导成员带领公社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深入第一线,既蹲好点,又抓好面,同社员一起学习批判,一起参加劳动。在工作方法上注意认真总结先进单位的经验,及时发扬先进,组织学习先进。如北港十六队路线教育抓得好,干部带头劳动好,科学种田经验好,水稻两季产量高。县委十分重视,号召全县学习北港十六队。我们公社党委提出了“全县学北港十六队,我们全公社怎么办”的大讨论,并组织二十七個生产队,向全公社发出了学习北港十六队的倡议书,开展革命竞赛,经常组织他们到十六队学习参观,交流抓路线,促大干,夺高产的经验,以这二十七個生产队为点,回到各大队树立典型,推广先进经验。通过一点带多点,多点促全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北港

大队原来有些干部认为：“全大队有十八个生产队，人多面广范围大，要想后季超千斤，眼前两年不可能。”在全县、全公社学习北港十六队的热潮推动下，他们鼓足干劲，学习先进，后季稻亩产一千零五斤，常年亩产达到一千九百四十六点六斤。

狠抓关键措施 力争熟熟高产

几年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要夺取全年粮食高产，光靠早稻一季超千斤是不够的，只有统观三熟一起抓，力争熟熟高产，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后季稻历来是我们公社的一个薄弱点。通过开门整风，深入调查研究，看到早稻与后季稻确实存在争季节、争劳力、争土地、争肥料的矛盾。前几年，我们没有统观三熟巧安排，往往顾此失彼，片面多种早稻，减少后季稻秧田；片面多种晚熟品种，推迟了后季稻移栽季节；肥料上早稻吃得好，后季稻吃不饱，影响了产量。

吃一堑，长一智。一九七三年我们接受了过去的工作经验教训，认真贯彻落实农业“八字宪法”，比较妥善地处理了早稻与后季稻的几个关系：

一、立足全年，合理布局争主动

为了夺取全年高产，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教导，立足全年，从全年生产出发，本着“前熟为后熟，熟熟为全年，今年为明年，粮棉双高产”的原则，正确处理前熟与后熟、一熟与全年的关系，合理安

排好茬口布局,既保证早稻丰收,又促进后季稻增产。对三熟制早稻,根据我们公社现有条件,掌握在百分之四十,并选用早熟元、大麦茬口或早油菜茬口,把小麦茬口留作后季稻秧田,因为小麦茬口土壤肥力差,播种后不会旺发旺长,容易管理,有利于培育壮秧。

在安排好茬口的同时,我们还合理搭配早、中、晚熟品种。前几年早稻中、晚熟品种过多,认为“高产有把握,千斤保得牢”,而影响了后季稻。如唐家四队一九七二年早稻都是中、晚熟品种,特别是用“团粒矮”作三熟制早稻,使早稻更加晚熟,后季稻移栽更加推迟,从八月十二日开始移栽,这时部分后季稻秧田已拔三节,主茎开始幼穗分化,亩产仅四百九十三斤。一九七二年全公社适当扩大了“二九青”等早熟良种,由上年的百分之十扩大到百分之三十。晚熟品种也选换了一部分“广六矮4号”良种。七月底开始收割早熟品种,八月初进入收种高潮,全公社到八月十二日基本完成后季稻移栽任务。加上后季稻全部选用“双丰1号”早熟高产良种,使早稻、后季稻都获得了丰收。

二、瞻前顾后,留足秧田育壮秧

“秧好一半稻,壮秧产量高”。培育壮秧是夺取两季水稻高产的基础。我们利用塑料薄膜把早稻晚熟品种提早到三月十五至二十日播种,秧龄四十五天;早熟品种在三月底前播种好,保持秧龄三十天,确保早稻及时收割。后季稻“双丰1号”生育期也需要一百四十天左右,所以也要适时早播,在六月中旬播种,秧龄四十五天左右。

为了培育壮秧，坚持落谷稀，保证每株秧苗有一定的营养面积，促使秧苗健壮。过去早稻秧田用种量较多，有的一亩超过四百斤，造成秧苗个体竞争，苗细苗弱，移栽后活棵慢。一九七三年，我们推广了姚家大队落谷稀的经验，减少了用种量，绿肥茬口秧田每亩播种三百斤左右，移栽八亩左右；三熟制秧田每亩用种量二百斤左右，移栽四至五亩。对后季稻秧田，一九七二年为了多种早稻，少留秧田，吃了大亏，如唐家二队有一片二十亩大田，只留二点五亩秧田，亩产仅三百斤。一九七三年我们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推广了北港十六队留足秧田的经验，认真控制一与四的比例，每亩播种一百五十至一百八十斤毛种。由于秧田足，落谷稀，秧苗长得青秀老健，适龄带叶，移栽后早活、早发、早成熟，为后季稻高产创造了条件。

有了健壮的秧苗，还要有合理的密植方法。我们推广了小株密植法。过去密度比较稀，每亩插三万穴，十多万基本苗，产量很低。但也不是越密越好，曾经试验每亩插四十万以上基本苗，反而减产。经过多年实践：绿肥茬早稻由于茬口季节早、肥力高，一般中晚熟品种每亩插四万五千至五万穴，每穴四至六株，基本苗二十五至三十万为好；早熟品种每亩插五万穴左右，每穴六至七株，基本苗三十万左右为好；夏熟茬口早稻密度适当提高。后季稻从移栽到收割时间短，也需要以苗争穗，以穗争粒，一般掌握每亩插四万至四万五千穴，每穴六至八株，基本苗达到三十万左右。

三、着眼熟熟高产，自力更生大积肥

我们公社近几年来重视养猪积肥，一九七三年生猪饲养量达到一亩田一点一八头猪。同时，全公社还有一万亩绿肥作早稻基肥。人们常说：“猪谢红花草，种田两样宝”。但由于扩大了复种面积，又要争熟熟高产，如果只靠猪谢、红花草，不想大积自然肥料，往往就跟不上高产的需要，造成早稻吃得好，后季稻吃不饱，部分田块白地下种，产量不高。一九七三年我们公社大力推广北港十六队的经验，专门召开了现场会，抓路线，大积肥，学习北港十六队贫下中农不怕暑气逼人、汗淋满身的革命精神，开展了大积自然肥料的群众运动。公社党委领导同志还特地到认为肥源少的生产队去带头积肥，做出样子，使积肥运动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北港大队社员利用休息时间开展做好人好事活动，积的肥料就有五千多担。姚家大队提出“小雨淋，大雨拚”的战斗口号，大干半个月，积足了后季稻的有机肥料。公社企事业单位也有二千五百二十二人次投入积肥运动，割到青草五千一百多担。据统计，一九七三年全公社积到后季稻肥料三十万六千担，加上猪谢，平均每亩后季稻施相当于猪谢质量的有机肥四十担左右，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其中北港十六队每亩施了六十五担，使土壤疏松，肥效长，为秆粗穗大高产量打下了基础。

四、早稻适当养谷老，保证后季移栽早、管得早

“季节就是粮食”，季节不仅决定当季产量，而且直接影响下一季产量。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过去由于片面认为早稻籼谷容易脱落，不敢留老，出现了割青现

象。根据姚家大队典型田块调查，早稻“割青”与“养老”，亩产相差五十至六十斤，最多的差一百多斤。但是纠正了“割青”倾向，又出现了片面强调早稻“养谷老”的倾向。如王家十队一九七二年早稻收割过迟，后季稻移栽到八月二十日尚未完成，脱了季节，造成大面积减产，平均亩产只有四百零七点五斤。

一九七三年，我们针对早稻生长过程气温由冷到热，和后季稻由热到冷的特点，发动群众苦干，缩短两头，突击中间，做到早稻适当“养谷老”，又不误农时抢栽后季稻，特别是大力推广插秧机，全公社后季稻机插三千五百多亩，占总面积百分之二十五。事实证明：“立秋”前机插，又管得好的，产量都比较高。如机插秧最多的沈家大队，机插二百八十七亩，占总面积百分之三十五，管理又抓得紧，后季稻亩产达到一千零四斤。群众反映说：“插秧机，工效高，后季稻，种得早，腾出劳动力，管理更周到。”要夺取高产，还要做到一种就管，早种早管。全公社在移栽后一星期就普遍耘稻一次，促使早返青，早发棵。等田里刚长出草来，就结合除草再耘第二次，有的田块耘了三次。在水浆管理上，推广了灌“养老水”，以水调温，以水调气，以水调肥，保证了活棵成熟，增加粒重。据调查：十一月三日停水的，比十月二十五日停水的千粒重增加一点零四克。北港十六队部分田块倒伏后，继续灌“跑马水”，一直灌到十一月五日，增加了粒重。同时，狠抓了防治病虫害。一九七三年，病虫发生多，来势猛，持续时间长，公社多次召开现场会，大打人民战争，对纹枯病、稻瘟病连续

喷药防治,基本上消灭了为害;纵卷叶虫是大发生年,也吃准时间,及时用药,还采取一药两治的办法,如防治纵卷叶虫兼防螟虫,收到了一些效果。

我们公社在粮食生产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发展还不平衡,三麦产量仍然比较低,棉花虽然比上年增产,但还落后于历史最高水平,比兄弟公社差距很大。我们决心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不断反骄破满找差距,继续革命向前进。

奉贤县青村公社革委会

这里的猪养得又多又大又好

——崇明县新河公社七大队第一生产队穷、勤、巧养猪的调查

崇明县新河公社七大队第一生产队有耕地一百七十四亩。一九七二年，这个生产队集体养猪二百四十八头，社员家庭养猪一百四十六头，平均每亩地二点三头；出售肉猪八十六头，平均每头重一百五十斤。

这个队的干部和社员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肯在穷、勤、巧上花力气，不仅猪养得多，养得大，而且养猪成本不断下降。一九七二年，集体养猪盈余三千六百八十多元，结余精饲料八百多斤。

养猪生产的发展，增加了有机肥料，一九七二年的农业成本，从一九七一年的百分之三十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三点五，又为农业丰收创造了条件。贫下中农深有体会地说：“养猪做到穷勤巧，猪多肥多产量高。”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养猪事业蓬勃发展

这个生产队的养猪事业，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这个队的干部和社员批判了刘少奇一伙鼓吹的养猪单干的修正主义黑货和拆散集体畜牧场的罪行，实行公养和私养并举，集体养猪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七一年初，他们自己动手，新砌猪棚三十四间，饲养量从一九七〇年的一百头，增加到一百九十头。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生产队集体养猪事业的发展，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以一九七〇年养猪亏本为理由，说什么“集体养猪勿赚钱，多养勿合算”。要集体少养，让家庭多养。这个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认为，是否坚持公养私养并举，积极发展集体养猪，这是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他们一方面批判了一味追求私养的资本主义倾向，一方面又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养猪工作的指示，总结过去几年养猪工作的经验教训，从领导上、思想上、饲养管理上找出了集体养猪亏本的原因，制订了搞好集体养猪的新措施。经过实践，一九七一年养猪的成本显著下降，变亏为盈，净收入二千一百三十四元。集体的猪养好了，帮助一些社员端正了家庭养猪的方向，保证了生产队的养猪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这一年全队饲养量二百九十六头，其中家庭养猪一百零七头，占全队饲养量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一。

坚持自力更生 饲料自给有余

是自力更生穷养猪，还是依赖国家供应饲料富养猪，

这是表现在养猪事业上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又一个方面。过去，这个队吃过富养猪的苦头，“依赖国家拨精料，饲料吃空成本高，猪仔养得小又少”的教训很深刻。他们认真吸取了这个教训，批判了富养猪的大少爷作风，坚持穷养猪，自力更生解决饲料缺乏的问题。

这个队除了种足种好饲料田以外，还根据不同的季节，见缝插针种饲料。他们的经验是：一抓水面放养。全队三条宅沟，两条泔沟，共有水面五亩，全部放养水葫芦等水生作物。二抓大田插种。根据作物的特点，利用行间搞插种。三抓十边种植。田边、地角、渠道、沟沿、埂岸种足种好，力争做到寸土不荒。一九七二年，共收水葫芦、青菜、大头菜等青饲料二十五万多斤，不仅做到了季季有青料，月月有剩余，还支援了兄弟队二万多斤大头菜。

这个队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就注意养大猪，增加肉猪的重量。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养大猪可以根据猪的生长期，将粗精饲料合理搭配使用，节省精饲料。他们的经验是：架子期，青粗饲料应为主，控制长膘吊架子；催肥期，增加饲料紧催肥，养好大猪成本低。一九七二年，他们出售肉猪平均每头重一百五十斤。其中有一头养了八个月，重二百五十九斤，等于八个月养了三头合格猪，还结余精饲料三十八斤。贫下中农在总结养大猪的经验时说：“多养大猪，既省精料成本低，又为农业多积肥。”这一年，这个队平均每亩有一百二十五担猪粪。有机质肥料多了，化肥用不完，储存了六千多斤。

切实加强领导 认真落实政策

要把生产队的养猪事业搞好,加强领导是个关键。队委会定期研究养猪工作,制订饲料生产计划,还指定一名干部专门抓这件事。队委会十分重视对饲养员的教育工作,从思想上、生活上关心他们,经常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帮助他们提高对发展养猪事业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为革命养好猪的责任感。每逢节日,生产队长都去代替饲养员工作,让他们安心过节。

在加强对饲养员的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这个队的干部还认真落实党的有关政策。他们对男女饲养员实行同工同酬,并根据饲养员的劳动态度、劳动强度和完成任务等情况,按照实际出工的天数,确定工分报酬,从而进一步调动了饲养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把饲养工作做得更好。有几次母猪下崽后,饲养员连续二十多天坚持每夜放奶二次。由于精心护理,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窝窝小猪的成活率都达到百分之九十五。

饲养人员也长期固定,不随便更换,这样便于他们进一步熟悉猪的特性,不断积累饲养工作的经验。队里还挑选了两名青年社员当预备饲养员,保证饲养工作后继有人。

崇明县委调查组 新河公社调查组

增加储备 藏粮于民

——松江县城西公社联友大队中桥生产队为革命储备粮食的调查

中桥生产队共有三十六户。一九六八年粮食单产突破千斤关，一九七三年上升到一千四百零一斤。随着生产的发展，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大，社员收入水平和吃粮水平也不断提高。近几年来，这个队遵照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的教导，集体储备粮越来越多，一九七三年已达四万四千多斤，平均每人近三百斤。全队社员开展了为革命节约粮食的活动，几年内已节约粮食一万多斤，平均每户储粮两个月，最多一户已储粮半年多。社员说：“毛主席号召记心上，誓为革命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手中有粮喜洋洋。”全队已形成一种为革命节约粮食、储备粮食的好风气。

提 高 认 识

一九六九年前，中桥生产队有些社员节约粮食的观念不强，没有按计划用粮，往往要透支口粮。例如，少数社员逢到婚丧喜事、造房盖屋，还按照旧风俗办事，办酒

请客,吃掉很多粮食。有户社员一九六九年造三间新屋,匠工、亲友吃了一星期,吃掉二百多斤大米。有些社员在新年、中秋、端午等节日做糕糰过多,不光自己吃,还要相互送礼,这样也透支了很多粮食,更谈不上储备粮食了。

节约和储备粮食观念淡薄,根子又在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观念淡薄。有些干部和社员对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伟大战略方针认识不足,忘记了国内外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有的干部认为现在产量年年高,粮食储备年年增,透支一点粮食不在乎。看到有些社员浪费粮食,只是一般讲讲,没有十分重视。一些青年由于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的生活,也没有碰到过大的灾荒,因而只能抽象地理解“**备战备荒**”四个字。他们要求吃得好,很少考虑为革命节约粮食,有时看见家里烧稀饭,还要皱起眉头埋怨几声。中桥生产队队委会从分析中认识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头脑里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思想上没有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就不可能有为革命节约粮食、储备粮食的实际行动。

中桥生产队干部找到部分社员透支粮食的根本原因以后,就把节约和储备粮食作为一件重要的工作来抓。

他们根据社员的亲身经历,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把节约和储备粮食同党的基本路线联系起来。生产队请来老贫农给大家讲家史、村史,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然后联系国内外阶级斗争的现实进行形势教育。贫

农社员周友法解放前受地主剥削，秋收后“交脱租米剩块场”，只好出外讨饭，奶奶饿死在外边，尸体也没有收殓。贫农老妈妈张喜花一家在抗日战争期间被迫逃难，没有饭吃，只靠一鬻菜干过了几天生活。他们的回忆对比，使社员深受教育。这个生产队还经常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刘少奇鼓吹的“三光”（分光、吃光、用光）“四不留”（不留公积金、公益金、生产费用、储备粮）等黑货；批判林彪一伙诬蔑农民“缺吃少穿”的谬论。大家说：解放后生活好了，但千万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不能忘记备战、备荒。要从思想上物质上充分作好准备，要搞好生产，储备粮食。社员站得高看得远了，对储备粮食的意义想得深了，为革命节约用粮的自觉性也大大增强了。

千 方 百 计

广大社员认识提高以后，就自觉地采取种种措施，千方百计节约粮食，储备粮食。

坚持算了吃，反对吃了算。中桥生产队的社员体会到，过去透支粮食的原因之一是吃粮没有计划。通过学习，明确了“广积粮”的深远意义，现在坚持算了吃，反对吃了算。有的社员家里原来吃粮毛估估，常常超计划，那时每年要透支一个多月，后来算了吃，很快变了样，现在家里也有了储备粮。

坚持农闲吃稀，农忙吃干。中桥生产队社员遵照

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农忙吃干，农闲吃稀；农忙适当增加，农闲适当减少。他们总结了一条计划用粮的经验，叫做“淘米看天时，下锅看农活”。逢到农闲或天气不好，劳动强度较低时，米少淘一点；农忙干重活时，米多淘一点。有的社员还根据农时季节改变吃饭顿数，农忙吃四顿，两干两稀；农闲吃三顿，一干两稀或两干一稀。

破旧立新，反对浪费粮食。搞“四旧”是造成某些社员透支粮食的又一个原因。中桥生产队社员在“广积粮”运动中，狠刹“四旧”歪风，坚持移风易俗，做到不请客，不送礼，不浪费。有一年，一个社员原来打算替女儿摆酒席办婚事，通过干部教育和自己学习，改变了主意，为女儿办了一个俭朴的婚礼。他算一算要节约粮食二百多斤。

广种杂粮，补充口粮。过去，中桥生产队有些社员为了增加经济收入，自留地往往种棉花、蔬菜、瓜果一类经济作物；现在，他们为了广积粮，已经改变了这种状况，以种粮食作物为主，尽量多种些三麦、山芋、南瓜，并注意复种，增加产量。有一个队委前几年透支口粮一个多月，如今自留地多种了粮食作物，不但不再向队里透支，还有了积余。

坚 持 不 懈

中桥生产队做到队有储备，家有余粮，是干部经常抓、反复抓的结果。

正确处理增产和节约的关系。他们回顾了本队农业

生产的发展史，认识到增产和节约这两个环子必须一起抓。增产粮食是最根本的一条，但是，增产了，粮食多了，不注意节约，就好比用“脱底提桶拎水”，水再多也会流光。五年来，这个生产队较好地处理了增产和节约的关系，坚持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社员，端正社会主义方向，调动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努力改变生产条件，实行科学种田，不断提高单产，把粮食生产搞上去。同时，教育社员丰收不忘节约，使大家树立“以丰补歉”的思想，提高计划用粮的自觉性。

抓好典型。这个生产队把节粮储粮工作作为一项经常的重要工作来抓，从秋熟登场抓起，一年抓三四次。平时，干部深入到户，了解情况，抓住典型，及时召开社员大会，表扬先进，交流经验，介绍推广。对节粮储粮工作做得好的社员，都上光荣榜，造成节粮储粮光荣的好风气。对于浪费粮食的苗子，干部一发现，就立即上门做过细的思想工作。

充分发挥妇女在节约和储备粮食工作中的作用。妇女是每个家庭的“内当家”，每天吃粮多半要经过她们的手，节粮工作好不好，同她们能不能把好关口，大有关系。因此，这个队的干部很注意发扬妇女节粮的好经验，调动她们为革命节粮的积极性。有一个女社员的爱人，以前不大注意节约用粮、计划用粮，她就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有关节约粮食的指示，宣传节粮的意义。在她的耐心帮助下，后来她爱人也自觉注意节约用粮了。

干部以身作则，做节约和储备粮食的带头人。这个

生产队的七个队委，现在户户都有储备粮。队长全家三个人，几年来已储备粮食三百多斤。副队长三年前也透支粮食一个多月，后来他想到干部在节粮工作上也应当带头，就动员全家精打细算，节约用粮，由透支户变成了储备户。干部带了头，为社员做出了榜样。过去，有的干部由于在计划用粮方面没有以身作则，讲话不响，腰板子不硬；现在干部带头计划用粮，带头储备粮食，腰板子硬了，讲话也灵了，群众性的节约和储备粮食的活动就更加持久深入地开展起来了。

松江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

社办工业的好榜样

——青浦县重固公社农机厂的调查

上海青浦县重固公社农机厂，是在一九五九年建立起来的。现有一百四十三人，其中直接生产的工人一百三十八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指引下，这个厂的老工人同青浦县的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长期的尖锐的斗争，坚持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建厂初期，这家工厂只有六个工人。他们通过“厂社挂钩”，向大工厂买来一些报废的机器零件，七拼八凑地装了些牛头刨床和车床，为生产队修理柴油机和水泵。不久，县里的走资派执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搞“利润挂帅”，鼓吹只要有钱可赚，可以什么都干。当时，工人增加到一百一十个，可是坚持维修农机的却只有七、八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县里的走资派又下令把全县的社办工业一刀砍光，把机床全部调走，连专业修理农机的工人也不留。重固农机厂由于一部分老工人的抵制，才留下了四个工人和三台机床。这四个工人一直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中，全厂革命群众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批了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又深入批判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一系列反动谬论，更加坚定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坚定了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为发展农业机械化作出了贡献，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

为农民做了三件深受欢迎的好事

十几年来，这个农机厂为农民做了三件深受欢迎的好事：

第一件，及时修理了各种农业机械，保证不误农时。这个公社现有大型拖拉机九台，手扶拖拉机一百十九台，电灌站二十五个，电动机五百多台，柴油机九台，以及许多脱粒机、盖麦机、插秧机、机动喷雾器、粉碎机和水泵等。农机厂采取了“长期(农闲)准备，短期(农忙)突击”的办法，使全公社八百多台机电设备保持台台完好，无论在“春耕”、“三夏”、“三抢”、“三秋”等大忙季节，每一台机器都能“开得动”、“跑得快”。不仅这样，他们在每个农忙季节，还组织工人到各个生产队巡回检修。一九七四年“三抢”中，他们发现各生产队急需大包机(脱粒用)上用的长轴，但是没有这样长的车床，他们就想方设法，把两台车床接起来做，终于完成了任务。他们不仅包干了本公社机电设备的维修任务，连附近的白鹤、香花、华潮、凤溪等几个公社的机修任务也带干了。

第二件，为大队培养贫下中农的机修员，自己维修设备，降低农业成本。他们培养机修员的方法有三种：一种是办训练班，每年一期，每期十到十五天。训练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学政治，学技术。学技术时，农民把拖拉机开来，上午由工人讲原理，下午让大家把拖拉机拆开，工人把着手教，至今一共办了十一期，培养了拖拉机手和机修人员共八百多人(次)。一种是在修机的时候边修边教。拖拉机坏了，工人和农民一起蹲下来找病根，一起动手修理，每修理一次，农民就学懂一点技术，以后遇到重新出现同样的毛病时，自己也能修理了。这里的小型拖拉机手基本上都会做点小修理工作。还有一种是把大队农机组的人员，送到农机厂培训，使大队农机组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大队有了这些技术力量，又配备了一套修理农机用的小钻床、电焊机和台钳扳头，以及锉、锯、锤、凿等工具，一般的简易农具都会自己修理了，基本上做到了“小修不出队”。

第三件，因地制宜改革农机，促进了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他们改革的盖麦机、土切草机、深耕犁等，都因地制宜，颇受农民欢迎。例如，有两个队从县里买来两台青饲料粉碎机，要用四点五瓩的电动机，而队里只有拖脱粒机用的二点八瓩的电动机，没法用，以后别的队也就不再去买这种粉碎机了。工人知道这件事以后，就想了个办法，仿照县里的粉碎机的样子，制造了一批用二点八瓩电动机带动的土切草机。饲养员原来用刀斩水草，斩半天只够喂两天猪，现在用土切草机切一天水草，够喂一个

月，还帮助把社员养猪的饲料也加工好了。农机厂还改造了小拖拉机上用的深耕犁，原来的深耕犁阻力大，小拖拉机拉不动，改造后，轻便灵活，小拖拉机拉得动，又耕得深。现经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测定后，已向全郊区推广。

办好社办厂的五点经验

重固公社农机厂几年来由于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扬“穷棒子精神”办企业，抓住为农业服务不转向，所以能够永远保持和贫下中农的密切联系。他们的经验是：

一、社办农机厂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争取大工业的积极支持。这个农机厂的技术装备，多半是上海的大工厂支持的。有些设备是用“买个破茶杯，配个旧盖子”的办法搞起来的。他们的一台牛头刨床就是在上海第二锻压机床厂的废铁堆里找出来的，以生铁的代价买来，修修弄弄用了七、八年。有些设备是用“燕子衔泥”的办法搞成的。一九六九年投产的一台剪刀车，就是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衔”了两年多才装配成功的。他们的经验证明：建立社办农机厂一定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因陋就简，但也需要大工业的积极支持。

二、建立一个农机厂和拖拉机站相结合的农机技术中心。这个农机厂和公社的农机站是合在一起的。拖拉机站的丰收 35 型大拖拉机，每台拖拉机需要有三个机手。这些拖拉机每年只用三个月。由于厂、站合一，工人

和拖拉机手统一调配，农忙时工人上拖拉机，农闲时拖拉机手也上车床。这样做，人和机器的工作效率都充分发挥出来了，农机厂每年都有积累。而县里原来的拖拉机站，机手们一年倒有九个月空着，只做一些保养工作，拖拉机站每年入不敷出，只得为城市搞点运输，以增加收入，减少亏损。现在，县的拖拉机站由于这样做不合算，已经撤销。

三、农机厂工人实行“亦工亦农”，劳动在工厂，供给在生产队。在农机厂的一百四十三个人中，有一百三十九个工人是生产队推荐出来的，农机厂把每人每月的工资划到生产队，再按全公社同等劳动力的收入水平给他记工分，每天外加二角伙食补贴。这种办法既使生产队有所得益，也使工人和农民，工厂和生产队的关系处理得较好。这里的工人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都很关心农业生产。生产队有什么困难，农机厂千方百计去帮助解决。在大忙季节，工人修机不分白天黑夜，电话铃一响，工人背上工具袋就走。有时，晚上拖拉机坏了，为了保证明天生产，他们连夜抢修，不修好不睡觉。有时，工人正在吃午饭，听到拖拉机坏了，放下饭碗就走，到了田里立即抢修，当农民把饭送到田头时，他们也顾不上吃。拖拉机开不动，农民在田里等工，工人们感到“吃饭不香，睡觉不甜”。工人对修理农机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工作从来不计时间。工人们为了给农业服务得更好，都专心学技术，每个人都能掌握两门以上的技术。大型拖拉机手会做车床，做车床的也会做刨床，

当钳工的会电焊，还会修理电动机。有时需要木工、打铁工、油漆工，他们也可以充当一下，有些人还是“万能老师傅”。工人说：“农机厂的工人只会一门技术不行，要免得转。”

四、制度要有利于农民。这个农机厂就象生产队自己的修理车间一样，农民来厂就象走亲戚一样，“老王”、“老陆”，都能叫得出几个工人的名字。有时，农民摘了一根稻草芯做样子，要买一只螺丝；拿了一支粉笔做样子，要配一只螺丝帽。农机厂的工人都能从一根稻草芯和一支粉笔上理解他们的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时，拖拉机修好了，拖拉机手们没有带钱，农机厂还可以记帐。有些生产队资金短少，还可以到秋后结帐。公社农机厂为了减轻农业成本，增强农民发展农业机械的积极性，取费低廉，有时还采取“指导”、“换工”等办法，修好机器，不收费。例如，农民把拖拉机推来，工人一看是什么毛病，就给拖拉机手指导一下，借给他一些工具，由他自己动手修理，这就不收费。回龙大队坏了一只主轴轴瓦，需要动刮刀，拖拉机手不会做，工人就帮他刮，而工人正在做的保养工作，拖拉机手会做，就由他做，这样一换工，也就不收修理费了。只要对农业生产有利，有些赔本的活也干。农民普遍反映，这个厂修理农机又快又便宜。不象有些受修正主义办厂路线影响很深的农机厂，厂大，架子大，农民来厂要填会客单，安排生产要农民画草图，弄得农民伤透脑筋。

五、农闲时生产配件，增加企业积累。这个厂是以

修理保养农业机械为主的，在农闲时候也生产许多农机配件，以及制造一些简单的农业机械。这样做的好处有三条：1. 为本公社生产队提供价廉物美的农业机械；2. 支援了市的有关单位和县物资局的农机配件供应；3. 也为企业增加了积累，以利于更好地为农业服务。以一九七三年为例，光是小型拖拉机配件，已经生产了支承轴一万五千六百只，升降螺母一万五千六百只，张紧轮一万四千四百只，支臂一万五千六百只，调整螺丝一万六千只。他们还负担着为全县制造拔秧机、收割机上两用的齿轮箱一百五十台。几年来，他们全心全意为农业生产服务，而积累也年年增加。他们利用这些积累来盖厂房，买机器，扩大再生产。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调查组

坚持自力更生,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

——嘉定县徐行公社的调查

徐行公社的机械化事业,是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目前是上海郊区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公社之一。

解放初,广大贫下中农连简单的犁耙锄头等工具都不齐全,根本谈不上使用机器。那时整个徐行地区只有两台抽水机,是地主、资本家用来剥削农民的,打一亩田的水要收四斗米。土改后组织了互助组,要十几家、几十家合伙才能买架喷雾器。办了合作社,开始购买和使用抽水机,总共也只有十几台。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根据毛主席“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指示,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向机械化进军。但是,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的干扰和破坏,直到一九六五年还买不起一台大拖拉机。革命促进了生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狠批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机械化事业才迅速发展起来。一九七三年底,全公社二万五千四百亩集体耕地,共拥有丰收 35 型、45 型拖拉机二十八台,手扶拖拉机七十三

台,农用汽车四辆,拖轮十三只,马达八百十台,插秧机三十五台,建立了自己的拖拉机站、电灌站,还有大量的电动脱粒机、机动喷雾机、小型水泵,以及粮食、饲料加工等机械设备。农用机械动力,平均每三亩多地有一匹马力,平均一百九十五亩多地有一台拖拉机(标准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耕地实现了机耕,全部耕地实现了机电排灌,脱粒、粮食和饲料加工、防治病虫害都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壮大三级所有制经济,
为实现机械化积累资金

发展机械化事业,需要大量的资金。这笔钱从哪里来?过去,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鼓吹农村搞机械化“要钱给钱,要技术力量给技术力量”的谬论,使不少干部把实现机械化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国家投资,不是把立足点放在公社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结果公社买不起大型农业机械,电灌站单纯靠国家投资。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四年,只建立了四个电灌站,电灌面积只占百分之三十。机械化的步伐很慢。

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反面教育了社队干部。大家认识到: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大寨自力更生的道路,依靠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集体经济的力量,发展生产,积累资金。几年来,他们遵照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和“五·七指

示”的精神，首先集中力量狠抓农业生产，千方百计提高粮食和棉花、油料等作物的产量，并因地制宜地发展集体养猪、养鱼、饲养奶牛、河蚌育珠、编织黄草制品（如出口的提篮、凉鞋等）、种植蘑菇等副业，大力开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与此同时，积极发展社、队企业，逐步壮大公社和大队的经济。先后办起了公社农具厂、拖拉机站、农机排灌站、化工厂、灯泡厂、草织厂、五金修配厂、毛巾厂、纸盒厂、工程队、畜牧场、水产队等十二个企事业。各个大队也有了农机修配、粮食饲料加工、小化工、小五金和蘑菇房等企事业。

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生产和收入都迅速增长。一九七三年，粮食常年亩产一千八百四十六斤，比公社成立时的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倍以上，棉花、油料、生猪的产量也成倍地增长。农副业总收入达到五百五十九万元，社办工厂总产值一千三百七十万元。随着收入的增加，公共积累逐年扩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生产队的积累平均每年有五十万元以上，社办工业积累平均每年达八十万元。一九七〇年以来，大队经济逐步发展，开始有一部分积累，一九七三年为二十二万余元。这样，用来发展机械化事业的资金力量就逐步增强了。整个公社除开始由国家投资建立的几个电灌站以外，没有向国家要过钱。现在全公社拥有的大型拖拉机、手扶拖拉机、机动喷雾机、机动插秧机、收割机、电动脱粒机和粮食、饲料加工等大、中型农业机械，以及小马达、小水泵、喷雾器等小型农业机械，都是依靠三级集体经济的积累逐步添

置的。随着社有经济的壮大，公社还建造了五十六座拖拉机桥，资助大队造起了十一座电力灌漑站，修筑了八十八公里渠道，其中地下渠道近三十五公里。据粗略的计算，从一九六二年开始，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公社用于农业机械化事业的总投资在三百五十万元以上，每亩耕地平均一百五十元左右，其中生产队、大队投资百分之四十以上，公社一级投资近百分之六十。

“在筹集农业资金方面，农民群众中间有很大的潜在能力。”徐行公社的事实告诉我们，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决不能依赖国家投资。只要认真挖掘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集体经济的潜力，资金问题完全可以自己解决。尤其是公社一级经济的逐步发展壮大，对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贫下中农所说：“不发展社办工业，机械化哪能这样快。”

但是，在发展社办工厂企业的过程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遭到破坏，农业机械化事业几乎停顿下来。后来社办工业逐步发展了，有些公社干部在刘少奇一伙“利润挂帅”的毒害下，又错误地要求社办工业“为一百万元利润而奋斗”，使有些厂脱轨转向。农具厂有些人对制造和维修农机具不感兴趣，忙着生产家具，牟取暴利。化工厂也不积极制造化肥、农药，却去生产十几万只“洋泡泡”赚钱。很显然，如果听任这种资本主义势力泛滥下去，必然导致集体经济垮台，资本主义复辟，农业机械化事业就

不可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力地批判和纠正了这种错误倾向。但在纠正这种倾向的时候，有些人又认为社办工业只能直接为农业服务，如果为城市和出口服务就是方向不对头。公社党委和革委会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统一了思想。毛主席早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就明确指出：“农村副业，就全国说来，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是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问题是国家要有统一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掉盲目性。”毛主席还指出，只有发展为城市和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才能充分利用整个生产力，首先是人力”。大家认为，社办工厂企业为农业服务的方向是必须始终坚持的，“利润挂帅”的余毒尚未肃清，仍要继续批判。但在主要为农业服务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资源和条件，服从国家统一计划，兴办一些为城市和出口服务的工业，是不能和“利润挂帅”混为一谈的。适当兴办一些这样的工业，对于逐步发展、壮大公社所有制，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促进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根据_{需要和可能，}
自己动手制造中小型农业机械

随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对农业的

支援将越来越多,供应农村的机械设备将逐年增加。这是实现农业机械化在物质方面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还要不要自己制造?这里也存在着一条腿走路还是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全国农村都要实现农业机械化,面广量大,什么都要依靠国家供应是不可能的。何况农业生产地区性很强,由于地形、土质、气候、耕作制度等不同,对农业机械的要求也不一样,在这方面,大工业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徐行公社的实践证明,把广大群众的力量调动起来,根据需求和可能,由公社制造一些中小型农业机械,因地制宜改革生产工具,对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不可缺少的。

徐行公社农具厂一成立,就在制造小农具的同时,研究制造简易的农业机械。开始有些人存在着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一提起机械化,总想“一步登天”,希望国家送来大机器,对自己动手从半机械化搞起不感兴趣。这种思想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批评。农具厂的工人急贫下中农所急,踏踏实实,从改良农具搞起,逐步提高,做出了成绩。拿脱粒机来说,过去脱粒多数是靠手撮,“麦黄昏,稻半夜,黄豆滚一夜”,劳动强度高,效率低。用脚踏式的脱粒机也不过两个人一天脱粒四亩。农具厂工人就和贫下中农一起研究把它改成牛拉的,四个人一天脱粒十亩。一九六一年换上柴油机带动,把滚筒直径放大,铁木结构改成铁制的,五个人一天可脱粒十五亩。一九六五年以来又逐步改为电动机带动,五个人一天脱粒二十亩,工效大大提高。但由于脱粒进度快,扬净跟不上,群众说:“杀

猪容易理肠难”，要求把脱粒和扬净合并成一道工序。他们为了解决这个新的矛盾，试制成功了稻麦两用半自动脱粒机。脱粒机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农业机械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实践不断改进和提高，就能锻炼技术力量，加强制造能力，把适合本地特点的中小型农业机械制造出来。近年来，他们还试制了开沟犁、吸泥泵，制造和推广了棉花中耕机、机动插秧机等多种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农业机械。

中小型农业机械可以造，大型农业机械能不能碰？使用机器的既是农村工人和贫下中农，他们熟悉农业生产，又摸熟了机器的性能，完全有条件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徐行拖拉机站的工人这几年就同贫下中农一起对丰收35型拖拉机零配件作了好几项的革新。液压泵上用的滚针轴承过去是钢丝做的，用不到一年就坏，而且往往损坏其他部件，造成大修。在公社农具厂帮助下，改用了铜衬轴承，一般可以用四年。原来两根悬挂臂，是浇铸钢的，犁田半个月就要发生断裂，他们在悬挂臂下端加一根扁钢，用了几年没有坏过。原来的动力输出轴，经他们改进，使用寿命从七八天延长到两年。这样，不仅使拖拉机提高了效能，而且还大大减少了维修费用。

有了现代农业机械，能不能忽视制造小农具？不能。他们在制造中小型农业机械的同时，仍然一点也不忽视改良和制造小农具。现在公社农具厂每年都要制造铁、竹、木制小农具一万几千件，满足本公社的需要。

徐行农具厂就是这样，依靠本公社自己的力量，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边干边学，建立一支贫下中农的技术队伍

实现农业机械化，不仅在资金等方面要自力更生，培养农机技术力量同样要自力更生。只有这样，才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在农业机械化事业逐步发展的同时，徐行公社逐步形成了一支贫下中农自己的技术队伍。现在不仅公社农具厂、拖拉机站有了制造维修农机的几十名技术工人；而且每个大队都有了五、六名大型拖拉机手，四、五名“土技工”，他们对农业机械一般都会用、能修；每个生产队一般都有手扶拖拉机手和电工，还能从事喷雾器、脱粒机、饲料粉碎机等机械的简单维修。全公社所有的农机已做到小修不出队，中修不出社。这支队伍总数在七百人以上。

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实现机械化就有了依靠力量。过去机器坏了要送到县里或市里去修理，很不方便。公社农具厂发展了，生产队一般的简单机械虽然可以送到公社来修，但有时修理费只需花几分或几角钱，却要耽搁半天甚至更多的时间。贫下中农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技术队伍。但文化低能不能学？开始有人持怀疑态度，有的人特别对电器不敢接触，存在着神秘观点。后来他们学习毛主席“从战争学习战争”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导，决心边干边学，同时得到上海工人阶级的大力帮助，终于逐步掌握了技术，扩大了队伍。徐行公社建立这

支队伍的办法是：

一、同国营工厂挂钩，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培训技术工人。一九七〇年以前，他们先后派出了约二百名贫下中农的青年和插队落户知识青年到国营工厂去培训，在工厂老师傅热情帮助下，很快掌握了基本的技术。这批人大多成了公社技术骨干。工厂有时也主动派人到公社来，传授技术。

二、公社农具厂、拖拉机站等单位举办短期训练班和巡回辅导等办法，为大队、生产队培养技术力量。农具厂每年都要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紧密结合实际，边教、边干、边学。如培训修理喷雾器技术，各大队、生产队派人来学习时把需要修理的喷雾器统统带来，在农具厂工人指导下自己动手修理，训练班结束了，喷雾器也都修好了，技术也学会了。平时大队还可派人把机器带到农具厂来，一边修一边学。农忙时，社办企业工人到大队巡回辅导，修理农机，传授技术。

三、充分发挥下放工人的积极作用。这个公社有很多下放工人，其中熟悉农机、电器技术的有四十多人。公社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他们安排在农机战线上，参加农机维修和制造，并用带徒弟的办法，培训新生技术力量，发挥骨干作用。其中有十五人担任了社办工厂和车间一级的负责人。

四、公社内部实行厂队挂钩。一是每个社办工厂分工包干一个大队，在物质上技术上帮助大队建立农机修配站。二是拖拉机站在拖拉机统一使用前提下，采取相

对固定的办法，人、机定点到大队，一个拖拉机手带二、三个徒弟，做到会驾驶、会修理、会保养。这样，公社拖拉机站人员不多，但调动了大队的积极性，实际使用和修理拖拉机的人员却很多。

采取上述办法，一层一层培养训练，大队、生产队的“土技工”又教会了一批人，象滚雪球一样使技术队伍逐步壮大起来。

“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徐行公社的各级干部认识到，按照毛主席关于“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的指示来检查，还有很大的距离。他们决心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基础上，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坚持用革命化统帅机械化，决心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我们这里插秧开始不弯腰了

“面朝泥土背朝天，弯腰曲背几千年”。这是多少年来人们对农村手工插秧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对改变农业生产中“三弯腰”（指拔秧、插秧、割稻三弯腰）的强烈愿望。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几年奋斗，我们公社终于逐步推广使用了插秧机，使广大社员特别是妇女，从“插秧忙，累断腰”的疾苦中解放出来，有效地促进了粮食增产。机插秧的普遍推广，是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又一个胜利。

从余秧想到“治土”

我们开始搞插秧机试点，试来试去，总是碰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歪歪斜斜，二是余秧严重。插秧机前面开过，刚插下去的秧苗就象河浜里的窜条鱼那样余了起来。有的社员见了摇摇头，就走开了。为什么插秧机插的一排十几棵秧苗，有的能插牢，有的插不牢呢？我们下到田里，同插秧机手一起分析余秧的原因，发现余秧的地方，不是低塘，就是大泥块。原来我们平整的土地不适应机插秧的要求。手工插秧凭手控制，高地插得高些，低塘插得

低些，碰上大泥块力气用得猛些；而机插秧插得浅，一排一插，深浅一样，使的力也均匀，这样，碰上高低不平、泥块大小不匀时，秧苗当然就无法统统站稳了。这说明，用手工插秧时那种旧的平整土地方法，已不能适应新事物的要求，只有精耕细作，把土地平整得适应插秧机的要求，才能解决余秧问题。

一次，插秧机在一块种过早作的田里操作，土地明明已经平整得符合要求了，可是，机器开动起来一插，机子两边壅起了两条小堤岸，“壅泥”现象出现了。结果，一边插秧，一边又把近旁插好的几棵秧苗壅到了泥里。

为什么用同样机器，同样操作方法，机插秧又出毛病呢？原来毛病就出在这块地前茬种的是玉米，成年干旱，土质本身比较松，经拖拉机一翻，再灌水一耙，正象调稀的面粉，变得粘粘糊糊起来。上千斤的插秧机压下去，烂泥就从机子两边挤出来，一开动，自然就形成两条小堤。这使我们懂得，旱地改作水田，除了具有一般田的共同性质外，还有它的特性。要在这种田里用好插秧机，就一定要克服田烂的特性。

有实践经验的老农，通常是采用让泥水沉淀一个时候的办法，来治理烂田的。田越烂，沉淀的时间也长些。我们也就采取淀土治烂的办法，当天耙田，隔天插秧，终于避免了烂田壅泥的现象。

有一回，插秧机来到和平大队的一块田插秧，机手见田平、泥匀、水清，满有把握地干了起来。谁知机子过去，余秧又严重出现了，一部分勉强插下去的秧，根须也都露

在泥外。事后一了解，才弄清楚这里是低洼地，水位高，田里常年积水，土质变得僵硬起来。社员把这种土叫作青紫泥，有首歌谣这样说：“青紫泥，青紫泥，板结得象块水泥地；磨痛手指擦破皮，也难把秧苗插得齐。”可见，青紫泥是比较难对付的，绿嫩的秧苗碰上了它，矛盾自然尖锐起来。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要使秧根扎土，就得把僵土变烂，创造机插秧的有利条件。治烂田是用沉淀的办法，治僵土就得反其道而行之，田一翻耕好，乘泥混、浆多的时候，就抓紧把秧苗插下去。这样，秧苗就容易插牢。

从余秧的“安家落户”，到战胜壅泥、僵土，实践教育我们，我们公社的近二万亩水稻田，虽然片连片，块接块，紧靠在一起，但因为有高亢地、低洼地的不同，有旱作、水作之分，土质也就不一样。要使用好插秧机，就得根据不同的土质，采用不同的耕作方法，因地制宜地改造土壤，才能找到适合插秧机的共性，获得使用插秧机的自由。

解开秧苗变黄的“谜”

用机器插上了秧，并没有解决插秧机的所有矛盾。接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秧苗泛黄现象特别严重，秧苗返青一般要比手插秧慢三、四天。季节不等人！大家都担心这几天脱下来，会影响收成。

我们召集有经验的老农和插秧机手一起开诸葛亮会，经过反复比较，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凡是白天顶着烈

日插下去的秧，我们通常称为“火烧秧”，第二天准出现泛黄；而晚上插的秧，我们叫它“夜潮秧”，情况就好得多。这给大家很大启发。江南的“双抢”季节，中午气温高，秧苗从秧田里拔起，堆放在田埂上，好似火烤过一样，再插到水已晒得发烫的大田里，秧苗当然经受不起。手插秧就不同，因为速度慢，秧苗可以边拔边插，没有经过这番折磨。于是我们打破常规，把“火烧秧”改为“夜潮秧”，同时采取白天灌水降温，晚上放水增强活棵，促使机插秧成活早、返青快。

尽管我们作了这些努力，总还是有一些秧苗返青特别慢。经过细细察看，发现这些返青慢的秧苗上有很多黑斑点，显然是在插秧过程中被插秧机上的秧爪碰伤的。秧苗碰伤了，自然对生长不利，大家都认为这是造成返青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说来也怪，半个月后，机插秧的田里，包括那部分伤秧，不但长得挺拔有力起来，而且分蘖和发颗都比手插的要旺。

秧爪碰伤的秧苗，为什么反而比手插的秧分蘖多、发棵好呢？毛主席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在横楼生产队找了两块同样条件、同一天插，而分别用机插和手插的田，拔起几颗秧苗进行对比：手插秧，根须短而细；机插秧，根须粗而壮，并且施展得开。俗语说：根深叶茂。正因为机插秧的根须长得好，所以秧苗后期生长特别旺盛。原来机插秧的部分秧苗被抓伤后，主杆并未受损，它虽然

一时影响了养分的输送,造成秧苗泛黄,但秧苗为了继续生长,补偿损坏的部分叶子,就拼命向下扎根,根须也就长得特别发达。从对比中,我们还看到,手插的包心秧多,插下去的秧苗根须结成一团,包在中间的根须,就不易伸展;而机插的秧苗,深浅一致,秧根和秧根之间有一定的间隙,没有包心秧,有利于向四周和地下伸展,促使分蘖、发棵。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成好事。碰伤了秧苗,促进了根须发达,有利于秧苗更好地生长,也就是这个道理。可见,机插秧苗返青慢只是暂时的现象,分蘖多,发棵好,才是它的本质。

“黄秧”的谜终于解开了。横楼生产队那两块作对比的试验田,经过同样的田间管理,秋后的收成不一样:机插秧比手插秧的亩产量要高出百分之五以上。事实又一次证明:机插秧胜过手插秧。只要我们掌握了机插秧的生长规律,提高插秧技术,精心管理,黄秧就能减少,返青就能加快,粮食就能增产。

秧随机变 机从秧变

随着双季稻的大面积推广,插秧机在插后季稻秧苗的过程中,又遇到了新的矛盾。这主要是由于后季稻秧苗太长所引起的。秧苗一长,插秧机不相适应,插起来,前一颗秧的叶梢同后一颗秧的根一起插进了泥里,出现了“拱桥秧”。

秧苗过长,用推迟播种、缩短秧苗在秧田里生长期的

办法，都是行不通的。因为播种一推迟，整个生长期也就往后移，如果抽穗期遇上深秋早寒，就会影响结谷，造成减产。开始，我们采用剪根截梢的办法，消极地使秧苗来适应机器，但这样做，动人工多，费力大，在“双抢”季节更增加了劳动力的紧张，而且往往忙了一阵子还跟不上插秧机的需要。这就逼着我们去培育一种矮而粗壮的秧苗。我们做了一块有软、硬两层泥叠起来的秧田，上面一层是软土，秧苗易生长，长到一定深度，根须碰到硬土层，生长也就受到限制。这样培育出来的秧苗，果真根短苗壮，长度适当，适应插秧机的需要。

秧可以随机而变，是不是插秧机就不能随秧而变呢？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回顾了推广使用插秧机的过程：起初使用的是一种手扶的插秧机，劳动强度比较高；后来改用一种机动的，工效一下提高了十倍。插秧机正是在使用过程中，在不断暴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提高机器质量的。如果一味强调秧苗来适应机器，削足适履，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只有相互适应，互为照顾，才能相辅相成，更好地推广使用插秧机。事实是，随着水稻品种的不断改良，耕作制度的改变，秧苗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情况，这就不仅要注意使秧苗适应机器，也要注意不断改进插秧机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为了使插秧机适应插后季稻秧苗的需要，造机和修机部门的同志来到田头，具体听取意见，又改制了一种新型插秧机，使长度超过四十公分的秧苗也能插播。现在，我们公社使用的几种不同型号的插秧机，基本上能适应长短不同，粗壮不一的秧苗。一九

七三年,全公社单季稻的机插面积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一九七四年,后季稻机插面积也已占百分之七十二。

革命化统帅机械化

插秧机在推广过程中,每前进一步,看起来只是解决机器和田块、机器和秧苗的矛盾,其实,在解决这些矛盾过程中,充满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来自几千年来旧的手工插秧的习惯势力的阻挠,也有来自我们领导农业生产遇到了新的课题而不相适应的矛盾。要解决这些问题,最关重要的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用革命化统帅机械化。

开始使用插秧机,我们有些干部最怕担风险的是粮食减产,说什么“手插保险,机插危险”;有的则认为“低产田可以试,高产田不能试”。我们坚持典型试验,公社干部亲自参加试点工作,和社员一起操作,总结实践经验。为了用事实说服人,我们在单产超纲要的横楼生产队找了两块同是一亩二分的田,一块手插,用了十九个劳动力,整整插了一天;一块机插,只用了三个劳动力,一个小时就插完了。收割时一比,机插的比手插的产量高出百分之五。这才使得一些同志口服心服起来。

推广使用插秧机,有人还把它看作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认为“农活忙时用,劳力紧张时用,平时可用可不用”。有一个生产队,劳动力比较多,有的队干部就以为机插秧

总不如手插秧，丢着插秧机不用，硬要女社员下田用手插。女社员说：“三只秧竹管，不满四两重，二十四根筋骨根根动，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心痛。”批评队干部不关心她们疾苦，对走农业机械化道路不坚决。我们支持这个队的女社员，在那里召开了现场会，联系实际，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大家认识到，所谓“保险”，实际上是把广大妇女继续束缚在弯腰曲背的繁重劳动中；怕担风险，其实就是因循守旧，不坚持继续革命。

插秧机大面积推广后，也给我们领导农业生产提出了新的课题。譬如，开始按照手插秧的要求拔下的秧苗，用机插后往往发现不够，说明用老的一套指挥生产已行不通了。再如，插秧机一坏，机手不会修，停在田头，有人看了，风言风语又多起来了。这又给我们提出了要加强农机维修和机手技术培训的工作。这些问题不解决，也影响插秧机的推广使用。我们强调公社干部蹲点参加生产、指导生产的同时，加强技术维修力量，每年举办两次机手技术训练班，逐步培养起一支能用、能修、能改插秧机的农业技术队伍，有力地保证了插秧机的推广。

几年来，随着插秧机的逐步推广，我们公社的粮食产量也逐年上升。一九七三年，水稻种植面积比上年减少了二千五百亩，而产量却增加了一百四十万斤。由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解放了大批劳动力，棉田管理也有了加强，棉花连年获得大丰收。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指示，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取得使用插秧机的自由，为加速实现农业机

械化而不断努力。

中共嘉定县望新公社委员会

坚持政治挂帅, 认真落实政策

——嘉定县朱桥公社灯塔二队贯彻“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原则的调查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嘉定县朱桥公社灯塔大队第二生产队已经连续十二年获得了丰收。这个生产队有集体耕地三百零五亩, 平均每人二亩半, 每个劳力四亩二分。粮食作物占耕地面积的一半, 大部分实行三熟制, 其余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一九七三年, 粮食常年亩产二千一百七十九斤, 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产五百七十一斤。其中后季稻已连续五年一季跨《纲要》, 一九七三年亩产一千零十五斤。早稻连续三年超千斤。棉花连续十年保持百斤以上。生猪饲养量四百三十七头, 平均每亩一点四头。按总人口平均计算, 每人向国家提供一千零十六斤粮食、一百三十一斤棉花、一点四头肉猪。集体经济更加壮大。生产队有公共积累十五万元, 存款四万三千元, 储备粮十五万五千斤。社员个人收入也不断增加。一九七三年每人平均分配二百八十一元。现在家家有储蓄, 户户有余粮, 呈现了一派蒸蒸日上

的繁荣景象。

灯塔二队集体经济越办越兴旺，关键是由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党在农村中的各项具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入开展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这个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处处以大寨为榜样，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革命促生产，精神变物质，带来了集体经济的大发展。

灯塔二队集体经济不断发展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正确地处理了人们在集体劳动中的相互关系，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

落实党的政策 促进集体经济不断发展

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是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巩固集体经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执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总是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个问题，灯塔二队的同志开始并不明确，而是在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的。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中，由于受刘少奇宣扬的“物

质刺激”、“工分挂帅”等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谬论的毒害，这个队的干部一度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往往单靠增加或降低工分报酬的办法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在劳动计酬方法和管理制度上，花了许多精力，搞得烦琐复杂。结果光顾自己工分的人多了，关心集体的人少了，歪风邪气抬头，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通过革命大批判，他们破除了烦琐的劳动计酬方法，学习和采用了“标准工分，自报公议”的先进方法，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由于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一度又出现了“不分劳动数量质量，大家工分一样”的另一种错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又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劳动效率和农活质量都有所下降。“这样下去，生产能搞好吗？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许多贫下中农都纷纷议论起来。

这时，队干部联系实际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和党的政策。毛主席教导说：“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早在人民公社成立的初期，毛主席、党中央就指出，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他们越学心里越亮堂，联系本队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毛主席规定的政策原则，代表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是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重要保证，丝毫不能

违背；搞“工分挂帅”，必然走上资本主义邪路，瓦解集体经济，搞平均主义也会破坏社会主义原则，同样要挫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都是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于是他们就同群众一起，进一步开展大学习、大批判，划清按劳分配和“工分挂帅”的界限，共产主义风格和平均主义的界限，研究改进劳动计酬的方法。大家认为，“标准工分，自报公议”，也就是提倡一心为公劳动，自报互评工分，这既体现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又符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应当坚持，但不能生搬硬套，要同本队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因此，对大部分农活即集体干的大田农活，仍根据劳动等级按时记工，对于只需少数人操作、便于利用辅助劳动力和利用业余时间操作的少量农活，如翻泥、运输、搓草绳等按定额计酬。对各个劳动力等级之间工分报酬差距过小的情况，作了适当调整。坚持每月评工一次。评工计时区分劳动多少、质量好坏、技术高低、辛苦程度以及农忙农闲等不同情况，做到有适当差别，并贯彻男女同工同酬。如男劳动力翻泥、运输，女劳动力拔秧、插秧等辛苦程度都比较高，报酬适当高一些；饲养员比同等级的劳动力多劳动的天数，照数给予工分；老年社员，体力衰弱，但有技术专长的，适当提高劳动等级；抢收抢种大忙时，工分报酬也高于平时。为了更有效地组织集体劳动，他们又把全部劳动力合理搭配，划分了若干个相对固定的劳动组和临时作业组，相应建立了生产责任制和劳动考勤制度。实践的结果，这些做法，简便易行，群众欢迎，显著提高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劳动效率。

同时，在搞好集体经济的前提下，还鼓励社员种好自留地，搞好养猪等家庭副业。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得到落实，有效地促进了集体经济稳步向前发展。

做好政治工作 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贯彻了具体的经济政策，建立了必要的生产责任制，政治工作是不是可以放松一点呢？不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灯塔二队干部，对于这一点是清醒的。他们始终牢记党的基本路线，遵照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教导，几年来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纲，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并注意“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不断提高社员为革命种田的觉悟，不断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有了切实的保证。

他们经常同社员一起，讲家史、村史、社史，回忆对比，进行阶级教育。解放前讨饭、做长工，“衣裳袋里余米吃”的苦日子；刚办初级社时，为买一只牛鼻链只凑集了二角七分钱的艰难，贫下中农都一直记在心里。阶级教育成为为革命种田的强大推动力量。年近六十岁的老饲养员老徐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积极负责，热爱集体，从不计较报酬。饲养场的扫帚，都是他动手扎的，已七年不买了。场地上和饲料草上的谷粒，他总要一颗颗地收集

起来，每年都要拣稻谷、玉米等一、二百斤交给集体。有人问他哪来这股劲，他说：“不忘过去的苦，工作就有劲了，大家关心集体，集体才能办好。”

算细账也是常用的办法，即抓住具体问题向群众作细致的分析，从经济账算到政治账，以小见大，进行爱国家、爱集体的教育。如有一次拣棉种，有少数社员拣得马虎，不符合质量要求，队干部就立即抓住这件事算细账，从一粒棉种长成棉花要多少人工成本，一朵棉花派多少用场，种子质量好坏对集体生产的影响，一直算到对国家建设和国防的关系，对保牢社会主义江山的关系到，使群众把个人的劳动态度同国家、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更深刻地理解毛主席关于“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的教导，更自觉地为革命种田，关心农活的质量。现在见到地上一朵棉花、一根稻穗都要拾起来，交给集体，已成为灯塔二队的风气。

群众中总是有先进、中间、落后三种状况，自私自利的人还是有的。好人好事一出现就及时表扬，歪风邪气一露头就立即批判。队里有个每天“工后集中”的制度，在每天歇工以后，集体汇报数量、质量，发扬先进，带动落后。每月一次评工会，都是着重进行阶级教育，评比表扬，使社会主义正气始终占上风。有个上中农是个“工分迷”，经常投机取巧，干活不顾质量，干部、群众就经常批评教育他。有一次车干河浜挑黑泥积肥，他却挑河边的黄泥，还说什么“黑瘦黄壮，不施上当”。干部就组织社员到现场去看，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使他不得不承认

错误。一位贫农老妈妈在麦田锄草时发现有些碎砖瓦、玻璃片，心想：“年青人种稻时要戳坏脚的”，就第一个每逢锄地都背上竹篓，一见碎片就拣起来。队干部大力表扬。现在社员们都这样做了，已经形成了习惯。一九七四年早稻育秧，负责催芽育秧的是两个女青年。她们冲破了妇女不育秧的老习惯，主动挑起重担，不懂技术就拜老农为师，虚心学习。每天晚上，她们睡在种子旁边，按时翻动，手指皮磨破了，眼睛熬红了，从不喊苦、叫累。由于精心管理，稻谷发芽整齐，早稻秧苗生长健壮。生产队干部及时表扬了她们，其他女青年也带动起来了。

他们还经常针对不同对象不同思想，采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开展谈心活动，做好个别教育工作。

由于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在广大群众中形成了“为革命种田光荣，争工分多少可耻”的新风气，劳动讲究数量质量，生产技术精益求精。队干部深有体会地说：劳动管理，首先是“思想管理”，有了正确的政策和合理的制度，还要有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没有好思想，办法再多也没有用。

干部模范执行和捍卫政策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二队的干部常说：“打铁先要本身硬”。他们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模范遵守各项政策和制度，并且敢于捍卫党的

政策。

干部要做执行政策的模范。这个队的干部认为：“制度是我们干部和社员一起订的，如果我们不以身作则，甚至破坏制度，生产队就搞不好。”妇女队长小徐的父亲是生产队的饲养员。有一次他私自选捉了一头小猪，小徐知道后，当夜召开家庭会议，同父亲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教导，进行了新旧社会的对比，使父亲认识了错误，第二天一早就把小猪抱回猪棚，以实际行动维护了集体制度，得到了社员的好评。队委干部个个以身作则，抢挑重担子，困难的事抢着干，从不多占一点工分，多分一斤粮草，多支队里一分钱。副队长老王劳动一贯冲在前，干得又多又快。另一个副队长老徐也是一样，遇到天雨路滑，队里出售蘑菇，他就挑担走七、八里路送往收购站。群众说他们是“一心为公的苦干队长”。但这些同志在评工分的时候，总是一再谦让。他们对自己的家属也要求很严。有的干部家属已连续好几年被群众评为积极分子。干部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出外干集体农活，在规定时间内不办私事，从大队开会回来，如社员尚未收工，也要参加劳动。这些都对社员起了很好的榜样作用。许多社员说：“我们队的干部，让的是工分，不让的是革命。”大家都学着干部的样，干活不怕困难，评工互相谦让。有些社员到集镇上装肥料，也都按时回队，不为私事耽误时间。

干部经常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队的干部认为，正确执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必须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他

们对人多劳力少或体弱有困难的社员，总是多方照顾，安排他们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多得些工分。最突出的是吴小弟一家，六年前他母亲死了，留下四个孤儿，最大十七岁，小的七岁。队干部和社员都很关心他们，教年龄大一点的学农活，带着他们干，雨天让他们多做一些轻生活，还帮助他们安排生活，教他们节约用粮，节约用草，种好自留地，使他们一直没有超支，近几年除分足粮草外，还分到现金数百元。

灯塔二队的干部做工作不看苗头，而是看路线。对于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错误倾向敢于抵制和斗争。当他们改进劳动管理、落实党的政策的时候，曾经遭到有些人的批评和指责。有人认为这样划分劳动组，建立责任制，是三自一包；自报互评工分是争工分，是工分挂帅。但这个队的干部并没有因此动摇，他们依靠群众，同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指示，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来对照。大家反复议论，一致认为，我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执行按劳分配政策，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家关心集体、热爱集体，为革命种田，不计较工分，集体经济越办越好，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怎么能同过去“只顾个人千分，不顾集体千斤”的“工分挂帅”混淆起来呢？解放军分班、排，打仗时分阵地，工人劳动也分班、组，有责任制，我们农民种田怎么能大呼隆，不要生产责任制呢？这同“三自一包”是根本不同的。这样经过反复议论，界限就更明确，信心就更坚定了。后来又得到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的支持，帮助他们总结

提高。这样,几年来就一直坚持这些做法,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提高,取得了革命和生产的不断胜利。

嘉定县委写作组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我们大队地处上海市近郊，是个粮菜夹种地区。全大队有九个生产队，土地二千四百五十多亩，劳动力一千二百人，其中妇女劳动力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过去，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以及旧的习惯势力和孔孟之道的影 响，男女同工同酬原则长期没有很好落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男女同等劳动力每天工分标准差距近三分之一，一年大约相差一千工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中，广大社员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男尊女卑的孔孟之道，使男女劳动力的工分差距进一步缩小。但是，“男十分，女八分”的框框仍旧严重地影响了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广大社员，特别是女社员迫切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一九七三年春天，我们以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为纲，在吴家宅生产队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试点。在此以前，吴家宅生产队曾对女社员的工分作了一些调整，由老八分改为八分半。由于没有抓紧路线教育，开展革命大批判，有些受旧思想毒害比较深的人总是疙疙瘩瘩，认为女的总归比不上男的，男社员工分高一点是应当的。女社

员也有自卑感,认为“冷饭冷粥好吃,冷言冷语难受”,宁可不要增加工分。结果男女同工同酬还是实行不了。这种情况说明,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对几千年来的旧传统、旧习惯势力和孔孟之道的有力冲击和批判,是一场严重的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离开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政策也落实不下去。

这一次我们在进行试点时,重视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首先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等教导,进行回忆对比,大摆新社会妇女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深入批判“妇女落后”、“妇女无用”等谬论。吴家宅生产队有土地三百四十六亩,粮菜各半,劳动力一百三十多人,妇女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解放以来,她们不仅在阶级斗争中同男同志并肩战斗,在生产斗争中也同男社员一样,“热汗化作春雨下,战天斗地广积粮”,使队里由吃统销粮变为口粮、饲料、种子三自给,蔬菜生产也有所增长,对发展集体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经过学习,大家认识到现在女社员同男社员一样,都是集体经济的主人,在革命和生产中起了“半斤天”作用。实行男女同工同酬,调动广大妇女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也是关系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展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一件大事。

在社员和干部思想提高的基础上，经过民主讨论，对原有的评工记分办法，实行了改革。

一改过去男女两个标准分为一个标准分。不问农副业，男女劳动力干同样的活，根据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一样评工记分。

二改过去的全年固定标准分为不同季节的标准分。我们粮菜夹种区常年不闲，扩大粮食三熟制后，一年三个大忙季节，农活集中，天气热，劳动时间长，比较辛苦，尤其是女社员负担着拔秧、插秧、收割等任务，更为辛苦。为了贯彻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必须分别大忙和平时，规定不同的标准分：平时每天为十分，忙时为十一分半或十二分。

但是，到实行这些改革的时候，有些人又想不通了。他们说：“男女同工同酬可以，要比比力气，一样干，才服贴。”这不仅反映了思想上有反复，也说明了他们错误地理解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以为样样农活女社员都要能和男社员一样地干，才能同工同酬。这使我们认识到，不仅要批判旧思想，而且要使大家正确理解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我们发动全体社员，摆事实，讲道理，对男女社员干的农活进行分析。大多数社员认为，有些农活如挑担、鬲河泥，女社员不如男社员；但也有一些农活，如拔秧、插秧、收割，男社员往往比不上女社员，笼统地说男社员的劳动胜过女社员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还有人不服气，说“口头官司打不清，田头一做就分明”。后来，他们看到男女社员一起割麦，女社员比男社员割得又快又

好以后，才信服了。有的男社员说：“看看轻煞，做做累煞，割麦不比挑担省力。”事实证明，男女劳动力干活各有所长，一般来说，男社员体力虽然比女社员强，但并不是在所有的农活上都能超过女社员。而且，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原来需要男劳力挑水浇菜，早就由水泵打水代替；过去靠人把粪从船上挑到田头的粪池里，也用吸粪泵代替了；挑稻、挑麦、挑菜等重活也多数用劳动车、手扶拖拉机装运了。条件变了，这些过去只能由男社员干的农活，现在女社员也能干了。干同样的农活，如果能达到同样的数量和质量，那还有什么理由男女不同工同酬呢？

经过这样的议论分析，不仅提高了大家的思想，也正确地理解了党的政策：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劳动计酬的标准是根据每个社员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而定，决不能把男女性别作为评定工分高低的依据。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既不能不顾妇女的生理特点，要求女社员样样农活都同男社员一样地干；也不是不问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把女社员的工分标准一律提高到同男社员一样。一九七三年，经过多次评工的结果：平时最高标准分为十分时，男社员评得九分到十分的占百分之八十五，女社员评得八分半到九分半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忙时最高标准分为十二分时，男社员评得十一分半和十二分的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女社员评得十分半到十一分半的占百分之七十。一月一次的评工会，既评工分，更评思想，表扬先进，批评缺点，

实际上就是一次民主生活会，使社员之间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社会主义新风尚日益形成。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有利于调动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许多女社员冲破了老框框，干起了过去只有男社员干的农活。全队有二十多个青壮妇女新买了粪桶，参加挑粪，不少女社员学会了鬲泥，女社员也和男社员一样，随拖拉机装运蔬菜到市区，而且积极参加了做秧田、落谷等技术活。她们豪迈地说：“毛主席为我们妇女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为了抢季节，夺高产，她们早出工，晚收工，争干重活、累活。一九七三年冬，菜田急需挑粪追肥，麦田也要浇河泥浆，劳动力安排有困难。女社员就主动请战抢挑重担。三十多个女社员突击挑粪六小时，完成了二十五亩菜田的追肥任务；以后，六十多个女社员参加突击扛河泥浆，连续两天，把二十多亩麦田都浇上了又黑又肥的河泥浆。她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妇女的伟大作用。男社员夸奖说：“妇女真的顶起‘半边天’了！”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我们组织大家反复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有关文件，联系本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狠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孔孟之道，深挖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封建思想的老根。吴家宅生产队五十多岁的老队长深有体会地说：“‘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几千年来剥削阶级压迫妇女的精神枷锁。我过去也中毒很深，认为妇女总归不如男的。实践使我认识到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男

女同工同酬的原则,彻底肃清头脑里的重男轻女思想,决不能再上孔老二的当了。”吴家宅生产队实行男女同工同酬试点取得成功,有效地带动了全面,使其他八个生产队在实行男女同工同酬问题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共宝山县江湾公社江杨大队支部委员会

贫下中农要牢牢掌握集体经济的财权

——川沙县北蔡公社实行经济民主的调查

北蔡公社毗邻上海市区，除种植水稻、棉花以外，有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植蔬菜。因此，许多生产队都要派人经常往返市区运送蔬菜，采购生产资料，收支往来十分频繁，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也比较尖锐、复杂。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北蔡公社党委认真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于一九七〇年冬开始，普遍建立和健全了经济民主制度：在党支部领导下，各生产队和大队企业建立贫下中农经济监督小组，协助和监督干部管好财务；生产队会计实行账目上墙头，每月向社员逐笔公布，每五到十天口头汇报一次收支明细账。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许多生产队进一步把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结合起来，每月定期开展“民主日”活动。在这一天，全体社员聚集一起，由队委汇报一个月的各项工作，会计汇报一个月的财务账目。社员既审查账目，又评议干部作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搞好评工记分。现在全公社一百二十三个生产队，都能坚持实行这种民主制度，开展“民主日”活动。

北蔡公社建立和健全经济民主制度以来的事实证

明, 实行经济民主制度, 有利于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深受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拥护和欢迎。贫下中农都说, 实行经济民主, 贫下中农牢牢掌握财权, 这是一件“当家作主的大事”。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高了,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 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发扬经济民主, 使集体经济的财权牢牢掌握在广大贫下中农手中, 保证了公社各级党组织更有效地掌握了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的主动权。

过去, 在经济问题上, 公社各级组织只注意自上而下的检查, 但却忽视了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监督。因而财务制度不健全, 有些生产队用钱往往由少数干部决定, 不注意同群众商量, 少数坏人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就乘机钻空子, 损害着集体经济的巩固。建立和健全经济民主制度以来, 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通过贫下中农经济监督小组的积极活动, 财务制度上的漏洞一个一个被堵住了。资本主义倾向一露头, 很快就会受到贫下中农的批判。一九七三年, 有一个生产队的坏分子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 要求增加外出运输的补贴费, 队长为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不同群众商量就擅自同意了。贫下中农经济监督小组发现后, 马上组织群众讨论靠什么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 是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还是靠修正主义物质刺激? 通过讨论, 队长受到了教育, 自觉地作了检讨, 并且主动带领群众对那个坏分子进行批判。有的干部为了增加小集体的收入, 企图不按照国家计划, 搞自由

种植、跑自由市场，贫下中农经济监督小组一发现就出面制止。“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实行经济民主，及时煞住资本主义歪风，个别贪污盗窃行为也很快就暴露出来，受到贫下中农的打击。

发扬经济民主，使贫下中农牢牢掌握集体经济的财权，也是贯彻执行勤俭办社方针的可靠保证。

随着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兴旺，集体的家底也越来越厚实了。家大业大，有些干部大手大脚花钱的作风也有所滋长。例如，塑料薄膜过去一般用一年多就报废了，浪费很大。自从建立和健全了经济民主制度，建立了贫下中农经济监督小组以后，许多贫下中农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爱惜，随便糟塌，很是心疼。他们把住了财务关，自觉地建立了一套集体财产的使用保管办法，损坏的尽量自己动手修理，旧的经过修理可以用就不买新的。自从建立这个制度以来，塑料薄膜经过修修补补，一般都可用三、四年。单是这一项支出，一个生产队一年就可以节省三、四百元。更重要的是，勤俭节约的革命精神得到了发扬，广大社员更加热爱集体，更加动脑筋、想办法，开源节流，为壮大集体经济尽自己的努力。过去，搭蔬菜棚架，都是靠国家供应篱竹，每年都要支出很大一笔费用。现在，经过社员提议，大多改用在河边路旁广泛种植的芦竹代替。这种芦竹还可以用来搭建鸡棚、猪圈。近两年，全公社种植的芦竹每年都要收获两万多担，做到百分之九十自给，节约开支近十万元。

发扬经济民主，贫下中农掌握集体经济的财权，对于

推动干部改进领导作风,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也是有力的促进。

张桥大队郭家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工作是认真的,干劲也是大的,毛病就是不善于倾听群众意见。经过几次“民主日”活动,群众对他耐心帮助,既肯定他的优点,又指出他的缺点;一有改进就鼓励,发现他主观武断就敲警钟。这使他深受感动。现在,他有事都能耐心地同群众商量。干部转变了作风,又反过来影响了群众。一个向来不爱讲话的社员也活跃起来,敢于向干部提出批评建议,他说:“干部虚心听我的意见,我挑担子也轻了。”有一次夜里下大雨,这个生产队的干部担心田里积水,天一亮就起来布置社员疏通排水沟。但是群众比他们起得更早,已经主动干起来了,并且笑着说:“这回布置晚啦!”使干部十分激动。他们说:“真正发扬了民主,集体的事大家都操心,工作比过去好做多了。”这样的生动事例,标志着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正在逐步形成。

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以主人的姿态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日夜操心,迅速地推动着集体经济多快好省地蓬勃发展。整个公社连续多年增产增收。一九七三年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一千六百八十九斤,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三。农业成本从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三十一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二十六。集体积累和社员收入也不断增加。一九七三年,每个社员分配水平达到一百九十六元。所有的生产队都

已经不要国家贷款和预购定金；超支户大大减少，已有三分之一的队做到无一户超支集体的钱。

北蔡公社近四年来的实践证明：经济民主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建立和健全起来的，同时它也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必然产物。他们的具体经验是：

第一，坚持以基本路线为纲，向干部和群众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是要求干部把是否支持经济民主制度，提到承认不承认贫下中农是集体经济的主人、承认不承认贫下中农必须掌握集体经济的领导权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干部自觉地支持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积极促进它的成长。

在开始建立经济民主制度的时候，有些干部担心：“事事让群众来管，干部难当了。”有的说：“我就是贫下中农，还要受贫下中农监督吗？”针对这些错误思想，公社党委组织干部反复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和“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的教导，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散布的“英雄创造历史”、“群众落后论”等谬论，提高依靠贫下中农的自觉性。同时，公社党委还经常运用本公社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来教育干部和群众，加深理解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贫下中农掌握集体经济财权的重要性。使大家看到，每经过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贫下中农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在农村发动的进攻，贪污挪用等资产阶级歪风邪气就收敛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正气

就大大发扬。但是，只要我们放松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批判，不充分依靠贫下中农，资产阶级歪风邪气又会重新抬头，资本主义倾向又会重新滋长。许多干部通过反复学习、讨论，提高了思想，都比较自觉地维护贫下中农的领导权。他们经常主动关心、支持贫下中农经济监督小组的工作，互相帮助，共同掌好集体经济的财权。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又进一步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狠批了“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孔孟之道，维护经济民主制度的自觉性更高了。

第二，积极支持贫下中农经济监督小组、生产队干部、财务会计人员对于违反党的方针政策、损害集体利益的不正之风开展坚决斗争。中界大队有个生产队长，在一九七二年三秋大忙时节，为了使拖拉机手积极干活，竟用集体的钱请他吃喝。生产队会计认为这是不正之风，拒绝报销，并得到经济监督小组的支持。但是这个队长不服气，说是“为了集体”，还批评会计“不服从领导”。大队党支部就抓住这件事，在“民主日”活动时表扬了会计和经济监督小组，并对这个队长进行了耐心而又严肃的教育，提高了他的认识，自觉地作了检讨。广大社员群众高兴地说：“现在上有党委、支部领导，下有经济监督小组撑腰，集体经济一定越办越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批判孔老二的中庸之道，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这种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更进一步得到了发扬。

第三,努力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会计队伍。过去,由于公社党委放松了对会计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一部分会计人员有不同程度的不安心工作的思想。有的说:“一把算盘一支笔,算来算去没出息。”有的担心:“经手钱财担风险,运动一来不保险。”有的顾虑:“坚持制度得罪人,顶撞干部穿小鞋。”这几年,公社党委认真加强了对会计人员的领导,每年都要专门举办两期全体会计人员参加的学习班,组织他们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总结工作,提高思想认识,牢固地确立为贫下中农掌好财权的观念。对会计业务,也责成公社财务部门加强辅导。各大队党支部也加强了对生产队会计的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每月一次的互查会审制度,互相审查账目,不断提高会计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

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会计人员搞好工作的信心和责任心。有个生产队的青年会计,当经济监督小组刚刚成立,开始审查他的账目的时候,他以为是对他不信任,把账本一甩,说:“不干了”。经过党组织耐心教育,经济监督小组又说服了有些社员遵守财务制度,及时归还超支、借支的钱,还帮助他查出了一些错账、漏账,积极支持他做好工作,使他深受感动。后来,他不仅积极完成任务,而且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便于社员监督往来收支账目。他坚持每月把收支账目写成大字报在墙头上公布,还用图表把当月收支情况同上年同期相比,使广大社员群众都能一看就懂,便于大家分析收支增减的原因,讨论增加生产、降低农本的措施。贫下中农称赞他是“我们生产队

的‘红管家’”。现在,大多数会计人员都积极负责,同经济监督小组密切配合,努力做好财务工作,表示决不辜负贫下中农的委托,一定要为贫下中农算好“翻身账”、“幸福账”。

勤俭经营是人民公社的基本原则

——嘉定县桃浦公社李子园大队的调查

嘉定县桃浦公社李子园大队，位于上海近郊，以种植蔬菜为主，近年来也种一些粮食，是以勤俭办社闻名的一个单位。它的前身就是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肯定了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并指出：“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

将近二十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李子园大队的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始终保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源节流，勤俭办队，促使生产连年发展，成本逐年降低，集体积累和社员收入不断增加。一九七三年，蔬菜常年亩产超过一百担，比高级社时期增加一倍多，还做到了均匀上市，一九七〇年开始种水稻。一九七三年三百零四亩水稻，

常年亩产一千六百七十斤，总产达五十余万斤，相当于全大队社员七个月的口粮。农业生产费用占农业收入的比例，高级社时期为百分之三十，文化大革命前降为百分之二十六点六，到一九七三年又降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三。一九七三年，生产队、大队两级当年提留的积累达三十三万七千多元。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一九七三年按人平均是二百四十五元，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五，比高级社时期增长了三倍多。

在斗争中前进

李子园大队一贯坚持勤俭办社的过程，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以及种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

一九六八年春，第二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为了节约材料，把用了几年已经断掉的棚架竹用废铁丝和草绳一段一段接起来重新使用。队里有个坏分子见了就刮阴风，说这样做浪费人工，是得不偿失。队委会意识到这是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攻击和污蔑，是要我们贫下中农丢掉勤俭办社的传家宝。马上发动群众，上挂黑主子刘少奇，下打活靶子，狠批“勤俭办社是得不偿失”的谬论。通过革命大批判，毛主席关于“艰苦奋斗”、“勤俭办社”的方针在广大社员群众和干部的头脑里更进一步扎下根子。大家坚持利用雨天和晚上接棚架竹，一年就节约开支四百多元。

一九六九年秋遇到一场暴雨，大量蔬菜地被淹。在困难面前，有人提出用手扶拖拉机搞运输，增加收入。阶级敌人也煽动“赶快出去捞点‘外快’回来过年”。大队党支部及时举办了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按语，批判了坏人，教育了群众。贫下中农立即开展排除积水、突击补种的生产救灾运动。不到十天，灾后的“一片白”，变成了“一片青”，仍然夺得了蔬菜丰收。多年来，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社员还坚持做到“三个不准”，即不准弃农经商，不准重副重工轻农，不准开后门和搞修正主义的物物交换。大家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新发展，李子园大队农副业生产水平逐年提高，集体积累越来越多。积累多了，条件好了，还要不要坚持勤俭办社？这时，少数人滋长起用钱大手大脚的资产阶级坏作风。他们认为：“穷的时候要讲节约，现在富了，日子好过了，何必再扣得那么紧。”“李子园大队家大业大，用掉一点等于牯牛身上拔根毛。”针对这种思想，大队党支部又组织广大干部群众重新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按语，经常同大手大脚的资产阶级思想开展斗争。一次，有个大队干部出差，花了十六元钱，买了十四尺绸布带回来，准备做一面李子园大队队旗。党支部书记发现后，及时对他进行了批评。这个干部思想不通，支委会和革委会针对这个问题开展小整风。整风会上，大家对照毛主席关于两个“务必”的伟大教导，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从路线斗争高度，帮助这个干部认识自己的错误。在大家的帮助下，这个干部主动

作了检查。

一九七四年春天，大队准备修筑地下渠道。一千一百多节水泥瓦筒已经买好了，但需要从八、九里外的桃浦新村搬运回来。每节瓦筒重约四百斤，当时蔬菜地里农活很忙，抽不出那么多劳力去搬运。有人主张请人运，还说，大队积累有几十万元，花这点运费有啥了不起。党支部抓住是自己运还是请人运这个问题，发动干部、群众开展大讨论。大家说，如果在办社初期，根本不会想到请人运的问题，一定是自己运。为什么现在却会想到请人运而不坚持自己运呢？这说明有些人看到集体经济富裕了，以为勤俭办社可以丢掉了。贫下中农说，勤俭办社决不是权宜之计，家业大了，更应该坚持勤俭办社。思想一通，各个生产队都发动社员，利用了三个晚上的业余时间，就把二百二十吨瓦筒全部搬运了回来。不但节约了一千多元运费，更重要的是使干部和社员又一次受到了生动的艰苦奋斗、勤俭办社的教育。

李子园大队为了把勤俭办社的优良传统世代传下去，规定每年十月为毛主席按语学习宣传月。每年到了十月份，党支部就要专门举办学习班，组织全体社员分批参加。在学习班里，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开展革命大批判，总结革命和生产的经验，发动社员对干部提意见，讨论勤俭办社措施，使干部和社员始终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勤俭原则，在斗争中不断前进。

五条有效措施

李子园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根据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多年来实行五条措施，对增加生产、降低农本和减少非生产性开支，发挥了有效作用。

一、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一九七一年秋天，在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大队开门整风，贫下中农提出：种菜人要为吃菜人着想，要为工人老大哥多生产蔬菜，增加花色品种，做到均衡上市。大队党支部觉得贫下中农的建议很对，批判了“满足现状，保持荣誉”的自满保守思想。为了实现贫下中农的建议，制订了治水改土规划。广大干部、社员在治水改土过程中，学习大寨的大干、苦干精神，冒严寒，下冰水，开河填浜，平整土地。两个冬春就开了两条新河，填平大小河浜十七条，造了一座排涝水闸，削平了高亢地三百多亩，改造了低洼易涝地，引来了清水灌溉。初步解决水、土问题后，又努力增加花色品种，进行插种、套种。

为了大积肥料，他们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全大队连续八年超过一亩地一头猪，一九七三年，达到一亩一点七头，部分生产队实现一亩地两头猪。此外，广大群众利用农闲时间，挖河泥、割青草、堆肥、造肥。近年来，许多生产队还建立了积肥专业队伍，经常到附近工厂、集镇扫垃圾，拾菜皮。有的生产队每年积有机肥三、四万担，平均

每亩田施三百多担。国家供应的化肥尽量施在季节上、刀口上。对蔬菜的病虫害做到防治结合,以防为主,使用农药讲究效果,研究喷药时间,改进喷药技术,努力避免“放空炮”和“马后炮”,尽可能做到“当头炮”。大队还办起了种子场,不但引进良种试验,还自己搞杂交,培育良种。由于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蔬菜已从高级社时期的四十六个品种,发展到一九七三年的一百七十八个品种。既增加集体收入,又保证了市场的均衡供应。

二、加强农机具的保管和维修。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以后,各生产队都增添了许多农业机具。现在,全大队有丰收45型拖拉机一台,手扶拖拉机十八台,运输汽车一辆,还有抽水机、脱粒机、饲料粉碎机等大中型农机具,共一百多台、件。有一个时期,农机具管理得不好,修理费用很大。贫下中农说:“财产物资不会走路,东丢西散原因在人不在物,管理物资先要管理思想。”大队党支部十分重视贫下中农的这个意见,加强了思想工作,使广大社员都热爱集体财物,自觉遵守制度。农机具用好后,及时放进仓库,不随便乱丢。粉碎机、脱粒机经常擦得干干净净。露天使用的机具,晚上总要盖一张塑料布,不让它遭到雨淋。他们还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自己动手修理农机具。高级社时期添置的一些农具,至今仍在用。第四生产队的一只打气筒,是一九五四年买的,修了又修。一九七二年有人认为该“退休”了,准备买只新的,老贫农徐伯伯不同意,拿回去利用休息时间修理,到目前仍

在继续使用。全大队现有七十多名不脱产的土技术员，他们在各生产队边参加劳动，边修理农机具，而且随坏随修，既及时，又省钱。现在他们已能做到拖车、喷雾器的修理不出生产队，手扶拖拉机的中修不出大队，在这方面，全大队每年就能节约二千多元。

大队农机修配站也积极为农业生产服务，千方百计支援农业。一九七三年他们就利用废料旧料，主动为生产队做诱蛾黑光灯，修理饲料机，还制造了两辆运肥粪槽车，一辆可装一吨，既提高了运输能力，又减少了浪费。

三、减少脱产人员和非生产性用工，节约非生产费用。这个大队除了一、二把手和大队会计半脱产以外，其余干部一概不脱产，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因公出差，随误随记。平时精简会议，一般会议放在晚上或雨天开。三个大队主要干部一九七三年平均参加集体劳动一百三十八天。大队“赤脚医生”每人每年保证有三分之一以上时间参加劳动。非生产性费用做到尽量节约，全大队十二个生产队，尽管生产有很大的发展，但没有买过一张办公桌，没有增添一只新账箱，还是用饭桌当写字台，用旧肥皂箱、药水箱装账册。

四、建立财务制度，依靠群众把好财务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子园大队建立了每月一次的财务民主活动日制度和生产队财务监督小组，依靠贫下中农，加强财务管理。在每月五日的财务民主活动日上，队长总结上月工作，会计公布账目，出纳当场检点现金，社员议

论生产工作。账目的公布，做到口头公布和上墙公布相结合，文字和图表相结合。有一个生产队，个别人通过私人关系去购买拖拉机零配件，要向生产队报销十多元钱的烟酒招待费。在财务民主活动会上，社员群众当场提出意见，并对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现在，在大队的各生产队间还开展“五比五看”的活动：比执行政策，看坚持制度；比财务公开，看上墙公布；比民主理财，看民主日活动；比物资保管，看仓库管理；比会计报表，看及时正确。

五、因陋就简地搞基本建设。第七生产队建造两排猪棚，椽子用旧的棚竹，四周围的墙是草泥一块一块叠起来的，上面盖的是秧棚上用过的稻草。各生产队造的发展副业生产的房屋，都是自己动手，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坚持勤俭创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大队自己动手建造房屋近百间，节约集体资金四、五千元。一九七二年大队要建造拖拉机桥，材料不够，怎么办？有人说向国家买，有人主张把埋在附近桃浦河里已有多年的废水泥桥桩拔起来用。党支部组织干部和社员重温了毛主席的批示，一致认为“家业大了，勤俭办社精神不能变；收入多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能丢”，决定动手拔废桥桩。经过大干苦干，终于拔起了废桥桩，又用大块废混凝土块做桥墩，不但按时完成了任务，而且节约了钢材九吨、水泥二十多吨和大量黄沙、石子，共节省费用六千多元。

干部以身作则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李子园大队所以能够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勤俭办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队的广大干部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艰苦奋斗，以身作则。

原合作社主任，现在的党支部委员老徐，今年已经六十一岁了。办社初期，他带领群众割青草，挖河泥，大积自然肥料。十几年来，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一九六九年，他担任生产队专业积肥员以后，每天清早，拉了拖车到附近的集镇和工人新村扫垃圾，拾菜皮，不管刮风下雨，从不间断。一九七一年春节期间，他照常拿了扫帚，到镇上去扫垃圾。现在他负责蔬菜种子组工作，真是人老心红，把全部心血用在为革命培育良种上。遇到暴风雨吹倒了棚架，冲倒了秧苗，他总是第一个冲出门去抢救。蔬菜秧苗上出现了病虫害，他就在又湿又矮的土暖棚里，和其他同志一起，细心观察，勤加防治，带头为全大队蔬菜种子的自繁、自给而操劳。原合作社副主任，大队党支部委员老周，也是一个勤俭办社的好干部。有一年，大队缺少一只恒温箱，买一只要花一千多元。他和社员群众一起动脑筋、想办法，群策群力，利用木板、木屑，再从旧货店买了一些零件，自己动手造了一只，只花了四十多元。党支部委员老孟，是当年带头办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老党员之一，她老当益壮，治水改土时，率领队

里的女青年，奔赴开河工地，天寒地冻，破冰下河。有的女青年有些犹豫，她一面鼓励大家“干一会就热了”，一面卷起裤管，带头下了河。第十二生产队队长共产党员老吕，重病初愈，刚从医院出来。群众劝他不要上工地，不要干重活，但是他坚持挑重担，带领社员一起在水利工地上开夜工。原七队会计、现任大队会计李妙琴，多年来没有向集体报销过一支原子笔、一瓶墨水。

老干部保持当年的优良作风，新干部继承革命的优良传统。党支部书记老曹，工作踏实，作风朴素。有一年，大队组织干部、社员去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参观，来回一百多里路，有的同志主张向工厂借汽车，老曹同志却建议骑自行车去。正因为有这样的干部带领，所以整个大队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风气。他们不但办集体经济坚持勤俭经营，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贯彻勤俭节约的精神，每逢过年过节、造房盖屋和办婚丧喜庆时，不搞请客送礼，不搞铺张浪费，树立了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的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风尚。

产量要上去，农本要下来

——上海县马桥公社紫兴大队坚持勤俭办社方针的调查

上海县马桥公社紫兴大队，紧靠闵行工业区，地少人多，平均每人只有一亩田，半数以上种粮食，其余种棉花。

这个大队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多年来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自觉地把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作为落实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大队党支部每年从头抓起，平时检查，年终总结，努力实现高产低农本。全大队在不断增产的同时，连续十二年，农业支出占农业收入的比重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一九七三年，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一千九百二十三斤，同十二年前的一九六二年相比，每亩粮食增产了百分之一百十四，而农本只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二。八个生产队，已连续八年不要国家贷款和预购定金。目前集体存款有十七万多元，储备粮够吃七个月，社员收入也显著增加。尤其可贵的是，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得到发扬，以铺张浪费为耻，以勤俭节约为荣，已经蔚然成风，社

会主义集体经济更加巩固了。

算勤俭节约的政治账

在夺取高产的过程中，要不要同时强调节约农本？在这个问题上，紫兴大队的干部是在反复的斗争中逐步提高认识的。过去，有些干部在抓生产的时候，只想到夺高产，不管节约农本，认为夺取高产有政治意义，多花点农本是经济上的小问题。有的还说什么，“只要产量上层楼，不怕农本高过头”，以为这是算的政治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有些生产队花钱大手大脚，积肥怕艰苦，就多买化肥，能动手修造的工具也花钱去买。

政治账应当怎么算？文化大革命中，大家通过学习党的基本路线，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工作，不断提高了认识。有个生产队粮食产量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花钱大手大脚，农本增加较多，使社员收入减少。一个富农分子还趁机在群众中煽动，说：“种一点葱，换一只钟。”一度刮起了一股不关心集体、热衷于家庭副业的歪风。这些事实教育了大家：经济问题同政治问题是紧密相关的。过去有些犯错误的干部，也往往是从大手大脚乱花钱开始，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侵袭，逐步蜕化变质的。这就促使大家认识到，在经济领域中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勤俭节约还是铺张浪费，决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小问题。紫兴大队党支部每年都要抓住这些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例，经常组织干部、

群众回忆对比,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斗争教育,启发大家不断发扬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阶级本色。

这几年,大队和生产队集体经济大大发展,家底越来越大,但干部和社员群众仍坚持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就拿肥料来说,如果派人到附近工厂做临时工,一人一天的工资可以买十多斤化肥,既挣钱,又比挑河泥、割青草省力。有个别人就曾经提出过这种主张,多数人则坚决反对,说:“图省力想赚钱,建不成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懒思想变,就要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他们坚持大积自然肥料。仅河泥一项每年都要挑二十多万担。积肥多了,买化肥就少了,去年全大队粮食亩产量高于全公社平均数二百多斤,施用化肥却比全公社平均数每亩少花四元多钱。现在,许多生产队虽然都有几万元的集体存款,但对于几元几角的零星开支,都精打细算,从不乱花。例如,拉柴耙、扫帚每把不过几角、块把钱,他们坚持自己动手做,从来不买现成的。化肥口袋里残留的化肥屑子,都要洗下来浇田。就连一截旧铅丝、一根绳头,也都捡起来保存备用。许多贫下中农说得好:“我们勤俭节约,不光是为了省几个钱,这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二队保管员老贫农老黄,无论走路、下田,见到散落的稻穗、谷粒都要捡起来,甚至看到轧谷时谷粒飞到屋顶上也要爬上去扫下来。一九七三年一年,他从屋上扫下的、麻袋里拣出的稻谷共有五十多斤。有人问他:“为啥工作这样顶真?”他回答说:“解放前种出的稻谷一粒也不是我们的,现在粒粒

都是社会主义的。我们要经常想想这一点，可不能忘本啊！”

每一元钱都要用在刀口上

农业生产中，由于各生产队自然条件不同，农作物品种、茬口安排不同，气候又经常变化，因而采取各项生产技术措施，都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使之符合客观的具体情况。这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坚持增产节约、勤俭办社，反对浪费的问题。但是，有些干部在指导生产中，往往不同群众认真商量，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或者对上级指示照搬照套，不从实际出发，搞“一刀切”，结果浪费人力物力，多花了农本，却收不到增产实效。特别是在防治病虫害工作中，这类事更容易发生。过去有几年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上面号召治虫，有些生产队就不管有虫无虫，来一次普遍打药水，这样，不但增加成本，有的甚至产生药害，造成减产。群众批评这种做法是“没有看到敌人就乱放枪”。

针对这些情况，大队党支部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关于“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教导，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使干部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不断发扬。这几年，这个大队在领导生产工作中，注意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有事和群众商量，实行生产民主，使生产技术措施努力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同时充分发挥水稻、棉花、灌溉、植保、

种子等专业管理人员的作用,组织他们学政治,学技术,经常总结交流经验,提高科学种田的水平。他们的口号是:为了夺取高产,该花的钱,几十元上百元也不惜本;该省的钱,一角一分也不随便花。

上面统一布置的生产技术措施如果不符合本队的具体情况,那怎么办呢?大队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的教导,不怕批评指责,坚决反对盲目性。以治虫为例,一九七二年九月,公社召开的防治稻飞虱现场会,要求各生产大队普遍打一次药水。会后,大队组织干部和老农、植保员踏田检查,许多田块发现有虫,他们就决定,有一块打一块,有一片打一片,七队、八队田里没有发现稻飞虱,就一块田也不打,做到“不见敌人不打枪”,避免了浪费。一九七三年,五队早稻田上刚发现虫害,他们在公社还没有动员以前,就突击普遍喷药,防止了蔓延,保证了增产。由于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防治病虫害的效果比较好,用药量也比全公社平均数低百分之二十。

集体的财产要靠大家来管

随着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农机、农具等集体财产越来越多了。怎样把它管好用好,这是坚持勤俭节约、降低农本的一个重要课题。

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些生产队经常发生各种财产物资损坏丢失，维修添置费用浪费很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认识到集体财产保管工作上的浪费原因尽管很多，但关键的一条是没有依靠群众。后来，他们认真实行了经济民主，提倡集体的财产大家来管，情况就有了显著的改变。现在，生产队普遍建立了贫下中农经济监督小组，定期公布账目。需要动用集体资金时，凡是用钱不多的，经队委会讨论；大笔支出，都要经社员大会讨论，这样就克服了过去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一九七三年，二队队长想花一千多元买一部新的脱粒机，购货单已经领来了，但是，拿到社员大会上一讨论，大家认为旧的还可以使用，暂时可以不买。结果，把购货单退了回去，节约了一笔开支。大队党支部还经常教育干部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制度。全大队九十多名干部、党员，除一人有特殊困难，经群众讨论，同意他向集体借支以外，都没有超支生产队里的钱。

发扬经济民主，依靠群众管理集体的财产和物资，使广大贫下中农进一步激发了当家作主的责任感，更加关心和爱护集体财产了。许多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为了防止老鼠咬坏筛子，用后都要收拾干净挂起来；为了防止铁铲生锈，用后都要擦干净，头朝上放在干燥的地方；塑料薄膜爱惜使用，破了及时修补，一般都能用上三年。六队在初级社时折价入社的十四只籰、十六条栈条、九只团箕，二十年来，年年修补，到现在仍在继续使用。这个生产队在一九六五年前后购置的三十八只氨水髻，包

括髻盖在内，到现在只只都完好，几年来，没有再添置过。

在不断揭露矛盾中胜利前进

生产年年在发展，勤俭办社方针年年在宣传，降低生产成本的工作也做了不少了。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进一步降低农本呢？有些同志认为，增产指标年年在提高，肥料、农药和农机具等的生产费用势必要增加，就认为降低农本潜力已经挖尽了。紫兴大队党支部从生产队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差距中，看到了增产节约的潜力，实现高产低农本，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努力去做。

紫兴大队有个制度：在年终分配结束时，党支部组织生产队干部一面总结工作，一面比先进，找差距。不但在大队内各生产队之间比，还同公社以外的先进单位比，发扬先进，教育后进，以此来进一步提高实现高产低农本的信心和决心。一九七一年，全大队各生产队之间，粮食亩产量高的队近一千七百斤，低的队只有一千四百多斤，相差近三百斤；农本比重，低的队只有百分之二十三，高的队却达到百分之二十八。其中，如二队和四队两个生产队，规模相等，土地、劳力、作物布局等条件都基本相同，产量也相差不多，但二队农本占农业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队占百分之二十八。大队党支部就召开现场会议，组织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一起参加，总结高产低农本的经验 and 农本高的教训。在这个会上，大家对二队和四队的

生产费用开支和集体财产保管使用情况，一项一项进行比较，从中找出农本高的原因和降低农本的经验。例如：塑料薄膜，两个队都买了二百八十八公斤，但二队用得爱惜，管得好，只损耗四两，四队损坏得厉害，而且有几十斤不见了，单这一笔费用，就要多损失二百多元；又如：劳动车的使用保管，四队修理费要比二队多花二百多元；养猪的青饲料，四队种的少，要到市区菜场去买下脚，比二队又多花四百多元；加上四队其他各种小农具损坏较多，总共比二队多开支一千多元。这样一对比，对四队队长的教育很大。他当场自觉地作了检查，说：“我原来以为只要提高粮食产量，话就讲得响，现在才看到了放松降低农本的工作，对集体、对国家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失。”其他生产队通过这次会议，也得到了启发，许多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主动比先进，找差距，针对自己队里存在的浪费漏洞，纷纷制订措施，改进管理，进一步挖掘增产节约潜力，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原来比较后进的生产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例如：上面说的四队，一九七三年粮食亩产提高到一千九百四十六斤，农本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六。原来比较先进的二队也继续前进，一九七三年粮食产量进一步提高，成本仍保持在原来的水平。

但是，正如紫兴大队干部所说的，增产节约没有尽头，进一步实现高产低农本还大有可为。这个大队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开展，他们决心通过这场政治斗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不断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上海市农业局、上海县农业局联合调查组

一定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 劳动的制度

——上海县新泾公社的调查

上海县新泾公社的公社和大队干部，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的伟大教导，多年来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九七三年一年中，公社十六个脱产干部，平均每人劳动六十三天，全公社十一个大队四十六个主要干部，平均每人劳动一百三十天。

新泾公社的社队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促进了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他们扎根于群众之中，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做到了劳动好，工作好，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日益得到巩固和发展。

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过去，新泾公社有一些干部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看法。有的认为，自己是工农出身，少参加几天劳动，影响不了思想革命化；有的认为，劳动

少几天关系不大,搞不好工作关系重大;也有的认为,“参加劳动,思想轻松”。

公社党委抓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过程,首先是提高干部的路线斗争觉悟,纠正这些错误看法。他们体会到,不抓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不认真做好干部的思想转化工作,参加劳动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不能落实在行动上。即使有些干部参加劳动的天数不少,如果他们只是单纯地参加劳动,不把参加劳动同做好工作密切联系起来,也不能认为已正确认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意义。因此,公社党委多次办学习班,组织大家认真回顾和总结自己的、别人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同时再反复学习关于“**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伟大教导,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劳动惩罚论”等反革命的修正主义黑货,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所谓干部“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的反动谬论。通过学习和批判,广大干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明确了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意义,增强了参加劳动的自觉性。

实践证明,工农出身的干部,也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公社革委会的一个召集人,是个新干部。他参加领导工作以后,坐办公室的时间多了,劳动少了。“三夏”期间,他下田插了一天秧,就腰痠背痛吃不消。这件事使他认识到,工农出身的干部参加劳动同样很有必要。否

则思想就会变修，人就会变质，政权就会变颜色。于是，他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千方百计挤时间积极参加劳动。曙光大队新任的党支部书记，认真记取了前任支部书记因为很少参加劳动，脱离群众，犯了严重错误的教训，带领大队的所有干部，“既当‘官’，又当老百姓”，积极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贫下中农称赞说：“干部经常到田头，重活难活抢前头，有了这样的好带头，我侬革命生产有劲头。”干部的思想革命化，带动了群众的思想革命化。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原来一度徘徊不前的大队又大步前进，跨入了先进的行列。

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极好机会，是加速世界观改造的必要途径。公社干部小姜，是大学毕业生。他刚离校门到公社不久，有一天傍晚，下起雪来。小姜看到雪花飞舞，非常高兴，打算第二天拿起摄影机去拍雪景。但是第二天当他一到队里，看到的却是贫下中农不怕严寒，全力抢救被大雪压倒、冻坏的蔬菜秧苗的情景。小姜想：同样一场大雪，为什么自己和贫下中农是两样感情？这样一问一比，进一步激起了他对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痛恨，决心在劳动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以后，他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得到了贫下中农的好评。

党委有一个女委员，有一天同女社员一起蹲在田里种菜，半天下来，就感到腿软脚酸。这件事在她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她想，蔬菜地区的“蹲工”，是女社员最基

本的功夫。在当干部以前，自己也经常参加这种劳动，为什么现在却感到吃不消了呢？主要的原因，是当了干部以后，参加劳动比过去少了。在平时的劳动中，“蹲工”也少了。通过这次思想斗争，她参加劳动更自觉了，并且注意通过参加劳动刻苦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既要劳动好，又要工作好

参加劳动和搞好工作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既要劳动好，又要工作好，完全能做到。新泾公社党委成员和机关干部采取定点包片的办法，深入大队、生产队，同贫下中农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不仅坚持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而且通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洗刷了唯心精神，取得了领导革命和生产的主动权。

一九七四年六月，公社的一个党委副书记在新泾大队蹲点，发现一些人中间还存在什么“命里生了一千财，晒(睡)着也有八百来”、“今年小熟丰收，全靠天老爷”等说法。他就在劳动中，结合总结当年夏粮丰收的经验，和贫下中农一道批判孔孟宣扬的反动“天命论”，大讲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原理。他们在田头你一言、我一语，又挖出了许多条长久以来毒害贫下中农的反动“老古话”，一齐进行了批判，越批越有劲，使大队的批林批孔运动搞得扎扎实实，生气勃勃。

新泾公社以种蔬菜为主，粮食面积很少。但是，过去

每逢“三夏”、“三抢”、“三秋”，有些生产队总是进度很慢；公社抓进度，就是抓不上去，也找不出原因到底在哪里。但是，一参加劳动，问题就发现了。原来，在“三夏”、“三抢”、“三秋”等季节，进度很慢主要是由于有些生产队干部不重视粮食生产，在粮食收种季节仍把劳动力集中在蔬菜生产上。公社党委及时举办了学习班，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教导，深入批判了刘少奇“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这个“老大难”问题解决以后，每当农忙季节进度都很快，质量也较好，促进了粮食的大幅度增产。

新泾公社的事实证明，干部坚持参加劳动，是做好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现在，公社干部路过某个生产队，在地里干活的社员总要热情地招呼他们：“你什么时候再来我们队里劳动几天，帮我们解决点问题呢？”

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

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新泾公社几年来能够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除了党委加强思想工作外，还发动群众检查督促，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

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必须广泛发动群众督促检查。新泾公社党委结合各种群众性的会议，

广泛宣传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重要意义，号召群众对干部的劳动进行监督，并把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定期向群众公布，接受群众评议。曙光大队有个支部负责人刚被推选进大队领导班子时，不注意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贫下中农发现后，立即用本大队过去有一个干部从不注意参加劳动开始，以后被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逐步演变的事例，对他进行教育，使这个干部感受很深。

新泾公社党委的措施是：三抓、三改、三坚持。

三抓。一抓新老干部的结合、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的结合，让他们结成对子，一同下去参加劳动，相互帮助、相互督促，共同提高参加劳动的自觉性。二抓检查，公社党委对干部的劳动情况，一年集中检查三至四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例如党委发现农忙时有的大队主要干部留在办公室里看守电话机，有的大队主要干部自己在编快报，就及时帮助他们从事务堆里解放出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三抓年头，公社党委在年初研究一年工作规划的同时，就研究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做到思想早发动，措施早落实，行动早开始。

三改。一是改变领导作风，绝大部分干部深入基层，扎根群众，认真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二是改革会议，可以合并开的，不单独开，可以放在晚上开的，不在白天开。提高会议质量，长会短开；多开一竿子到底的会议，减少会议层次。三是改变干部兼职过多的情况。

三坚持。一是公社干部坚持星期四干部参加劳动日制度,没有紧急情况,一律不安排其他活动。二是坚持在三个农忙季节中,公社干部都下基层,参加劳动,指挥生产。情况的集中和研究,采取定期碰头的办法。三是坚持头头带头,公社党委和革委会的主要干部带头参加劳动,这是搞好干部参加劳动的关键之一。公社一般干部和大队干部说:“党委和革委会的头头参加劳动多了,学习有了榜样,事务纠缠也少了,我们的劳动也就多了。”

农村商业工作的新天地

我们天马公社的商业工作，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貌有了显著变化。过去，商店集中在天马山脚下的小镇上，虽然也设有下伸店，但只供应一般的生活资料，农民要买主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仍然要跑到镇上来。现在，全公社二十一个大队有十八个下伸店，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有供应，还以卖带修，兼管收购。有的还挑了“货郎担”，穿村走户送货上门。农民购买商品，一般就不要走出大队了。在过去，商业职工不关心农业生产，顶多在大忙季节去参加几天农业劳动，现在，我们把主要力量放在为农业生产服务上，和社员群众一起种试验田，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学习、推广先进单位的生产技术经验。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和贫下中农之间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

“没有鸡哪里有蛋”

一九七〇年以前，我们的禽蛋收购任务一直完不成。当时我们想，我们挨队挨户去收购，已经花了很大力气，收购任务完不成，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后来，听了贫下

中农的意见,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贫下中农批评我们的收购人员是“春天看不见,秋后一大片”,“生产不关心,收购瞎起劲”。有些贫下中农还责问我们:“小鸡不供应,大鸡哪里来?没有鸡哪里有蛋?”

“没有鸡哪里有蛋?”这句话说到我们商业工作的要害了。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教导,在上级党委领导下,我们深入批判“坐镇办商”的修正主义路线,深刻认识到,生产和交换,生产是基础。交换离开了生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农村社会主义商业就是要做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的促进派,积极地为发展农副业生产服务。而没有鸡也要有蛋,就是“坐镇办商”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的反映,必须坚决克服。

思想端正了,立足点就转过来了。我们为了更好地为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服务,首先调整了商业网点,除了镇周围的三个大队外,十八个大队都设置了下伸店,并加强了人员力量的配备。同时,把除了剧毒农药和部分大型农机配件以外的生产资料全部放到了下伸店供应。为了促进禽蛋生产的发展,我们分头下去,帮助生产队制订公养私养家禽的规划,把采购来的苗禽肩挑船载,挨队挨户送上门去。有些生产队怕鸡鸭啄食庄稼,每过芒种就禁养鸡鸭,我们就总结推广“粮食登场季节圈养,其余季节放养”的经验,使这些队饲养鸡鸭的积极性有了提高。此外,我们还在每年春秋,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预防鸡鸭瘟疫的工作。注意总结推广饲养鸡鸭的先进经验,不断提

高产蛋率。这样，家禽数量增加了，产的蛋多了，社员也踊跃向国家交售禽蛋。一九七二年，全公社禽蛋收购量超过了历年最高水平。一九七三年，蛋品收购计划提前两个月完成。现在我们下乡收购禽蛋，社员们高兴地说：“有鸡又有蛋，收购尽管来。”

从“银货两讫”到负责到底

肥料，是农作物的粮食。肥料供应工作的好坏，对农业增产关系极大。过去，我们认为，按期按量向生产队供应了化肥，还主动派人到市区运杂肥，而且数量不断增加，供应又比较及时，满以为工作已经做到家了。但是，许多社员却反映：“肥料不少，肥效不高，产量上去，成本增高。”这是怎么回事呢？下去一调查，发现分布在各生产队的二百八十只氨水小贮槽密封程度普遍不合要求，跑氨现象比较严重，氨水进槽，含氮量一般从原来的十七八度下降为十三四度，有的只有十一二度。同时，施肥不当的情况也相当严重。例如：一吨酸性母液，原来可施二十亩稻田，有一个生产队却认为，“只有一分钱一斤的东西，哪有那么大的肥效”？他们把三吨酸性母液统统浇到十五亩早稻田上去，结果造成稻苗倒伏。还有的队在中午阳光暴晒下浇氨水，造成肥料挥发。有的一面放水一面施肥，有的没有除草先施肥，结果不是肥料流失，就是肥料都被野草吸收去了。

我们有的同志原来认为，商业工作能做的都已经做

了，再有问题我们也无能为力了。后来，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认识到对工作要从极端的负责任出发，农业增产降本的潜力是无限的，我们为人民服务也是没有止境的。同时，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如果各种商品肥料都贮存好，使用好，使肥效少走失百分之十，那就等于使全公社增加八百三十多吨化肥，可以节约农本十万多元。因此，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在柜台上“银货两讫”，而是要在商品出门以后，关心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做到负责到底，当好农业生产的促进派。认识提高以后，大家就在化肥运输、发货、装卸、贮存等环节采取措施，防止跑氨。我们把水泥船装氨水的水泥盖换上软木盖，还用废机油和黄泥密封。对生产队的氨水小贮槽，逐只进行了检修。过去，化肥碎包也出门，现在坚持破包不进仓，碎包不出门，有小洞就补，有大洞就换。职工同志还同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一起种试验田一百三十多亩，帮助生产队总结施好化肥的先进方法。

送上门的生意该怎么做

一九七二年夏天，棉田发现虫害。当时，红忠六队的六只喷雾器坏了，到下伸店要买新的。有一个营业员就到仓库去提货。但是，另一个营业员认为应该先去看看情况再说。他到了生产队，看到喷雾器有的筒身锈坏，有的皮管破了，都是可以修好的。就把这些喷雾器带到店里，修好后又送去了。这样，一笔送上门的生意，却做成

了修旧利废的服务工作。通过这件事，大家认识到，只要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我们都要努力去做，这正是社会主义农村商业的本份。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现在全公社十八个下伸店都办起了十多种修配业务。一九七二年，为各生产队修理电器设备、农机配件、五金工具、农用薄膜及生活用具达二千多件。一九七三年，又进一步举办了旧货买卖和以卖带租的业务。

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只要做有心人，商业支农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一九七三年“三夏”大忙季节，全公社一百七十多台手扶拖拉机有二十二台的缸体坏了。为什么一下子损坏那么多？我们下去一了解，发现主要是拖拉机手技术不熟练，发生了故障不能立即排除。这使我们想到，如果能把这些拖拉机手的技术水平提高一步，减少农机损坏率，不是既可以使农机更好地发挥作用，又可以使生产队节省农业开支、降低农本吗？当时，公社还没有专门培训拖拉机手的机构，我们该不该管呢？既然社会主义农村商业要当好农业生产的促进派，我们就有帮助生产队拖拉机手提高技术的责任。于是，在公社党委的支持下，我们请上海工农动力机械厂的工人老师傅，帮助培训生产队的拖拉机手，提高拖拉机手的操作技术水平。一九七三年两个农忙季节，全公社只损坏四只缸体。这就大大提高了农业机械使用效率，减轻了物资供应的压力，还降低了农业成本。

做促进生产的“样样管”

商业职工不仅要有促进生产的强烈愿望，而且要有为生产服务的本领。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参加生产实践，学一点农副业生产技术。

我们这个公社，过去没有种蔬菜的经验，后来集镇的工商业发展了，蔬菜供应不上，每天要到上海县去运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在公社内自己种菜。问题是我们商业部门要不要管。有的同志说：“商业管种田，真的变成‘样样管’了。”后来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对发展生产有利的事就要去管，“样样管”是我们商业职工的本份。于是，负责蔬菜供应的职工就组织集镇附近的生产队干部、社员到上海县学习种菜技术，发展蔬菜生产。过去，这里的韭菜又细又老，产量很低。现在，学习了先进种植经验，这里的韭菜长得又粗又嫩，产量也提高了。发展蔬菜生产还要解决留种育秧的问题，特别是一些细品种，每季都要买秧苗来种，很不方便。我们为了做到种子自给，又和社员一起外出取经，一起试验，基本上解决了秧苗自给的问题，蔬菜品种和产量不断增加，进一步改善了城镇居民蔬菜供应。

再拿中草药的收购来说，光靠等货上门就不行。有些中草药的货源数量少，花工大，采集比较困难。例如：蟾酥要从癞蛤蟆身上一点一滴地刮浆，平均一百二十只癞蛤蟆才能刮到一两。糯稻根要从田里一棵棵挖出来，

剪下根须，洗净晒干。怎样才能聚沙成塔，完成收购任务呢？医药门市部的同志亲自实践，摸索出一套剥制方法和专用工具来，然后到茶馆宣传示范，到学校上课，发动社员和红小兵捉癞蛤蟆，挖糯稻根。依靠群众大干的结果，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每年采集的糯稻根达二、三百担，蟾酥近二十斤。同时，下伸店职工普遍学习了识别中草药和采集技术，有的还上天马山采制中草药标本几百种，帮助大队培训采集人员。这几年，每年收购的中草药达一千多担，使生产队每年增加收入二万多元，生产队的合作医疗事业也得到了有力支持。

收购工作也要促进农副业生产

在农副业产品的收购工作中，通过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来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农村社会主义商业的重要职责。过去，社员向收购站交售棉花、生猪、草包等农副产品，我们有些检验员在分等论价的时候，往往都是由他们自己一人说了算，甚至明明自己说错了，也不肯改正。社员因此很有意见，说他们是“铁口”。现在，为农副业生产服务的方向端正了，这种情况也就起了变化。

农副产品一般都是凭肉眼测定，检验结论很难完全正确。有一次，永忠四队交售两批棉花，第一批检验为三级，第二批检验为四级。社员问：为什么同样的棉花会有两个等级？检验员重新检验，发现第二批检验果然有偏

差,就立即纠正过来。以后,我们改进了检验办法,每次收购棉花,确定等级后都留下棉样,定期组织贫下中农代表、公社干部和棉花检验员三结合进行复验,发现定级偏低、少给生产队价款的,就坚决补给。收购生猪,凡是社员交售的生猪,如果双方在确定等级时意见不一致,就在当地屠宰,按屠宰后的实际情况确定等级。生产队交售生猪,检验后一一做上记号,屠宰后发现哪头猪定级偏低了,再进行补算。有时,检验员还帮助生产队做好分级工作。这样做的结果,就兼顾到了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当然,在农村还存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情况下,也有极少数人在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时,想以次充好,提高收购等级和价格。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就坚持革命原则,正面指出,进行批评教育。

要真正做好收购工作,必须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党的政策,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工作。草织品是我们地区的传统副业产品,也是我们每年收购数量较多的农副业产品。但是,过去我们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看到供不应求时就拼命收购,越多越好;出现积压现象,就拼命压价,甚至拒绝收购,结果破坏了草织品的正常生产。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正确贯彻执行收购政策,加强对草织品生产的计划领导,帮助有条件的大队办草织品厂。有些生产队草源不足,我们就从草源多的队进行调剂。还积极推广省柴灶,从烧柴中节省出大量稻草来。东方红大队有四个生产队,以前因为草源少,不织草包,自从普遍改了省柴灶,稻

草有了积余,去年开始也搞草织品生产。去冬今春,全公社草包收购量比一九七二年增加了近十三倍。

通过这几年的工作,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只要坚决地立足生产,面向生产,商业工作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道路就一定会愈走愈宽广。农村商业工作的新天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更多的工作正在等待着我们努力去做。

松江县天马公社商业站革命委员会

农村民兵要积极参加阶级斗争

我们彭渡大队党支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发动民兵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把民兵推向阶级斗争第一线，这是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根本措施，也是改造和建设民兵队伍的重要途径。

对于农村民兵要不要抓阶级斗争、能不能抓阶级斗争，我们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

开始时，我们有些同志认为：“要使嘴巴讲得响，就得年年高产量”，担心民兵抓阶级斗争会影响生产。第八生产队没有四类分子，有的干部和民兵就认为，“我们这里天下太平，民兵只要搞好生产就行了”。由于不抓阶级斗争，结果队里偷窃事件不断发生，资本主义倾向泛滥，产量是全大队最后一名。一九七〇年，支部书记带了民兵小分队，到八队去发动民兵和群众，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使大家看到了：八队虽然没有四类分子，但是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里，同样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就在这时，民兵揪出了一个作案累累的惯偷，查获了大量的赃物。这使八队民兵深深感到：不抓阶级斗争不行。从此，他们坚持巡逻值班制度，打击现行犯罪活动，

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成为全连抓阶级斗争比较好的单位,队里生产面貌也迅速改变,一九七三年粮食亩产已超过双千斤,是全大队的第一位。那些原来担心民兵抓阶级斗争会影响生产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不能把民兵看成可有可无,而要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

还有些同志原来认为,民兵抓阶级斗争,只要管好四类分子就行了,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抓流氓阿飞、破“四旧”,那是多管闲事,“伤情面,招冤家”。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下,第三生产队一度放松了抓阶级斗争。在阶级敌人的煽动下,吃风、偷风蔓延起来,仅一年内,集体粮食就被吃掉、偷掉一万多斤。第五生产队滋长了资本主义倾向,有些人夜里捉鱼,清晨上自由市场,白天劳动不起劲,严重影响集体生产。后来,我们整顿了这两个生产队的民兵组织,发动他们狠抓阶级斗争,打击了敌人,煞住了歪风,教育了群众,使革命、生产的面貌焕然一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事实,使我们懂得了:这些所谓的“闲事”,不抓不得了。林彪自我爆炸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林彪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如果我们对这些“闲事”放任不管,那就正好称了林彪一伙的心愿。资本主义一旦复辟,我们贫下中农就得“再进长工屋,重拿讨饭棒”。认识提高后,全体民兵不怕伤情面,不怕招冤家,见到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事就批,见到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就管。

随着认识的提高,我们发动民兵抓阶级斗争的自觉性也更高了。我们大队地处闵行、松江、奉贤和上海县的

交界处,人员来往频繁,情况复杂。全体民兵以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有天早晨,巡逻民兵发现黄浦江渡口停了两只小船,船上的人行动鬼祟。民兵立即进行监视、侦查,终于在附近棉花地里、黄浦江边,搜出了两吨多钢材,破获了一个盗窃集团。后来,民兵又揪住了两个从外地流窜来的盗窃犯,当地公安机关接到我们的反映后,从他们家里搜出了近十吨的钢材和大量其他的赃物。八队过去经常发生偷窃,长期破不了案。后来,民兵和群众找疑点、排线索,发现有个人养了两只狗,多次动员不肯杀,外出还要带在身边,行动有些反常。经过侦查,终于查明这个家伙是个惯偷。他养狗是为了作案时替他望风。民兵从这个惯偷家里,查获了大批木材、粮食等赃物。几年来,民兵在自己的防区里破获投机倒把、流氓阿飞和盗窃犯、逃犯等三十余起。

广大民兵还依靠群众,坚决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批判“四旧”,开展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一九七三年秋天,闵行地区一些交通路口,出现了非法的自由市场。四十多名武装基干民兵,就到交通要道流动宣传,批判“自由买卖”的谬论。对不听劝说的,就带到市场管理部门,按国家牌价收购。大队里有个富农分子,暗地里装神弄鬼,欺骗病人,毒害群众。民兵把他揪了出来,发动群众进行揭发批判;同时,广泛展开破“四旧”的教育,有力地打击了封建残余势力。

民兵还坚持巡逻值班,保护重要目标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大队每天晚上有数十名民兵,担任巡逻

值班，长年不断，保障铁路、公路、水路和线路的畅通；协同工人民兵，保卫附近重要工厂等目标；并积极开展防偷、防盗、防火、防破坏的活动，加强了社会治安。

民兵通过阶级斗争锻炼，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几年来，全大队三百三十六名基干民兵中，有二十八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九十人加入了共青团，有五十四人担任了生产队委，有八人参加了大队各个领导班子。贫下中农高兴地赞扬说：“这些民兵是我侬的好后代，有了他们接班，我侬放心了！”

中共上海县马桥公社彭渡大队支部委员会

以农为荣，以农为乐

——金山县枫围公社团委教育青年扎根农村的调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枫围公社团委在党委的领导下，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经常对团员、知识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树立起“志在农村一辈子，艰苦奋斗干革命”的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中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

这个公社的团员、知识青年同贫下中农一起，大力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实行科学种田，把“晴天水汪汪，雨后白茫茫”的“白牛荡”和“垒垒一条缝，砸砸一个洞”的“铅皮地”，改造成了一年三熟的稳产高产田，夺得了粮食生产的连年丰收。近六年来，全公社每年增产粮食五百万斤以上。一九七三年，粮食亩产达到了一千四百九十斤。一九七四年夏粮又获得大丰收，总产量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了九百零九万斤。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青年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公社二千九百多名回乡知识青年和城镇插队知识青年中，有七十名入了党，七百八十名入了团，六十一名结合进了大队领导班子，八名结合进了公社领导班子，一名被推上了县、市

领导岗位。一代新农民正在茁壮成长。

教育青年正确对待农业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这个公社的广大团员、青年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但是，有些知识青年一开始还不安心在农村，存在着“先进走不了，后进轮不到，中游最可靠，一心往外调”的思想；有些青年想学一门手艺，目的也是为了可以借此脱离农业劳动。公社团委分析了这些情况，认识到教育青年扎根农村，将一生献给革命，是团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一定要认真抓好。他们先后在公社和大队举办了一百多期青年学习班，引导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指示，批判轻视农业的思想，提高他们对搞好农业生产重要意义的认识。许多大队的团员、青年开展了“革命青年怎样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出力”的讨论。大家一边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一边批判林贼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谬论，据事论理，从而懂得了这样的道理：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有近八亿人口，首先要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才能去办工业，办交通运输事业，办文化教育事业；而吃饭、穿衣，主要要靠农业，所以，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资金、劳力和市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通过广泛的教育，全公社团员、青年的思想觉悟普遍有了提高，“以农为荣”成为青年共同的革命志愿。青年小沈，一九六八年从学校回到生产队后，一度认为“呆在农村没意思，脸上没光彩”，要外出找工作。当看到一批青年被抽调进了工厂或上了大学，就思想苦闷，更不安心。所在大队的团组织及时对他进行帮助教育，使他提高了认识，逐渐爱上了农业。一九七二年四月，大队党支部准备推荐他去上大学，后来根据改造后进队的需要，仍把他留了下来。有人替他惋惜，可小沈说：“上大学读书，在农村务农，都是为了革命。党叫干啥就干啥，革命青年应当时刻听党的话。”他到一个后进队去后，同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一道，横扫歪风邪气，增强了领导班子成员的革命团结，使生产队面貌得到了改观。

每当抽调人员的时候，知识青年的思想最容易产生波动。针对这种情况，这个公社团委发动广大团员和青年联系实际，狠批孔孟宣扬的“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反动谬论，并采用上团课、广播会等办法，及时对青年进行“为革命种田”的教育，引导他们正确处理务农和干其他工作的关系，立志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并且还编写了搞好农业、当一代新农民的团课教材，发给团员、青年学习。许多团的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不但以身作则，安心农业生产，而且积极做思想工作，帮助一些青年正确对待农业。知识青年沈芬娣就是一个优秀的代表。她是一九六六年从城镇到这里插队的，八年如一日，一心一意战斗在

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她到农村后，看到有人在茶馆、集镇大讲封、资、修故事，毒害青年、群众时，她就挺身而出，大讲革命故事。有人说：“你是姑娘家，这样出头露面，不怕人家说闲话？”她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敢于出头露面。”几年来，她在茶馆、集镇、田头、场地，以及会前、会后，大讲革命故事，听众达三万多人次，狠煞了资产阶级歪风邪气，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志气，使青年、群众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贫下中农称她是：“我侬的代言人。”由于她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表现突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推上了公社、县、市的领导岗位。她地位变了，献身农业的思想没有变。沈芬娣了解到知识青年小郭有“农村两年，皮肤晒黑，可以毕业”的思想，就一次次地找她促膝谈心，谈自己在贫下中农再教育下锻炼成长的体会，讲个人志愿要服从党的需要的道理。小郭在团组织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安心农业生产，积极为贫下中农服务，现在已成为光荣的共青团员。

教育青年正确对待艰苦

这个公社的团委在深入调查中，发现有些青年存在着“怕苦、怕累、怕吃亏”的思想，经过分析，他们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使青年坚定地务农一辈子。他们就对团员、青年进行教育，帮助大家树立无产阶级苦乐观。

叛徒、卖国贼林彪出于其反革命的本性，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也往往以“关心”青年为名，散布“农村太苦，劳动太累”的论调，引诱青年离开农村。利民大队十二生产队有个富农分子，曾偷偷钻到一个生病在床的知识青年家里，挑唆说：“你们知识青年皮肤白，知识高，同泥土打交道多懊恼。”公社团委发现这个情况后，就组织团员、青年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并把批判林彪的反动谬论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有力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通过革命大批判，许多知识青年认清了：林彪散布的“变相劳改”谬论的实质，就是反对青年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诱骗青年贪图个人安逸，蜕变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大家表示，一定要以艰苦奋斗、扎根农村的实际行动，粉碎一切阶级敌人的痴心妄想。红星大队知识青年小何决心扎根农村，生产队里一个坏家伙妄图用小恩小惠腐蚀拉拢他。一天，这个坏家伙捧了一堆茭白、山芋来到小何屋里，煽动说：“农村生活苦，你们青年哪能受得了。”小何一眼看穿了阶级敌人的险恶用心，当场把“糖衣炮弹”从窗口扔了出去，响亮地回击说：“干革命不怕艰难困苦，谁要你的臭东西！”他勇敢地投入了揭发、批判这个坏家伙的斗争。几年来，小何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坚持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

为了帮助青年树立“以农为乐”的思想，公社团委还开展写“三史”活动，组织团员、青年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会，请老贫农回忆对比，使青年不忘阶级苦，深知今日

甜，懂得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苦乐观。有的青年说得好：“解放前，劳动人民象牛马一样劳动，还是受冻挨饿，那才是真正的痛苦；今天，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艰苦奋斗，这是最大的快乐和幸福。”利民三队团小组长小陈，一度嫌农业劳动艰苦，不大安心在农村。他参观了阶级教育展览会，看到老贫农周伯伯在旧社会逃荒要饭，身穿破烂衣服，一条棉絮筋盖了四十多年的悲惨情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小陈说：“吃上了白米饭，忘记了父辈解放前的讨饭碗，嘴里含糖不觉甜。不听毛主席的话，只想离开农村，真是忘了本。”从此，他安心在农村，积极参加劳动，发动团员、青年成立了突击队，做到学习、批判走在前，紧急任务抢在前，重活、脏活干在前。“三抢”中，小陈带领突击队员，起早搭夜挑稻、施肥、插秧。有一天，生产队有三十多亩稻子急需在下雨前抢收脱粒好。他和突击队员一起，从晌午一直奋战到第二天黎明四时，及时完成了任务。青年们豪迈地说：“为革命搞好农业生产，再苦也是乐。”

教育青年正确对待前途

少数青年说：“三铁镢，六锄头，种田没啥大花头”，认为“在农村无前途，当农民无出息”，不安心农业生产。这个公社团委组织团员、青年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教导，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引导青年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

大目标而辛勤劳动,搞好农业生产。

新华大队十六生产队的知识青年小陈,原来存在着“读了九年书,握铁镢柄没出息”的想法,一心要到社办厂找个工作,群众说她“人在田当中,心在枫泾镇”。这个大队团支部书记了解情况后,就和她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青年运动的方向》,鼓励她向贫下中农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小陈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又看了《广阔天地》等影片,认识到农村前途无限,搞农业大有奔头。从那以后,她积极劳动,努力工作,热心辅导贫下中农学习文化。她参加队里的科技小组后,同十二个青年一起,认真学习《实践论》,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摸索作物生长规律。一九七二年,这个科技小组种的试验田,获得了三麦亩产七百四十六斤,前后两季水稻一千六百四十斤,常年亩产二千三百八十六斤的好收成。现在,一支为革命学业务、钻技术的新农民队伍,正在迅速成长。延安大队十二生产队的“十姑娘”战斗组,破除“农业无技巧”、“种田无学问”的错误思想后,在老贫农的具体指导下,刻苦学习播谷、插秧、耘稻等农业技术,努力做到又红又专,被群众誉为“革命的闯将,生产的能手”。

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公社团委还发现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思想包袱比较重,对前途有悲观情绪。公社团委就发动团员热情地关心他们,引导他们正确对待前途。长征大队有个知识青年,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刚到农村时想法很多,情绪低沉,认为“家庭出身糟

糕，个人出路算完了”。大队团支部吸收她参加“理想与前途”的学习班，通过学习，使她认识到，只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不论出身于什么家庭，都同样有光明的前途。从此，她甩掉思想包袱，焕发了革命朝气，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并利用劳动间隙教唱革命歌曲，编写演唱材料，排练文娱节目，为贫下中农服务，受到群众的称赞，被吸收入团，并被推选为公社团委委员。

妥善安排青年生活

枫围公社团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认真抓好对青年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也注意从各个方面热情关怀知识青年的生活。党委书记亲自动手，并发挥共青团的作用，对知识青年的生活问题一年抓几次，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知识青年刚到农村插队时，枫围公社的干部和贫下中农总是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接待他们；带领他们“串村访户”，认清路、看准人。并为每个青年小组或个人先后盖了坚固、实用、宽敞的住房，地点选择在干部和贫下中农住处附近，以便照应方便。公社为每个青年都配齐日常生活用具和生产用具。知识青年到队里后，各生产队都选派有经验的老贫农负责教知识青年生产技术，并帮助他们养好鸡，种好菜，学会料理家务。知识青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律实行同工同酬，对刚来插队没有经过劳动锻炼和身体较弱的青年，在劳动工种上给予照顾，先

安排轻活,使他们逐步适应。社、队干部还经常访问他们,和他们谈心,并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几年来,枫围公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热情地培育和关怀一代新型农民的成长,使广大知识青年政治上得到了进步,劳动上得到了锻炼,生活上得到了安排。广大知识青年坚决表示:“胸怀朝阳在农村,艰苦奋斗炼红心;虚心接受再教育,誓做一代革命人!”

在斗争中加强赤脚医生队伍

一九六八年九月，我们公社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发表了。这是党和毛主席对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极大支持和亲切关怀。近六年来，我们公社的赤脚医生队伍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斗争的锻炼，不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总人数从原有的二十八名增长到八十多名。赤脚医生队伍的壮大，对于巩固农村合作医疗和深入开展农村的卫生革命，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赤脚医生这个新生事物出现以后，是不是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呢？不。在赤脚医生队伍巩固和提高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个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曾经有人刮起一股阴风，说什么“赤脚医生不象个医生的样子”。贫下中农立即驳斥了这种论调。他们说：“一边劳动，一边治病，脸是黑的，心是红的，赤脚医生这个样子，我们就是喜欢。”我们感到，把赤脚医生培养成什么样子，是一个按照什么路线建设赤脚医生队伍的大问题。赤脚医生和贫下中农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进行了两条卫生路线的对比。他们指出：如果按照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样子”来改造赤脚医生队伍的面貌，那就是妄图使我们贫下中农重新陷入缺医少

药的境地。许多赤脚医生在斗争中进一步增强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自觉性，决心保持贫下中农所喜欢的那个样子。一九六八年的调查报告中提到一位赤脚医生，因受旧医科学校那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滋长了名利思想，平时不大愿意跟贫下中农接触。这几年来，他在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教育下，进步较快。有一次，他路过临近大队时，用口对口呼吸的办法，抢救了一个已经停止呼吸的溺水小孩。群众怀着敬佩的心情问他的名字，他说：“我叫赤脚医生。”新培训出来的赤脚医生，也学到了老赤脚医生的好样子。一天晚上，东浜大队的七位渔民先后患了急性肠胃炎，这个大队的新赤脚医生闻讯立即出诊，挨户治疗，通宵战斗，终于使七位渔民第二天又扬帆出海了。

赤脚医生队伍能不能巩固，关键在于能不能坚持半农半医的道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一度，有的赤脚医生下田劳动少了。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以后，就举办赤脚医生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进一步认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联系群众、改造思想、反修防修的重要意义。但是，赤脚医生要坚持走半农半医的道路，还必须有相应的措施。一个一千五百人左右的大队，如果只有一个赤脚医生，他就得整天忙在防治工作上，想“赤脚”也“赤脚”不成。为了保证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们扩大了赤脚医生队伍。近几年，我们自力更生先后培训了三批，现在使每个大队有三名以上赤脚医生，建立了“三三轮换制”（一人在大队卫生室值班，一人下生

产队搞防治,一人参加劳动,定期轮换)。这样做的结果,全公社赤脚医生的劳动时间,平均保持在同等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左右。红旗大队的赤脚医生由于“三三制”坚持得好,每年的劳动时间达到同等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到二分之一,保持了贫下中农的光荣本色。由于赤脚医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实行劳动记工加误工补贴的计酬办法,虽然人数增加了,但贫下中农仍然养得起。

是预防为主,还是重治轻防,这是卫生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这种斗争也必然反映到赤脚医生队伍中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结合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通过典型事例来教育大家,提高赤脚医生贯彻执行毛主席“预防为主”方针的自觉性。道新大队在文化大革命前,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比较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大打除害灭病的人民战争,把这个有名的邈邈村,改造成了人人爱清洁、家家讲卫生的社会主义卫生村,连续几年被评为上海市的卫生先进单位。这个大队的两名赤脚医生,积极参加了大队“稻田高产灭蚊”的科学实验,三年如一日,坚持在试验田和对照田中定点测试,收集数据,终于掌握了水稻生长的规律和蚊虫孳生的规律,收到了既灭蚊又高产的效果。现在全公社绝大多数赤脚医生能够主动当好大队的卫生参谋,做到突击运动集中精力抓预防,平时结合治病搞预防。

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对赤脚医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医疗技术要求。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和赤脚医生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引导他们正确处理政治和业务的

关系，坚决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同时，从群众的需要出发，通过举办业务培训班，实行赤脚医生同卫生院医生定期轮换、对调等办法，有计划地提高赤脚医生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技术水平。现在，大部分赤脚医生能够比较熟练地掌握预防知识和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诊治农村常见病、多发病。有的还能独立诊治一些疑难病人或抢救重危病人；还有的赤脚医生能够拿起手术刀，和卫生院医生一起施行阑尾炎、疝气、痔疮、肛瘘、体表肿瘤等手术；不少女赤脚医生能够接生，有的能处理难产，进行人工流产、腹扎等手术。

赤脚医生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有一个沿着什么方向提高的问题。我们反对关门提高，鼓励赤脚医生在搞好群众性的防治工作的实践中，沿着中西医结合的方向提高。我们发动广大群众献草，献药，献方，就地取材，为赤脚医生搞中西医结合提供了物质基础。大洪大队的赤脚医生在群众的帮助下，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细心摸索疾病的规律，研制了平喘止咳、治胃痛和腰痛等十八种比较定型的协定处方，根据季节定期加工成药，防病治病的效果更好了，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就地取材，也是勤俭办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巩固合作医疗的作用很大。近一、两年，我们反复宣传这个大队的经验，对全公社的赤脚医生和贫下中农鼓舞很大，一根针、一把草、一双手（推拿）的威力进一步发挥出来了。新华大队赤脚医生在实践中钻研针麻技术，基本上掌握了头面部的针麻要领，能够独自进行针麻拔牙和创伤缝合。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培养赤脚医生的道路,是广大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依靠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农村卫生革命的康庄大道。现在,我们公社已经形成了抓好赤脚医生工作的三条渠道:公社党委举办路线学习班直接抓,大队党支部结合中心工作经常抓,公社卫生院支部定期集中交流经验配合抓,基本做到了组织落实和措施落实。这几年来,我们公社的赤脚医生向大学输送五人,向部队输送五人,向公社卫生院输送四人。其他留在大队的六十八名,同公社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和一百四十几个生产队卫生员结合在一起,必将为农村卫生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川沙县江镇公社委员会

抓好两条路线斗争，推动农村卫生革命

——奉贤县邬桥公社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

“赤脚医生是亲人，为侬看病真贴心。”“有了人民公社穿不愁吃不愁，有了合作医疗看病有保障。”这是广大贫下中农对赤脚医生、对合作医疗的颂歌。

奉贤县邬桥公社是上海郊区农村卫生革命搞得较好的先进单位之一。这个公社的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的发展状况和斗争历程，是上海郊区农村卫生革命的一个典型。

一切从贫下中农的需要出发

邬桥公社现有赤脚医生五十六人（其中党团员占百分之七十八点五）。六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奋战在农村防病治病的第一线，不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随叫随到，满腔热情地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

这是一支半农半医的新型医疗卫生队伍。他们有些什么主要特点、作用和成绩呢？

一、对贫下中农感情深。赤脚医生来自贫下中农，了解贫下中农，始终扎根在群众之中，一切从贫下中

农的需要出发，坚持同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同资产阶级医疗作风进行斗争。胜利大队一个社员的女儿发麻疹，送到大队合作医疗卫生室时，病孩高烧达四十一度，出冷汗，病情险恶，濒临死亡边缘。公社卫生院下队的一位医生看到这种情形，眉头一皱，悄悄地对赤脚医生说：“如果病人死在卫生室，我们有责任……”，主张送公社卫生院治疗。赤脚医生坚定地说：“大队离公社卫生院有十来里路，如果送出去，病孩很可能死在路上，就地抢救还有一线希望，这个责任，我们应当担当！”一个“送”，一个“留”，反映了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前者从个人的得失出发，后者从贫下中农的需要出发。赤脚医生毅然把病孩留下来，立即进行抢救，终于使病孩得救了。

对贫下中农感情不同，医疗态度和医疗作风不同，治疗效果也不同。红星大队有个女青年，一九六九年突然得了多发性神经炎，手指蜷缩，身体瘫痪。在上海一家大医院住院七十天，花去三百多元，仍然不能坐立，生活不能自理。为她治病的医生断言，恢复期已过，不能好转，动员病人出院。大队办起合作医疗后，赤脚医生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决心为这个病人解除痛苦。为了探索有效的治疗方法，赤脚医生在自己身上扎针，体验针感，同时还向中医学院的老中医请教，得到了热诚的帮助，增强了信心，他们天天上门给病人扎针，口服和外敷中草药。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使这位患多发性神经炎的女青年恢复了健康。现在她已能插秧割稻、纺纱织布。

二、就地治疗。赤脚医生分布面广，贫下中农有

病叫得应，不但大量的常见病、多发病能就地及早治疗，小病不致拖成大病。而且许多急病和突发性事故能得到紧急抢救。例如中毒性肺炎、农药中毒、心力衰竭、消化道出血、新生儿窒息、触电、溺水、蛇咬伤等，非及时处理不可，不然就往往造成生命危险。全公社一年中遇到这类急病二百余例，由于有赤脚医生就地进行抢救，先后转危为安。如红卫大队有个六十多岁的贫农女社员，深夜十二点突然腹痛，发高烧。赤脚医生闻讯赶去，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当夜风狂雨急，赤脚医生根据贫下中农的愿望，把病人收到大队合作医疗卫生室，用中西医结合办法进行治疗，并日夜守护在病人身旁。病人症状逐步减轻，第四天便病愈回家。

三、一专多能。赤脚医生从农村的实际出发，根据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防病治病的需要，不少人在实践中已成为多面手。他们既会中医，又会西医；既能内科，又能外科；既懂妇产科，又懂小儿科；既当医生，又当护士，也当药工，不受分工过细的束缚，渐渐形成各人的特长，同时又能看多种疾病，具有一专多能的特点。他们还实行中西医结合，大搞中草药，采用中西两法防病治病。

赤脚医生通过反复实践，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现在一般能治常见病、多发病一百五十余种，还能治疗若干疑难杂症。他们熟悉群众的病史和病情，能作出较正确的诊断。有一次，有个贫农在劳动中突然剧烈胃痛、呕吐。赤脚医生根据他呕吐的情况和有胃溃疡的病史，诊

断为胃穿孔，急忙护送到市区一家医院，经医院拍 X 光小片检查，诊断为胆囊炎。赤脚医生根据病史，提出不同意见，要求拍大片检查。检查结果果然是胃穿孔，立即开刀抢救，使病人脱离了险境。通过实践，他们认识到：正确治疗来源于正确的诊断，正确的诊断来源于对客观病体详细的了解、分析以及连贯起来的思索。

四、防治结合。赤脚医生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以防为主，防治结合。他们和广大社员群众一起，积极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加强粪便管理，注意饮水卫生，搞好预防接种，用中草药防病，减少发病率，保护贫下中农的健康。红星大队赤脚医生采取各种措施，做好预防工作。他们根据一年四季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规律，组织社员服用中草药预防疾病，冬季用草药防流行性感冒，夏季用草药防中暑、乙型脑炎、稻田皮炎等疾病，发病率逐年下降。一九七〇年全大队发病率为一万二千多人次，一九七三年下降到六千五百多人次。百日咳、乙型脑炎、小儿麻痹症、疟疾等传染病，四年来没有发生。

赤脚医生还配合大队妇女干部，向群众积极宣传计划生育的意义，把避孕药物送上门，方便群众，使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如胜利大队人口出生率一九七一年为千分之二十七，由于大力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一九七三年人口出生率下降至千分之八点七。

简易病床的诞生，是合作医疗的一个新发展。郭桥公社大多数大队合作医疗卫生室办起了简易病床，全公

社现有简易病床二十四张。为了提高诊断的准确率，有个大队卫生室买了一架旧的显微镜，自己做血液和大小便三大常规化验。在“土病房”治病，避免了长途抬送病人，不要家属费工陪同，便于随时观察，抢救及时，还可节约医疗费用。有一个社员，一九六八年因患总胆管结石，进医院开过一次大刀，以后每年仍要复发，每次进医院总要住上十多天，要花去不少钱。一九七三年十月份，旧病复发，赤脚医生在“土病房”里，用中草药配合新针治疗，病员住了八天，排出了结石，恢复了健康，合作医疗只花药费二元六角，病员享受免费治疗。一九七三年，这个大队“土病房”共收治病人一百七十六例，都用中西医结合办法治疗，取得了显著效果，大大方便了贫下中农。

几年来，合作医疗越办越好，合作医疗队队有积余，全公社累计积余三万七千余元。社员每年交纳的合作医疗基金，已从二元降到一元，医药费用的报销范围也已从每人每年三十元扩大到四十元，在大队卫生室用中草药、针灸治病的费用不计在内。红星大队门诊、出诊、煎药、注射均不收费，在大队卫生室用中西药治病一律免费，转诊外出治病可报销医药费四十元。凡贫下中农家庭经济情况确有困难的，经党支部和群众讨论同意，报销范围还可扩大。

广大社员群众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合作医疗的优越性，因而更加热爱合作医疗。有个老贫农得了急病，主动要求留在大队，他说：“用中草药治病效果蛮好，也可以为合作医疗节省开支。”在赤脚医生的精心

治疗下,这个老贫农的病很快就好了。第五天,他到镇上逢人便说:“毛主席讲啥好,啥就是好。”有个大队小学教师患大腿深部脓肿,不能行走,曾在一家医院治疗十余天,未见好转。后来赤脚医生用草药捣烂外敷,脓肿迅速消退,第六天就上班了。他对中草药的作用深信不疑,就积极发动红小兵采集草药,献给合作医疗。这所小学每年献给合作医疗的草药有二十多种、一千多斤。这些行动都是对合作医疗的有力支持。“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

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在斗争中前进

邬桥公社赤脚医生队伍的茁壮成长,合作医疗制度的巩固发展,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斗争的根本问题是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沿着什么方向前进的问题。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培养、造就新型的医疗卫生队伍,坚持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而资产阶级千方百计企图扼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个斗争,大致表现在:

是拥护它还是反对它。六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肯定了赤脚医生的道路和合作医疗制度,邬桥公社队队喜气洋洋,纷纷推选他们信得过的贫下中农子女担任赤脚医生,积极创办合作医疗。广大贫下中农激动地说:“毛主席为我们想得真周到。”

一小撮阶级敌人则跳出来攻击赤脚医生“只能捏铁

镢锄头，不懂听筒针头”，咒骂合作医疗“一年办，二年烂，三年散”，胡说“草药能治病，医生要失业，药房要关门”，“牛吃草，羊吃草，人怎么能吃草”等等。有个坏家伙流窜到生产队，打着“祖传秘方”的旗号行医；有个地主分子吹嘘自己能治癌，他们造谣惑众，诈骗钱财，妄图同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唱对台戏。

面对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事实，公社党委认识到，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只能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斗争中才能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贫下中农是拥护它、关心它，而阶级敌人总是要拚命反对它。斗争的焦点是，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公社党委基于这个认识，组织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卫生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忆旧社会贫病交迫，无医无药之苦，诉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之害，颂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之甜，狠批阶级敌人的谬论。前进大队有个老贫农，解放前，丈夫在地主家当长工，生病无钱治疗死去；自己脚烂了十二年。解放后，又受到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害。合作医疗建立不久，她生了急性肠胃炎，赤脚医生日夜上门，精心治疗，不久就治好了她的病。她激动地说：“赤脚医生个个亲，合作医疗真真好。”一个贫农的儿子患慢性肾炎，全身浮肿。家长带他到处求医，疗效不明显。办起合作医疗后，赤脚医生给他服用中草药并辅以针灸治疗，一个月后，全身浮肿消退，再服药一个多月加以巩固，至今没有复发。贫下中农称赞说：“银针巧，草药宝，成本低，疗效高。”贫下中农

是这样地热爱赤脚医生、合作医疗，阶级敌人的阴谋终于破产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已经在群众中深深扎下了根。

是巩固它还是削弱它。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每前进一步，始终存在着斗争。这个斗争也必然反映在领导班子中和干部身上。是积极支持赤脚医生办好合作医疗，还是采取排斥的态度，反映了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有个大队赤脚医生根据贫下中农的迫切愿望，向党支部提出了设简易病床的设想，立即得到党支部的支持。没有房间，党支部把大队办公室让出来给合作医疗办“土病房”。而另一个大队在“利润挂帅”的思想影响下，以队办工业去挤合作医疗，借口“东西摆一摆，房子借一借”，竟把大队合作医疗办的草药房挤掉了。有的大队甚至把合作医疗积余的基金随意挪来作为年终分配。批林批孔运动中，党委认真研究了上述问题，认为这是对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举办了干部学习班，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交流先进经验，批评错误倾向。经过教育，那些大队的干部提高了觉悟，知错即改，小工厂从草药房里搬了出来，动用的合作医疗基金退了回来，合作医疗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是勤俭办医、大搞中草药，还是贪大求洋、大手大脚，这是巩固合作医疗的重大原则问题。在农村卫生战线上一度流行“种药不如采药，采药不如买药”、“草药没用场，西药顶灵光”等错误论调。有的大队干部受了影响，放松了勤俭办医的教育，

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出现了用西药多，用中草药少，六个月用去全年基金百分之六十的大手大脚现象。大队党支部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坚持勤俭办医，局面迅速扭转，下半年积余一千余元。几年来，全公社种植、采集中草药六千四百多担，自用有余，还向国家出售了二千二百六十九担。一九七三年，各大队、生产队利用零星土地，共种植了中草药四十二亩半，遍地都有“百草园”。

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赤脚医生能不能大公无私、坚持原则，对巩固合作医疗关系很大。胜利大队党支部经常教育赤脚医生对待干部或社员疾病和治疗，都要“按病情开方，不要凭交情给药”。例如有人自行求医，去药店买贵重药品，却要赤脚医生补开药方，予以报销。赤脚医生坚持原则，不予报销。这件事受到大队党支部的赞扬，为合作医疗树立了好作风。

是扶持它还是腐蚀它。无产阶级要扶持赤脚医生，资产阶级要腐蚀赤脚医生，存在着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社会上资产阶级的旧习惯势力，每日每时都在向赤脚医生灌输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进行思想侵蚀。有些赤脚医生因此而思想波动，不大安心于自身的工作。这样，有的同志参加劳动少了，有架子了，对贫下中农感情淡薄了；坐诊多了，巡回少了，责任心差了；听到有人叫他“先生”，心里乐滋滋了。大队党支部认识到，这是关系到赤脚医生自身革命化的大问题，对此十分重视，及时举办了专题学习班，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光辉著作，请老贫农来忆

苦思甜。老贫农语重心长地说：“在旧社会，象你们这样年纪，只能在地主家里做小长工。现在你们当了赤脚医生，为贫下中农治病，这是党的培养，可不要忘掉为贫下中农掌好卫生大权啊！”这对赤脚医生思想上有很大触动，赤脚医生自觉地联系自己的思想，表示要学习白求恩同志“毫无利己的动机”、“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的共产主义思想，决不辜负贫下中农的阶级委托。思想认识提高后，工作安心了，干得有劲了，巡回也多了，坚持送医送药上门，把毛主席的关怀送到贫下中农心坎里。耀东大队五个赤脚医生一九七三年平均劳动九十五天。他们参加劳动，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群众称赤脚医生是“脚上有泥巴，身背红药箱”的好医生。事实证明，思想教育抓得好，赤脚医生队伍的思想面貌就好；反之，思想教育一放松，不良倾向就蔓延滋生。

农村卫生革命的几个问题

从邬桥公社经验来看，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要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是在同资产阶级、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进行激烈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贯彻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的重要保证，是改变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根本途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县、社、队的党组织要抓卫生战

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不能只抓经济基础而放松上层建筑的斗争，要把抓好卫生革命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一年抓几次。反复抓，抓反复。要注意思想倾向，善于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要满腔热情地爱护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

二、要重视赤脚医生队伍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培养赤脚医生是无产阶级造就自己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这一战略任务的组成部分，是劳动人民知识化的一个方面。赤脚医生的特点是亦农亦医，不能脱离劳动。邬桥公社的赤脚医生每年平均劳动两个月左右，少了一些，有待改进。忽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值得注意的倾向。赤脚医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采植中草药的劳动时间，一般应不少于同等劳力的三分之一。

党组织要关心赤脚医生的学习和思想革命化，组织他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为革命钻研业务，坚持又红又专，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热爱农村，热爱贫下中农。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医疗水平，带好卫生员队伍，要为创立我国的新医学新药学作出贡献。医学院校、县医院、公社卫生院必须坚持医疗卫生的重点在农村，坚持巡回医疗，向赤脚医生学习；同时，加强对赤脚医生的培训。

要不断选派一些优秀赤脚医生充实县医院、公社卫生院，掺沙子，并担任一定领导工作，团结、教育和改造原有的知识分子。

三、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问题。合作医疗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是人民公社制度在现阶段的必然产物。要教育社员用社会主义思想来对待社会主义事业。合作医疗的巩固发展，邬桥公社着重抓了三个环节：贯彻预防为主，降低发病率；勤俭办医，大搞中草药；减少不必要的转诊，节约开支。这样做，合作医疗完全可以做到收支平衡或逐年有积余。在此前提下，社员负担可以逐步减轻，报销范围可以逐步扩大，使合作医疗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示出来。

文汇报、解放日报、新华社记者

认真搞好计划生育

——南汇县周西公社太平大队的调查

几年来,太平大队党支部,以路线为纲,充分发动群众,认真抓紧晚婚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成绩。一九七四年,全大队二百二十个育龄妇女,有二百人落实了各种节育措施,节育率达百分之九十点九。人口出生率一九七一年为千分之十三点八,一九七二年下降到千分之八点七六,一九七三年进一步下降到千分之六。

坚持路线教育,狠抓思想落实

太平大队在开展晚婚和计划生育工作中,首先坚持路线教育。过去,党支部认为养小孩的事,由妇女干部和卫生员、赤脚医生抓抓就行了。因此,一九七一年以前人口出生率比较高。后来,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大队党支部多次进行学习讨论,认识到实行计划生育是铲除封建主义毒害,移风易俗的一场思想革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计划按比例,人口当然也应该有计划地发展。为了保护母亲和儿童,使妇女有更多

的精力参加革命和建设，使我们的下一代更健康地成长，也要求实行计划生育。搞好计划生育也是关系到落实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的大事情。明确了意义，大队党支部对计划生育工作重视了起来，做到平时不放松，节日期间认真抓，发现苗子及时抓。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大队多次举办学习班，组织干部和社员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动谬论，肃清“早子早福”、“多子多福”、“男女双全”、“重男轻女”等孔孟之道的流毒，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是一件大事。群众懂得了真理，就会齐心去做，大家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越来越高。

七队的政治队长生了两个女孩子，爱人思想不通，想再生个男孩子。他针对爱人有“养儿防老”的思想，就和她一起进行回忆对比，帮助她认识到：解放前贫下中农“糠菜半年粮，生老病死没保障”，今天“芝麻开花节节高，生活越过越美好”，这并不是因为有儿无儿，而是时代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从而懂得：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才是贫下中农幸福的保证、防老的根本。认识提高后，她就自觉地落实了节育措施。

坚持说服教育，抓紧青年晚婚

太平大队党支部，把对青年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

育和提倡晚婚结合起来。大队团支部、民兵连密切配合，经常向团员、青年进行晚婚的宣传教育，促使青年自觉实行晚婚。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四年中，全大队有二十九名青年结婚，大多数符合晚婚年龄。许多青年一再推迟婚期。六队共青团员小陈，是个独养儿子，到了结婚年龄，他的母亲急于为他办婚事，女方也来催促他早点办婚事，但他想到毛主席关心青年政治上的进步和成长，自己是共青团员，首先应该多学习一点，多做点工作，因此坚持晚婚，三次说服母亲和对方推迟婚期，直到二十八岁才结婚。

坚持群众路线，狠抓措施落实

太平大队的晚婚和计划生育工作，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由一位支委和一位革委会委员分管，生产队由一位妇女队长负责，上下一条线，层层有人抓。他们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在落实粮食购销任务一定五年的政策的同时，结合制定晚婚、节育的五年规划。在执行规划时，每年发动群众讨论落实措施，形成自觉执行规划和实行计划生育的新风尚。四队一个妇女干部的丈夫，经常主动去大队领避孕药，帮助爱人按时把药分送给服药对象。大队支部书记和大队革委会的一个委员，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坚持发药到队、送药上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实行计划生育后，小孩养得少了，怎样把小孩教养好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小孩没人管，父母劳动不安心，并且会直接影响到计划生育的开展。因此，大队把办好幼儿园和托儿所作为落实计划生育措施的重要内容来抓。第四生产队只有两个婴儿，也坚持办了托儿所。队长说：小孩虽少，托儿所一定要办，这是使社员消除“多养个保险囤”思想，是实行计划生育的具体措施，是为革命培育幼苗的大事。从一九七二年起，大队还办了幼儿园，每天早晚专人接送。在幼儿园中，既对儿童进行爱国家、爱集体的思想教育，又对儿童进行识字、计算教育，还组织他们进行唱歌、跳舞、游戏等活动。社员们说，幼儿园比我们自己教育得还好。

坚持干部带头，身教重于言教

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都能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带头落实各种节育措施。大队的十二名干部，除一名新婚和一名未婚外，都根据各自的情况落实了措施；六十九名生产队干部中，有生育能力的四十四人，也都落实了各种措施。十一队会计小刘，有了两个女孩子，因受旧习惯势力的影响，一度思想上有些波动，党支部就及时教育、帮助他，使他认识到“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很快落实了节育措施。

干部以身作则，对社员宣传教育也就更有说服力。第一生产队有个社员是入赘女婿，养了两个小孩都归女方家庭，还想再养一个归男方家庭，生产队干部和大队干部

一再耐心做说服工作，帮助他们提高了认识，落实了节育措施。

现在，这个大队在群众中已初步形成以晚婚为光荣、以实行计划生育为光荣的新风尚，自觉地为革命实行计划生育。广大社员高兴地说：计划生育好得很，全家老小都高兴；学习生产添干劲，一门心思干革命。

这个公社实现了普及教育

——金山县朱行公社的调查

金山县朱行公社地处上海远郊。解放前，这里是穷乡僻壤，文化教育非常落后。解放后，虽然办起了几所小学，但由于受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全公社仍有一千七百多名贫下中农的子女被关在学校大门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这个公社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全公社十八个大队，队队有学校，还办起了小学附设初中班，全部学龄儿童和少年都入了学，普及了八年制教育。

学校的大门为谁开？

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解放以后，在农村实行普及教育，实质上就是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由贫下中农掌握学校的领导权，使学校的大门真正为贫下中农而开。这一点，在朱行公社是有一个斗争过程的。

一九六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号召。朱行公社的贫下中农欢欣鼓舞，接管了全公社的六所小学，看到这些学校集中在几个集镇上，许多贫下中农子女不能就近上学。遵照毛主席“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的指示，许多同志提出要把学校办到各个大队去，否则就谈不上真正为贫下中农服务。但有些人不同意。他们说：“集镇上开出校门也是田，不是为贫下中农服务，为谁服务？”有些人还摆出了许多困难和理由，反对把学校办到大队去。

这一场争论，看起来是一个学校要不要搬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学校的门是不是真正向贫下中农开。公社党委抓住这个问题，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毛主席有关普及教育工作的指示。同时和学校教师一起，回顾了本公社在普及教育过程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个公社，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贫下中农积极办学，小学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但是，到一九六二年，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干扰，强调所谓“正规化”，一下子砍掉了六所民办小学和一所中学，使全公社刚上学不久的七百多名贫下中农子女被迫停学。新街小学原有十三个班，四百多名学生，一下子压缩七个班，剩下不满二百个学生。全公社入学率直线下降。这样一回顾，使大家认识到，在“学校的大门为谁开”的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开出校门也是田”，是不是就意味着学校的大门为贫下中农开了呢？不一定，关键还是要看路线。贫下中农用许多事实，说明了由于路线不对头，学校布点不合理，给贫下中农带来了“五个不利”：第一，不利于贫下中农子女就近上学。儿童上学一般要跑半小时，最远的要一个多小时。第二，学校搞全日制，用入学考试、留级、退学等重重关卡，使贫下中农子女过了这一关，过不了那一关。原中心小学有两个班，一年级入学时有八十九名学生，到六年级只剩下十八名。第三，搞“正规化”，贫下中农为子女上学每年要花十多元的书学费，进中学更没有条件。第四，学校搞关门读书，智育第一，教出来的学生看不起农民，有的学生小学毕业了不会打算盘，不会种田，不安心农业生产。第五，贫下中农管不着。

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认识到，学校的大门为谁开，这是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有的教师原来认为自己天天在农村，为谁服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通过学习才体会到，要真正为贫下中农服务，就必须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有些教师原来怕学校办到大队后生活艰苦，但听了贫下中农诉说旧社会穷人没有文化的苦以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当一辈子教师。

学校“搬家”那天，贫下中农敲锣打鼓把教师送到了村里，许多老贫农高兴地说：“学校办到家门口，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才办得到。”贫下中农管理了学校，许多困难也很快得到了解决。没有教室，贫下中农把自己房子腾

出来；没有教师，贫下中农推荐复员军人、干部担任；没有桌子板凳，学生自己带凳子，搭木条。就这样，自力更生，因陋就简，每个大队都办起了小学，许多大队还附设了初中班。开学那天，贫下中农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进了学校。过去失学、退学的学生也重新上了学。全公社一下子增加了一百零一个班，二千零九名学生，入学率从百分之六十一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七点五。

关键要有深厚的阶级感情

学校办到了大队，校门为谁开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斗争的焦点主要围绕这样一个问题：除了努力做好已入学的少年儿童巩固提高工作外，还要不要进一步做百分之二点五那一部分未入学的少年儿童的普及教育工作。

有一件事使大家受到很大教育。东风大队有个学生，家里与学校只有一桥之隔，但由于父母要参加劳动，家务事要他做，因此学校虽在家门口，却仍然上不了学。全公社象这样的贫下中农子女就有几十个。开始，大家对这个问题没有引起重视。有的教师认为：“学校都办到家门口了，再不来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还有的认为：“现在主要是抓提高教育质量，否则就会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些情况说明，即使学校办到贫下中农家门口，教师如果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还是不可能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

问题,原则的问题。”公社党委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毛主席著作,同时组织有领导干部和革命教师参加的调查组,分头到生产队一家一户进行调查,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战斗大队有个教师到水产队去调查,发现这个队的渔民一共只有三个姓,由于不识字,孩子的名字都叫“阿大”、“阿小”,“大妹”、“小妹”。因此,几次调查入学情况,数字都不一样。这个教师还发现,有些年龄较大的孩子,怕学校不收超龄儿童,把出生的月份尽量报小。孩子们这样迫切要求学文化,使这位教师深受感动。她想,有这样多渔民的子女还上不了学,这怎么能算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尽到了一个革命教师的责任呢?有些同志,过去认为“教室坐满了,普及教育的工作差不多了”。通过调查认识到,从数量上看差不多了,从路线上看,从贫下中农的要求和还有一些贫下中农子女没有入学来看,就差得很多。因此,大家决心在努力做好已入学少年儿童巩固提高工作的同时,努力把百分之二点五未入学的儿童动员入学。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全公社一百四十九名儿童未入学的原因各有不同,如:聋儿、哑儿、瘫儿等生理原因;家长常年卧病,需要孩子照顾;孩子多,家务重,经济困难。还有些女孩子,因为家长受到重男轻女等传统思想的影响而不能上学读书。因此,要做好这部分儿童的普及教育工作,困难是很多的。但是,教师思想感情起了变化,就能把贫下中农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东风大队有个

十岁的贫农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走不动路，说不来话，一见陌生人就要吓得大声哭叫，长期以来，一直关在家里。这个大队的教师在山东李架子大队李守凤的先进事迹鼓舞下，主动送教上门。这时，社会上议论纷纷，有人说：“要叫这个小囡读书识字，真是异想天开。”小孩子的家长也说：“老师啊，这个小囡连阿爸阿妈都叫不清，你就别操心了吧！”但这位教师并不气馁，不管刮风下雨，坚持每天送教上门。开始，小孩子读书发音总是不准，但教师不怕困难。经过二十多天的精心教学，这个孩子第一次用普通话正确地喊出了“毛主席万岁！”这时，孩子的父亲热泪盈眶，紧紧握住教师的手，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新华大队有个聋哑儿童叫周桂英，教师采用了图片、实物和文字相结合的方法，教她学文化。经过反复教学，这个聋哑儿也识了字，学了文化。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贫下中农的聋哑儿才学上了文化。”象这样的动人事例，朱行公社各大队都有。

思想感情变了，只要是符合贫下中农利益的事情，朱行公社的教师都干。上面提到的那个家庭和学校一桥之隔但不能上学的孩子，家长也想让他读书，但要求迟一点到校，早一点回家，以便料理家务。经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允许迟来早退。这个办法一推广，又有许多学生解决了上学问题。他们有的半天上学，有的中午、晚上上学，还有的随到随教。这样做虽然很麻烦，但教师们觉得，只要能为贫下中农服务，再麻烦的事情也应当去做。

要使贫下中农子女都入学，还要帮助有些家长克服

和摆脱那种“种田凭力气，识不识字一个样”和“男小因读书受用，女小因读书白送”的旧思想。许多教师运用调查访问中了解的实际事例来进行宣传动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有一次，水产队鱼苗发生病害，由于会计因公外出，不在队里，无人会计算水塘面积，耽误了用药时间，造成大量鱼苗死亡。有的生产队还由于经管有关工作的人不识字，错用了农药，搞乱了稻种，造成减产。通过这样实际生动的宣传，使贫下中农认识到，干革命，学马列著作，搞科学种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那一样都离不开文化，识字不识字大不一样。共和大队有个社员，原来认为自己的儿子腰圆、臂粗、力气大，不读书也可以种田。觉悟提高后，也高高兴兴地把儿子送到了学校。洪光大队原来九个没有入学的儿童，有七个是女的，经过宣传教育，也都上了学。

为了使每一个学龄儿童都能上学，许多贫下中农和红卫兵、红小兵发扬了助人为乐的革命精神。八一学校两个女红卫兵，半年多来，每天轮流背一个两腿残废的女孩上学，不管刮风下雨，从未间断过。许多红小兵主动帮助那些家务多、父母有病的同学做家务，使他们能安心学习。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全公社一百四十九个未入学的学龄儿童，除八个因生理上的原因确实丧失了学习能力的以外，全部上了学。

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办学形式

学生都入了学，但是能不能巩固呢？水产队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老师动员学龄儿童入学，孩子们都报了名。可是，第二天，却不见一个渔民子弟来读书。为什么呢？教师带着一团疑云跑到水产队，只看到渔民村里除了几个光屁股的小孩和看家的老渔民，该上学的孩子都随船外出了。这种情景，使这位教师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事情：当时公社的中心小学为了让渔民的子弟上学，都把他们在镇上住宿，但是，这种做法影响了渔民的经济收入，结果渔民的子弟干脆都不来上学了。这就引起了教师的深思：水产队的渔民流动性大，孩子要帮大人行船拉网，捕鱼捉虾，这样，怎么能保证渔民的子女天天来全日制的学校上学呢？回来后，这个教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普及农村教育的指示。毛主席说：“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毛主席的话象一盏明灯照亮了这个教师的心。她立即向领导提出了针对渔民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办学形式的建议。在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办起了渔民夜校班，解决了渔民子弟的上学问题。

这件事对公社领导和其他大队的教师启发很大。他们感到，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好普及教育，就要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办学形式。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普

及教育工作也很难搞好。公社领导和革命教师又一起，进一步批判了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影响下那种不考虑农村实际情况，只搞“正规化”的办学形式，并且根据经济条件、文化基础、学生年龄、农事季节等具体情况，除了办好全日制学校外，还千方百计采取了多种办学形式。

对早出晚归、流动性较大的渔民子女，除了办好夜校班，还根据有些渔民子女年龄大，过去没有上过学的特点，开设了速成班，用较短的时间，读完普及八年的课程；对有些经常外出搞运输，当天不能回来的船民子女，发给“流动读书卡”，船停靠在那里，学生就可到附近公社或大队的学校读书。这样，渔民和船民的子女，多年来要求读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大队还办有夜初中班，让那些读过几年书，现已参加生产劳动的人继续学习。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公社采取多种形式办学，符合贫下中农的实际需要，有利于生产，能够加快和巩固农村的普及教育。

上海市教育局调查组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一代新人茁壮成长

——上海县纪王公社东风大队五七小学的调查

上海县纪王公社东风大队五七小学，是在毛主席发出关于“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以后诞生的新型学校。东风大队成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小组管理这所学校，由大队的一名党支部委员担任不脱产的“泥腿子”校长。六年来，这所学校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一百多名学生，除一部分参加人民解放军和升学外，大多数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有的担任了生产队干部，成了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一支骨干力量。

贫下中农一定要占领学校阵地

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东风大队五七小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充满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一小撮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吹冷风，他们说：“泥

腿子只能种粮棉油，怎么能管好学校。”还有人说什么：“五七小学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针对这些流言蜚语，东风大队的贫下中农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贫管小组的同志说得好：“种田种不好，只影响一熟产量。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人要变修，国要变色。我们不但要为革命种好粮棉油，更要重视教育革命，管理好学校，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为了占领学校这个阵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管好学校，东风大队的贫下中农批斗了煽阴风的阶级敌人，联系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开展革命大批判。大队里几位贫农在解放前的遭遇，激起了人们对旧社会的仇恨，坚定了人们管理好学校的信心。一位姓赵的老贫农，在解放前的一九四七年秋天，曾到镇上小学给孩子报名上学。恶霸地主兼校长污蔑乡下小因打赤脚不象读书的样子。老赵和他评理，指出这学校是地主老财搜刮民脂民膏建造起来的。当年为了造学校，狗地主上门逼钱。那时老赵的爹刚死，家里连锅也揭不开，狗地主硬逼着他借高利贷。老赵责问道：“现在学校房子造好了，我的小因为啥连报个名也不行？”可是，没等他讲完，恶霸地主把桌子一拍，扬言要把他抓到警察局去。老赵在回忆了这一段往事以后认识到，在旧社会，穷人不但被剥夺了学文化的权利，即使上了学，念的也是孔孟之道，替地主培养奴才。他激动地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贫下中农成了国家的主人，我们不管学校谁管？难道再让

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我们的学校吗？决不能！我们就是要管，一定要管到底！”

“泥腿子”校长也愤怒声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解放十七年来，这条黑线统治了学校。东风大队北场生产队共四十四户，其中二十二户贫下中农子女中，那时只有三个中学生，而在八户四类分子的子女中，却有两个大学生，三个高中生，六个初中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是这样用考试、经济、学龄、路程四大“关”把贫下中农子弟关在大门外。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他在批判会上有力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泥腿子掌管了学校大权。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我们一定要管好学校，也一定能够管好学校。”

东风大队的贫下中农，终于把学校这个阵地占领下来了。他们团结革命师生，坚决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泥腿子们走上了讲台，给学生上阶级教育课和农业技术课，学校还办起了学农田，进行实地教学；还组织学生搞社会调查，使学生在德育、智育和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

狠抓路线教育 在斗争中前进

但是，围绕着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两条路线斗争并

没有结束。正当东风大队五七小学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阔步前进的时候，社会上又刮起了一股“教学质量不如过去”的冷风，甚至有人说五七小学“课外活动搞得太多”，叫喊“要狠抓课堂教学，提高知识质量，奋战一个月改变面貌”。

难道真的“今不如昔”吗？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泥腿子”校长和贫下中农、革命师生一道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了一场大讨论。

尖锐的斗争，使人们回想起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的情景。有一个六五届初中毕业生回队以后，贫下中农要他当会计。可是，他认为这是“大材小用”没出息，不愿意干，一心想寻找机会跳出“露天工厂”。贫下中农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旧学校出来的人，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不安心农村工作，做生活不象样，工分不肯让；他们想的是读书做官，当精神贵族。这是什么样的教育质量呢？这正是刘少奇、林彪这一伙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教育质量。”

今天，在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指引下，在贫下中农的管理下，学校培养的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才是无产阶级需要的教学质量。在叛徒、卖国贼林彪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败露以后，贫下中农和革命教师把学生领到当年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人民的“老渡口”上阶级教育课。广大学生通过回忆对比懂得了什么叫阶级和阶级斗争，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满怀无产阶级义愤，写出了一篇又一篇

揭露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的批判文章。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学生能有这样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吗？

一天，北风呼啸。五年级学生印泉兴，这个过去曾经一度拿了集体的东西随便往河里扔的顽皮孩子，看到河里有许多砖头，便想这是集体的财产，丢在河里可惜。他赶忙回家扛了铁镢站在河边打捞。河心的砖块捞不着，他就冒着严寒跳到河里把砖块统统摸上岸，交给集体。广大学生就是这样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逐步树立起劳动观点和热爱集体的思想。在“三脱离”的旧学校里，能培养出贫下中农需要的这样的学生来吗？

“三秋”季节，东马生产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早晨，当社员们下田割稻的时候，发现有五亩稻子已经割倒了。经过再三调查，才弄清是十几个团员和民兵在共产党员胡红娣带领下，半夜抢割的。为了不计报酬，他们干完以后谁也不肯说。贫下中农和教师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材，便请胡红娣到学校上社会主义文化课，向学生介绍团员和民兵们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种田的事迹。同学们听了以后深受感动，老师就这一题材出了一个记叙文的题目，让学生做作文。同学们热情洋溢地歌颂团员和民兵的优良品质，并表示要向大哥哥大姐姐们学习，写出来的文章有血有肉。这种生动活泼、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们受到了德育和智育方面的教育，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旧学校里，是根本不可能

有的。

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教学质量观。几年来管理学校的实践,使东风大队的贫下中农深切体会到,我们现在的教学质量,是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学校所不能比拟的。他们和革命教师一起,写了革命大字报,摆事实,讲道理,批判了“今不如昔”的谬论,巩固和发展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成果。

团结革命教师 搞好教育革命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东风大队的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贯彻执行党关于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带领革命教师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打进攻战,在斗争中促进他们的思想革命化。

一位同学拿了公家的篮球只顾自己玩。一位老师找他谈话,他拔腿就跑。老师在后追喊,追得越紧,他跑得越快。这位老师气愤之下体罚了这位同学。有的老师不加批判,还同情地说:“学生不听话,是要煞一煞。”校长得知以后,心情很沉重。第二天,他找那位体罚学生的老师谈心,给他讲对学生只能说服不能压服的道理,还用典型事例对他进行阶级教育。在旧社会,贫农社员黄阿毛一家几代都是“睁眼睛”。他爹娘想让他识几个字,曾把他送进一所私塾读书。私塾先生动不动就拳打脚踢,黄阿毛的头上、手上常常青一块、紫一块,最后终于被打出了私塾门。讲到这里,校长说:“旧社会,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

的知识分子,摆着一副‘师道尊严’的面孔,用封建把头的手段来虐待学生。受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教师,也是这样对待学生。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指引下,应该同这一套彻底决裂啊!毛主席说:‘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我们决不能把学生当作敌人。”

热情的帮助,耐心的教育,激起了这位教师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仇恨。他愤怒地批判了“师道尊严”的流毒。

东风大队的贫下中农就是这样,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对教师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革命教师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提高,他们自觉地起来抵制和肃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

有一次,有关部门组织全公社的统考,对学生搞突然袭击。学生每人一张桌子,当场交卷,当场批卷,当场排名次,监考的教师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五七小学的教师坚决反对。他们说,这是公开鼓励“分数挂帅”、“智育第一”,和文化大革命前有什么两样?他们认为,考试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学会运用已经获得的知识,决不能把学生当敌人。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五七小学的革命教师废除了旧的考试方法,做了许多新的尝试。例如算术考试,他们不要学生死背公式,而强调要学会在生产实践中运用。临考时,教师把高年级学生领到一个大粪坑的旁边,对学生说:“为了积肥,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粪坑有多大?这就作为我们今天考试的一个题目。”教师把学生分成三个小

组,让他们集体研究,互相商量,测算粪坑圆周的面积。这个粪坑又深又宽,既不能跑到粪坑中间去找一个圆心以求半径,也不能用皮尺沿着粪坑周围来量周长。怎么办?大家都在思索着、议论着。只见一位同学拿着一根长竹竿往粪坑上一架,不停地左右转动,当他发现有一个位置是竹竿两端架空的距离最长的时候,高兴地叫起来:“我找到办法了!”他说:“书上告诉我们圆的直径是最长的,我用竹竿找到了最长的距离,不就是等于找到了直径吗?”别的同学也按照这个办法,从不同的角度重复做了几遍,得出了一致的答案。这样的考试,使学生达到了巩固和学会运用已获得的知识的目的。

东风大队贫下中农认为,要彻底改革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一支积极力量

——金山县革命故事活动的调查

近几年来,金山县已培养了三千多名革命故事员,遍及二千四百多个生产队。他们经常在田头、场地、宅基、茶馆等场所大讲革命故事,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歌颂社会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孔孟之道,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巩固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阶级斗争不能忘

毛主席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大力开展农村革命故事活动,对于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向广大社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

金山县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开展大讲革命故事的活动,坚持把它作为党在农村的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他们对开展革命故事活动的认识,是通过斗争的

实践获得的。例如枫围公社过去大讲革命故事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来一度放松了，于是，一些流散的旧艺人和农村中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分子，就乘机在各生产队传播坏书坏故事。公社政宣干部骑了车子到处去赶，结果赶了这边，那边又出现；赶了那边，这边又出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公社重新把故事员队伍组织起来，同坏书坏故事进行斗争，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讲坏故事的地富分子受到了群众的批斗。现在，这个公社是县里开展革命故事活动较好的单位之一。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取得了巨大胜利以后，有些公社干部又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认为现在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阶级敌人也批过了，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把生产搞上去。因此，放松了对开展群众性革命故事活动的领导。阶级敌人和没有改造好的旧艺人等又乘机活动，利用讲帝王将相、神仙鬼怪故事，传播孔孟之道、宗教迷信和私有观念，使某些地方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重工轻农、重钱轻粮等资本主义思想也开始抬头。如朱泾公社良种大队第七生产队有个富农分子，利用晚上社员休息时间，在家买好香烟，泡好浓茶引诱青年，通过讲黄色故事、鬼故事，来毒害青年。县委领导抓住这一阶级斗争的事实，及时组织各公社、集镇政工干部、文化站干部、故事员代表共一百多人到现场举行批判会，使大家看到剥削阶级是如何利用思想文化阵地散布封、资、修毒素，腐蚀工人、农民、干部和青年，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的，从而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占领农村思

想文化阵地的斗争的长期性，坚持开展大讲革命故事的活动，积极主动地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革命故事作用大

金山县的革命故事员遍及两千多个生产队，那里冒出坏故事和歪风邪气，那里就会有革命故事员出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新华大队第十五生产队有个社员造新屋，由于受到“造屋不请酒，三年就要漏”的旧风俗的影响，所以打算请客收礼。故事员知道以后，就到这个社员家里讲了宣传社会主义新风的故事《造屋之前》，提高了他的思想认识，于是他把十一户亲戚送来的九只“篮头”（送来的“礼品”），主动退回，泥工也自带粮食上门，破旧立新。

革命故事活动开展得较好的枫围、山阳和松隐等公社的党委，经常根据党的中心工作和政治任务，就地取材，及时编写革命故事进行宣传教育。他们针对农村出现的重工轻农等倾向，编写了宣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老队长顶梁》、《西瓜田里的斗争》等故事；针对有的社员办婚丧喜事讲排场、办酒席等情况，编写了《新事新办》、《老队长迎亲》等故事，宣传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的思想。这些故事人物形象鲜明，情节生动，爱憎分明，具有很大的教育作用。新农公社牡丹大队第三生产队有个贫农社员听了《老队长迎亲》的故事，很受教育。他的女儿出嫁时，就象故事中的先进人物陆桂华一样，手拿小包裹，不坐

船、不请客，高高兴兴地走到了婆家。后来，这个贫农社员的儿子结婚时，也同样做到新事新办，勤俭节约，把原来准备杀的一头羊，卖给收购站。枫围公社新新大队有个社员，祖上三代都没有生过儿子，他是入赘进门的。结婚后，他爱人又生了两个女儿，本想再生一个儿子，但是听了宣传计划生育的故事《李桂英》后，认识到自己受了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就改变了主意，去做了绝育手术。革命故事也促进了生产斗争的发展，如新新大队讲了《女代表》故事后，改变了过去女同志不能撒麦的旧习惯，进一步解放了妇女的生产力。

就地取材，编写故事，教育群众，教育自己，这是金山县革命故事活动中的一个特点。红星大队五队有个十九岁的女故事员，今春有一个亲戚上门要给她说媒，她知道后马上教育父母亲，破除旧风俗，讲坚持晚婚的好处，同时教育男方，树立晚婚为荣的思想。大队故事组根据她的事迹，及时编了革命故事《全英的心事》。这个故事讲开后，队里许多青年表示要向她学习，争做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促进派。

通过大讲革命故事，宣传了党的基本路线，提高了广大贫下中农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通过大讲革命故事，破旧立新，移风易俗，许多公社出现了“学习大寨夺丰收，备战备荒广积粮，婚丧喜事不铺张”等的社会主义新气象。

书记带头各级抓

能不能把故事活动抓好,关键在于领导是否亲自抓。中共金山县委十分重视革命故事活动,时常把它放到县委议事日程上来加以研究。县委书记亲自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研究革命故事工作。有些重点故事,还放在县委常委会上进行试讲、讨论。如金卫公社创作了反映八二大队学大寨的故事《盐碱滩上大寨花》,故事员在县委常委会上进行试讲后,常委成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个大队的故事员听了意见后,又学习十大文件,深入群众,集体修改,后来又在县委常委会上作了试讲,县委领导肯定了这个故事。由于县委的重视,各公社党委也重视起来。有的公社党委书记还和革命故事员一起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讨论题材,一起修改故事稿子。

在开展革命故事活动的过程中,全县各级领导认识到培养和组织一支革命化的故事员队伍,是搞好这项活动的关键。金山县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级党组织从贫下中农、知识青年中挑选和培养了三千多名政治思想好,有一定活动能力的故事员。由于这支队伍活跃在农村,使革命故事在斗争中站住了脚跟,占领了思想文化阵地。

为了加强对故事员队伍的思想建设,金山县各级党组织经常举办各种学习班,组织故事员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十大文件,开展对刘少奇、林彪一伙反

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使他们做到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无论什么场合,不管听众多少,都能随时把革命故事讲起来。枫围公社党委每一季度培训一次故事员骨干,先后培养了二百多名故事员,党委负责同志亲自为故事员讲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史,提高故事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一九七三年,县和公社举办了二十八期故事员培训班。一九七四年以来,县里又组织八名优秀故事员组成巡回演讲队,下基层为各公社、集镇故事员示范演讲五十三场次,对全县故事员骨干作了一次培训。

开展革命故事活动既然是一个革命活动,就必然会受到社会上的各种旧思想的反对。新新大队一位有孩子的女故事员,一上台讲故事,就遭到有些人的指责,说什么“青年妇女上茶馆指手划脚,不象样子”,她的家属也反对。党支部及时做了故事员家属的工作,使她的家属热情支持她外出讲故事。

蓬勃开展的革命故事活动,也为农村培养了一批干部。几年来,全县各级党组织在培养新干部的过程中,注意从革命故事员队伍中选拔新生力量,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里来。据枫围公社红星大队统计,在故事员中被群众推荐进大队、生产队领导班子的有二十人。

金山县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故事活动配合批林批孔斗争,正在蓬勃开展。广大革命故事员表示要积极投入农村正在开展的批林批孔斗争,宣传党的基本路线,继续为巩固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而战斗。

政治夜校是进行思想和 政治路线教育的课堂

——松江县城北公社民乐大队第三生产队的调查

当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的时候，民乐三队办起了政治夜校。八年来，夜校常年上课，坚持学习，从未间断。现在，全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年社员都成了夜校的学员。每旬三个晚上学习，学员从不无故缺席。即使是大忙季节，由于夜校办到了田头，社员也挤出时间来学习。大家说：“我们种田人也要认真学习理论。”八年的实践证明，政治夜校确实是向社员和干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课堂，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重要阵地。

政治夜校好！

政治夜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民乐三队广大干部和社员看到办校八年来各方面的变化，无不高兴地说：“政治夜校就是好！”

一、形成了一种为革命学文化、学理论的浓厚空气。

这个生产队的社员反复学习了列宁关于“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和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等教导，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越来越高，出现了子女教父母识字、夫妻一同学习的许多动人事迹。他们已养成准时到夜校学习的习惯，无故不缺课。养鸭饲养员老王，今年六十五岁了，学习还很积极。有一次，因为放鸭放得远，来不及赶回来学习，第二天他特地找人补课。参加夜校理论班学习的社员，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已初步学习了一遍或多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这个队的四十多个青年社员，订了二十六份《红旗》杂志，每一期的重要文章，他们都认真学习，并且组织集体讨论。

二、推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断深入。民乐三队政治夜校的学员，在学习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政治和思想上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的反动谬论，努力分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单是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这三年中，就开了七十多次批判会。一九七四年以来，这个生产队以政治夜校为阵地，批判林彪和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带有封建毒素的“老古话”，取得了新的成绩。他们还登上了公社广播台，广播批林批孔的战斗文章。

三、社员的精神面貌起了深刻的变化。对于学习马

列，毛主席说：“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民乐三队的社员在政治夜校学习了几年，更加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更加自觉地同私有观念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文化大革命前，有的社员从已经收获过的大田里拾到一把稻穗或几个马铃薯，从已经捕捞过的鱼塘里捉到几条鱼，顺手拿回家，并不觉得有啥不对；如今，他们拾到几斤稻谷，半碗豆子，一条鱼，都自动交给集体。这已经成为很平常的事情。社会主义新风尚正在形成。近几年，干部和社员造房子、结婚、办丧事，都不请酒，不送礼，不搞铺张浪费。

四、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民乐三队地势低洼，生产条件比较差。以前，这里的干部缺乏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没有领导社员大干苦干，低洼地面貌改变不大。这几年，干部和社员在政治夜校通过学习和革命大批判，批判了“天命论”，干部看到了社员的力量，社员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艰苦奋斗，治水改土，做出了很大成绩。文化大革命以来，粮食连续八年大丰收。一九七四年夏熟又大幅度增产，三麦亩产达到五百五十三斤，比历史上的最高产量还增长百分之三十一·六。社员高兴地说：“低洼地麦子产量冲破五百关，政治夜校也有一分功劳。”

办好政治夜校是生产队的大事

民乐三队办政治夜校八年，越办越好，首先是因为生产队队委会明确了办好政治夜校的重要意义，对夜校抓

得很紧、很具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民乐三队曾吃过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苦头，就生产抓生产，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结果，社员心不齐，歪风邪气上升，长期处于后进状态，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文化大革命初期，民乐三队学习先进单位的经验，办起了政治夜校，作为经常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课堂。

夜校办了三、四年后，已成为全县的先进单位。就在这时候，有人说：“民乐三队夜校是办得好的，可惜产量还赶不上高产队。”有的队干部听到这种议论，思想就动摇了。他们也觉得民乐三队田多土质差，队大劳力少，要赶上高产队，以后应当多抓抓生产了。到底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还是单纯抓生产？对这个问题，队委会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许多同志摆了生产队办政治夜校后发生的五个变化：一是社员的阶级斗争观点树得牢，对阶级敌人管得严，能够识破阶级敌人的种种鬼花样；二是社员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分得更清了；三是全队四十几个青年社员有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理想，决心扎根农村干革命；四是增强干部和社员、社员和社员之间的革命团结；五是治水改土有了劲，土质改良了，产量上去了。有的同志还谈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训，说：“不抓政治思想工作，只讲多抓抓生产，就会走老路，吃苦头。”经过讨论，原来对继续办好政治夜校有动摇的干部也提高了认识。队委会统一了思想，决心继续抓好政治夜校，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民乐三队的干部对政治夜校重视的一个标志，就是七个队委都带头参加夜校学习。有的干部还经常给夜校理论班作辅导。如原来的政治队长老张，是个复员军人，对有些农活不大内行。他为了给夜校讲好“实践出真知”这一课，就在水泥场地上用碎泥苦练落谷技术，终于学会了这项农活。在夜校里，他用自己的体会，讲明实践第一的观点，学员都觉得很有启发。民乐三队的干部还注意虚心学习本县本公社兄弟队的办校经验，找差距，不断改进政治夜校的工作。

选拔和培养一批学习辅导员

政治夜校办起来以后，选拔和培养辅导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民乐三队现有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的青年社员二十名，还有插队落户的城镇知识青年四名，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这个生产队办校八年来，已有十七个青年担任过辅导员，其中两个已经入党，十一个参加了共青团。现在他们大多数已担负了其他工作，不再当辅导员了，但是，因为他们对政治夜校很有感情，有时仍旧挤出时间到夜校上课、辅导。

民乐三队的夜校辅导员，个个朝气蓬勃，积极负责。例如，共青团员小张自从担任夜校辅导员后，不但认真备课上课，而且处处以身作则，做出榜样。有一次，生产队在鱼塘里车水捉鱼，捉完以后，他弟弟跳下鱼塘，又摸到一条十来斤的大黑鱼，拿回家了。小张知道后，批评了

他的弟弟，把黑鱼交给了生产队，并且在政治夜校辅导《共产党宣言》时，从这件事情谈起，使青年懂得要自觉地同传统的私有观念作彻底决裂。另一个女青年当了夜校辅导员后，为了帮助苦大仇深的陈妈妈学文化，替她画了一百五十多幅看图识字的图片。有一段时间，陈妈妈经常被外单位请去作回忆对比报告，她又帮陈妈妈写好“发言稿”。这份“发言稿”与众不同，也是用一幅幅图画组成的。

民乐三队的辅导员积极热情对待自己的工作，是因为生产队队委会经常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等光辉著作，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和学习英雄人物的活动，使他们树立了当好辅导员、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民乐三队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对照先进的政治夜校找差距，队长找领导上的差距，学员找学习上的差距，这对辅导员的促进也很大。

教学内容紧密结合现实斗争

民乐三队政治夜校刚办起来的时候，辅导员缺乏经验，讲课不联系实际。社员反映：“光是在书本上兜来兜去，你们讲起来吃力，我们听起来也没有劲。”从此以后，辅导员就十分注意在教学中联系实际，联系形势，触及时事。

每当中央下达重要文件或中央报刊发表重要社论以后，辅导员自己先认真学习，领会文件和社论精神，然后

联系本队的实际,在政治夜校里向学员宣讲,并组织大家讨论。这样做,效果就比较好。一九七〇年,民乐三队政治夜校在组织学员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开展反骄破满活动时,针对当时有些社员相互不团结,影响生产和工作这一状况,还向学员讲了对人对己都要一分为二的观点,讲了“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广泛开展谈心活动,从而增强了团结。有两个女社员,为了一点小意见,十四年相互不理睬,有一次队长派她们捆绑秧绳,她们仍然还不讲话,不打招呼,结果各搞各的,把秧绳绷斜了,闹了一个捆绑秧绳绷得不符规格的笑话。后来通过学习文件,相互谈心,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在政治夜校里坐到一条长凳上来了。社员都为这两个阶级姐妹的团结而高兴,说:“多年哑巴绳,一夜开口凳。政治夜校就是好!”批林整风运动开展以来,民乐三队政治夜校在全面批判的基础上,还把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和反动谬论分成几个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联系本队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进行专题批判,使学员受到了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

平时,政治夜校在教学上也注意联系当前中心工作,联系社员思想。他们经常采用专题讨论会的形式,引导社员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阶级斗争的大事。到目前为止,民乐三队政治夜校已组织学员讨论了:“为什么同姓不是一家人?”“阶级敌人为什么会自己跳出来?”“为什么说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好十分重要?”“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了什么?”等题目。这种讨论会,开得生动活

泼,很受社员欢迎。

学习形式适合生产队实际情况

民乐三队政治夜校开始没有分班,是统一上课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发现这种办法不好。社员中有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也有一些不识字的老年人,统一上课,文化高的感到“吃不饱”,识字不多的觉得“吃不消”。有一次讲党的基本路线,中年女社员要求辅导员先把几个生字讲一讲,青年社员则希望弄懂基本观点,要求不一样,产生了矛盾。

根据这种情况,民乐三队的政治夜校分了三个班:(1)初级班,以学文化为主,兼学政治。学员主要是老年社员,还有一部分不识字的中年社员。教材除市教育部门编写的课本外,还选学毛主席语录和常用的政治词汇。(2)中级班,学员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社员,选学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有关章节。(3)理论班,学员一般都具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以青年为主,还有几个生产队干部,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和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等。分班以后,满足了社员在学习上的不同要求,更提高了大家的学习积极性。

在学习时间上,也根据农忙农闲的不同情况,作了适当安排。平时,每旬学习三次,每次一个半小时左右,都安排在晚上。农忙季节,减少学习次数,缩短学习时间,有时把夜校办到田头。做到“千忙万忙,夜校不停办,学习不间断”。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0397324